

目 录

文 献

- 关于我党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几点意见
.....陈 云 (1)
- 毛泽民为整顿新疆财政金融给张闻天、
毛泽东的信(节录)..... (2)
- 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陈潭秋 (6)
- 陈潭秋为新疆局势变化致电中央提出善后准备意见
..... (11)
- 中央关于盛世才诬我暴动我准备撤回的指示电
..... (13)
- 任弼时为营救陈潭秋等致周恩来电..... (14)
- 中央关于向张治中接洽营救我党在新人员
致周恩来、林彪电..... (15)
- 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节选)
.....方志纯 (16)
- 附: 抗战期间中共人员在新疆工作和斗争大事记
.....徐慈君 (25)

回忆录

- 我的经历事实简述(节选)……………张治中 (39)
难忘的战斗岁月……………高登榜 (42)
新疆监狱斗争中的通讯联络工作……………刘护平 (69)

专题资料

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历史真像

- ……………新疆监狱斗争史编写组 (7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综述

-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113)

1927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54)

1930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76)

年谱

- 周保中年谱……………赵素芬 (202)

转载

抗战时期中共人员在阿克苏区的工作情况

- ……………中共新疆阿克苏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271)

关于我党在新疆做盛世才 统战工作的几点看法

(1984年12月20日)

陈 云

一、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和盛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采取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

二、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三、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当说是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

* 题目为编者所加。

毛泽民为整顿新疆财政金融 给张闻天、毛泽东的信(节录)*

(1938年4月18日)

洛甫、泽东同志：

在20天前托刘作夫同志带上信，谅已收到，新疆的概情，在该信中可以略知一二。

我到财厅工作两个月有多了，虽然经过这些时间的艰苦工作，可以说，一般的情形是懂得了。短短的5年工夫，乱发纸币，达300万万两(银票)，外债合法币2000余万元，其他天怒人怨的事还不知有多少，仅仅养活至今最多的兵不过18162名(其中实际的上等兵只4310名，一等兵3809名，二等兵2209名，其他将官及督署的七八百名副官，杂役等兵)是指整个军事的。至政府的行政系统，全省不到18000人。何况都是最高数。开始几年当然少得多，就花了这样大的借债(纸币也在)300万万两，2000余万元。而5年来的各项税收等，虽然尚未有总的统计，其数当然很巨大。比如现在月收税款约30万万两，以5000两(银票)合大洋一元，月收也有60万元，由田赋所征的一半以上粮食及

* 题目为编者所加。

牛马羊只，平均月值数万元或10万元以上。月有如此巨大收入，仅供给不到4万人的机关部队，要在陕北，大有余裕。这里负欠这大批债，弄得天怒人怨，今天无法支持。一方面过去反革命捣乱；另一方面，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所造成。过去许多不合理的事情，今天财政金融如此困难，仍然继续留存着，要去整顿，独力难为，实成为今天整理财政极大困难。

但是，督办本人^①虽然官僚气习还很重，可是对我们到（倒）也十分好，我们的建议，95%是接受的，并且有相当决心来整理财政与金融。另一方面有好的财政顾问，也很关心（这方面工作）。并且，整个新省工作的领导人，我已与他们讨论过七八次财金工作，我具体提出了整理意见。开始因（情况）不清，同时财政顾问还想在旧基础上来求解决，当时未得到大多数同意。后来经我详细说明，在这样千头万绪的乱麻中，想要疏清出来，即是说：想要将300万万两省票逐渐恢复到原来价格，这是世界无先例，维持现状也绝对不可能，唯有快刀〔斩乱〕麻，新起炉灶的办法。那就是说，不再发旧银票发新大洋票，将现有银子铸50万现银币，作开始时兑现之用。利用300余万元法币，作为内省与苏联汇兑之用，来改换与稳定新大洋票。并将省银行改组，成为中国银行一样的官商合办，发行钞票权归银行，将存六七千两黄金、银子（三四十万两），以及珠宝、玉石等，大批现金，与300余万法币作资本，发行1000万新

① 督办系盛世才。

币，以600万元收旧省票，余作半年补助财政收入之不足。半年后，就可完全求得收支平衡。财政整理重新定以〔民国〕二十七年大洋为本位的新预算，增加薪水，减少杂支及浪费。这一计划，首先得方林^①同志同意，才向〔省府〕提出，后全部同意，督办更一字不改的同意。现在仅因改大洋问题，未得作最后决定，但已开始进行这一制币工作。以目前形势看来，整理财政与改善币制，在二三月内可全部实现。并且还不至发生大困难，就可改变过来。

但是，在千头万绪的财政金融工作，尤其首先遭着本厅过去铁桶一般的旧恶习〔抵制〕，以及毫无章则，对整个内部已费两个余月时间，经过最艰苦的说服与教育工作，至今天未曾开除一个人（督办数次要我开出名单，他用调虎离山的方法调到别机关去），我认为首先进行团结工作，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是与今后整个工作有利的。果然，80%以上已被争取过来了，〔牢〕不可破的恶习，今天大大在改变着，少数基本坏分子，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使这些坏分子的阴谋诡计全不得逞。不过已被争取的公务员，工作能力与工作积极性尚差，现在必须从基本工作做起，至今天止，方林同志尚未另外给我一个人，这倒使我艰〔难〕极了。因此，特向中央请求：

一、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银行、金矿、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

① 方林系邓发同志的化名。

二、陕甘边区政府各种法令与章程，最好所有一切政府各部厅新旧章程、细则，尤其是财政、银行、金库、国民经济部的新旧章则，全给我一份作参考，减少我起草各种条例的困难。因省府本身及财、建、农三厅，我都要负责去帮助整理，要这些章则，比要干部一样的逼〔迫〕切。同时，菊如同志有一册银行簿记，请先借给我一时期，买了还他。

三、请恩来同志在武汉代为聘请数位好的会计及银行有经验的人员来。

四、我的胃病相当厉害，请在西安或汉口代买三四瓶美国胃药寄来。

五、请设法寄些新的书报，并希望将一些重要理论书籍及解放报的纸版寄来，此间不久就能翻印。财政厅有一所值 1 百万元法币的大印厂（过去准备印纸票的厂，现在因币制改良，绝对要不了，准备作为发展新疆文化的大印刷工厂）。某些书报可否指明寄给我一份，不然，会使我对世界与全国的政治要模糊。尤盼泽东同志唯物辩证法的一段。中华革命史、战略学、中国的列宁主义三本书是否在编印？如有，无论如何给我各一份。

建 业^①

① 建业系毛泽民同志的化名。

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

(1939年11月)

陈 潭 秋

我们在此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盛督办与方林同志在你们出发工作前曾有详细的正确的指示，我现在再次作补充解释：

1. 工作任务——根据新疆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环境及其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工作方针在于：

a、怎样保持新疆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土不致陷落在帝国主义的血手中。

b、怎样巩固这个抗战的重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

c、怎样推进这个落后的社会前进；怎样使各民族过着和平友谊的生活。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只有拥护和坚决彻底执行六大政策，因为六大政策是最适合于新疆特殊条件〔的〕革命政策。

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要坚决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可是，在新疆因为条件的特殊，绝不能如在口内所实行的一样。

* 陈潭秋给在新疆各地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发出的工作指示信的节选，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口内我们要巩固统一战线，但绝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我们要发展组织，要宣传主义，要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口内今天的现实条件有三大危险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抗战的前面，这就是投降、妥协、内部分裂与向后倒退。因此我们针对着这种危险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三大政治主张，号召和团结全国进步力量来克服这种危险。并且只有积极准备和扩大自己的力量才是克服这种危险的保证。可是，在新疆则具有另一种条件……如果我们在新疆提出另外不同于六大政策的主张，则无论主观如何，客观上都只能起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党〕决定我们在新疆工作的任务，不在于发展组织或宣传主义，也不在于扩大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巩固六大政策的政权。

2. 工作态度——了解了上述任务，就可以确定我们的工作态度。这就是说，我们是革命的公务员，我们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我们不是雇佣劳动者，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职务，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反对雇佣观念，反对敷衍塞责态度，反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思想，反对“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精神。这些观念、态度、思想和精神，都是苟安颓废的表现，不但我们自己应当和这些现象作坚决斗争，并且要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来鼓励和影响其他公务员，提高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我们应当把“忠实”、“积极”、“负责”成为全部公务员的工作作风。如果我们稍存苟安的心理，放弃自己的职责，发生腐化堕落的倾向，那不但辜

负了督办的委托，同时也是违背了〔党〕所赋予的使命。

3. 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达到工作任务的手段。仅仅了解了工作任务，确定了对工作的态度，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方法，仍不能达到工作任务的。我上次信中曾经指出：“我们要推动社会前进，主要的要培养和扶助新的进步的力量，但还要尽量设法减少旧的落后力量的反抗（但绝不是说我们可以同流合污），因此我们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而抹煞客观的条件”。这仍是我们今天在新疆工作方法的重要原则。在今天新疆社会的现实环境，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及客观条件，单凭自己主观去硬干，必然阻力横生，不但徒劳无功，反而〔碍〕事。如果顺利的执行六大政策，仅仅依靠我们自己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最重要而且是首要的工作，就是在六大政策旗帜下团结各族先进青年，培养大批真正忠实于六大政策的干部。应当把这些进步青年、干部作为执行六大政策、巩固六大政策政权的基本力量。

至于待人谦和处事郑重，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实行清慎勤〔的〕古训，更是我们不应该时刻或忘的。

为了执行工作顺利，为了迅速反映下面情况于行政当局，你们应当多多向督办及省署作工作报告，请示工作方针。

4. 个人修养——我们同志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必须保持着党员的素质与我党的优良传统。这里要特别注意下列三个问题：

a、意识问题——我们要始终保持住坚定的革命的先

进意识。对工作要有光明前途的信心，要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毅勇气。不要见胜利则虚骄，见困难则消沉。

b、生活问题——同志们对私人生活应严加检束，发扬我们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不为物欲所动摇。社会对于青年人最大的诱力莫过于金钱与女色。许多青年人的堕落与腐化也大半由于不能战胜这种诱力所致。这是我们应当作(经)常警惕的。我们同志在僻远地方工作，既不易得到上级的直接指示，又缺乏群众的有力监督，如果自己稍一不慎，即可走入迷途而不觉。这是值得我们同志时刻戒惧和互相警惕的。

c、学习问题——首先是理论、政治水平的提高，这是我们终身的事业。其次是在工作中虚心学习，求得行政管理各方面能力的加强。再次则是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工作经验较少的部门。你们应当利用新疆的条件——民族复杂与民平政策^①加以切实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刻了解和发挥六大政策的民平政策，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参考。

.....

5. 内部生活——应以学习(理论的和政治的)、工作(政府政策工作方法等)和生活(思想意识和物质生活等)的研究和检讨为中心。唯因秘密工作关系，会议不应太多，

① 指六大政策中的民族平等政策。

最好每半月一次，会议时间宜短，形式应灵活。外县同志不能到会的可用通信联络（须注意秘密技术）或有机会见面时个别谈话，×〔党〕费必须按月缴纳。有妥便时须将工作概况、内部生活及各同志工作生活情形作成书面报告，连同×〔党〕费经过督办转交我。

寄给你们书报一包（书目另见）、中央指示及方林同志报告提纲共三份，望收到后轮流阅读，加以讨论，但须注意秘密。指示与提纲阅后即自行烧毁。

此信望能配合你们的工作经验及生活情况作一次检讨，并报告给我。

来信用两个信封，内封写：请交蔡直^①先生；外封写：督办亲启。

^① 蔡直系陈潭秋同志的化名。

陈潭秋为新疆局势变化致电中央 提出善后准备意见*

(1942年6月20日)

书记处:

……眼看着形势日益紧迫，顷得报告财厅又以“另有任用”名义，电令黄永清（洛浦税局局长）钱萍（于阗税局局长）郝冰清（校矿税局局长）薛汉鼎（轮台税局局长）及程九柯（阿克苏区财政局付局长）五同志来省，根本未通知我。就现在情势看来，其他外县及迪化工作同志也会陆续调回，潘同恐也不会再回哈密了。航空队兽医班不久也会发生问题。就情形看来，将我们同志全部辞退已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了。我们不是傻瓜，在不能合作的条件下就应当不合作，我们不是绵羊不能让人无辜宰割，……我已去信仁兄^①，索阅关于诬陷胡东及刘子平两人问题的材料，并准备于必要时提出关于诬陷胡刘两人的质问。最后则向仁兄提出全部撤回我们的同志，并用各种形式声明我们退出工作的原因。不过，善后准备急需进行，我意将航空队兽医班的同志派去苏联继续学习，一般工作同志身体好的派到此间苏联办

* 题目为编者所加。

① 指盛世才。

的铁工厂工作(可能的话),较重要的干部及残废病人妇孺则送苏联休养学习工作(一部可派外蒙或东北工作)。还有少数不关轻重的人则给资遣散。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知中央以为如何,盼急指示。

关于整风问题:因材料到的很迟,而且不齐全,直到五月间我才传达,现正积极动员和进行研究中。同志们研究兴趣很高,有些同志在开始转变自己的面貌,我为适应此间特殊环境补充了一篇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的材料,在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来加强气节的教育。

蒋盛间妥协的情形究竟如何,盼能有材料供给。

潭 秋 芻

中央关于盛世才诬我暴动 我准备撤回的指示电*

(1942年7月5日)

谭秋：

督办来电已到，他诬陷苏联及我们同志阴谋暴动。我们决定除督办留下的4人外，其余136人连你在内准备撤回，你可将这些人集中于招待处。因由兰州、西安回来无保障。我们正向远方交涉，向苏联撤退，你们可待命行动。

关于撤回136人事，你可正式通知督办。至于督办诬陷我们，除你知道外，可不必告知其他同志，以免引起愤慨。

书 记 处

* 题目为编者所加。

任弼时为营救陈谭秋等 致周恩来电（节录）

（1943年1月14日）

恩来：

.....

三、迪化^①谭秋处，自去年8月后即断了电讯关系。昨日远方来电称他们均已被捕，除那边设法营救外，并要我们也想办法营救。请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方法。

.....

弼 时

^① 迪化即今之乌鲁木齐。

中央关于向张治中接洽营救我党 在新人员致周恩来、林彪电*

(1943年2月10日)

恩来、林彪：

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140余人的要求。说明这140余人中一部分是在国共合作后盛世才要求我们派去新疆帮他工作的；一部分是在苏联治病回国中途在迪停留的；另一部分是到迪化养病的（其中有些是残废）。这些人是在重庆中央调整与新疆关系时被盛诬加罪名而加以拘捕的。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

即算〔使〕上述要求一时不能实现，但不妨提出备案，作为将来交涉之根据。

书 记 处

* 题目为编者所加。周恩来以及林彪当时均为中共中央派驻重庆的代表。

在新疆监狱中 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节选)

(1946年7月9日)

方志纯

学习概况

(一)自“九·一七”^①后，当时一般情况和我们学习的方针

未入狱前，我们正值整风时，“九·一七”事变后，整风就中断了。被押进牢后，不管法西斯分子把我们关在那一种形式的监狱，不管当时环境和条件如何困难，而我们的学习从来就没有放松和间断过。相反的，我们进到监狱后，就把它变为学校了，并抱定一面斗争一面学习，从学习中来掌握斗争策略从斗争中来学习实际斗争经验的原则，四年来，全体同志就是根据这——方针和原则去组织领导和进行学习的。

^① 指1942年9月17日，新疆军阀盛世才将中共派往新疆工作人员加以软禁的事件。

(二)在盛氏垮台和国民党上台前后，我们所处的情况和学习的内容与方法：

甲，在盛世才垮台前后，我们所处的情况与当时学习的内容和方法（1942年9月17日——1943年4月11日时期）

在“四·一一”^①前，我们还是被分开软禁在以下几个地方：

(1)在八户梁，从“九·一七”陈、毛等同志被请去，接着又请去在新工作的13个同志之后，当时集中在八户梁的男女、老幼尚有百余人，虽然已失去自由，但还是带软禁性的，自己还有大批书籍报纸，有比较安定的环境与许多便利的条件，并有收音机收听国际新闻（当时盛氏把我们软禁后就置之不理），进行集体学习与研究。事变后，就开始组织整个学习，以便在理论、政治和文化上来提高同志们的水平，当时以总学委会为总的领导（此组织在整风时成立的，原有委员7人，此时只剩4人了），以下分3个分学委会，下设学习小组，整个学习的进行就是经过这些组织去推动的。学习小组差不多吸收全体党员与非党员群众参加。学习的内容包括以下各组：中文组、俄文组、党建组、联共党史组、中国问题组、哲学组，各组学习方法根据不同情形采取自修和上课，辅之以漫谈、讨论、作笔记、测验、默写、朗读、写作业方法，各组并有专人负责和指导。

(2)在三角地和第四监狱。此地是一部分在新工作同

^① 指1943年4月11日，新疆军阀盛世才将已被软禁的中共在新人员投入监狱。

志，即在“九·一七”请去的13个同志软禁的地方，其环境与条件同八户梁同志差不多，但是学习组织乃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当时学习主要课目为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和继续研究整风文件。其目的在于加强当时同志的组织观念与整顿个人的思想与意识，而上文化课的人很少。在方法上以自修为主，讨论、测验、漫谈作为辅助，并结合中国革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指南进行研究，中间进行过突击月，完成整风文件之研究，同时个人准备写自传（后因环境所限未遂）。这些同志在三角地为时约4个月，就进到第四监狱硬牢去了。从此整天铁门关锁着，彼此联系非常不易，只在号内进行学习，经打通后学习又开始恢复。其组织则以号为单位，继续研究党史与整风文件（主要联系对工作及个人的思想），还有个别同志学习中国革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俄文、中文、英文和《进一步退两步》。由于各号联系之打通，因此规定了每号□□□研究提纲，各号研究完毕，把研究结论用书面写出来，送各号互相传阅。每日作检讨与总结一次，其时曾专门进行过关于立场、气节及过堂之准备等学习与研究。

（3）在督办公署教导连与刘公馆。此地“九·一七”后为航空队全体同志被软禁的地方，他们完全与我们和外界隔绝，受着严密的封锁与监视。他们大体上当与八户梁、三角地情形相同，学习组织以原来的学习生活指导委员会为指导，学习内容主要是克服内部当时因环境而感不安的情绪，来加强内部的团结和一致，并根据同志需要与要求，进行数学、俄文、物理学、中国革命近代史、新民

主义和业务学习。他们大部分是以自修为主，在某些项目上则采取小先生办法和上课的方式进行，然后进行讨论与测验……到第二监狱与整个同志会合后，才继续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参加各种学习。

(4)在第一监狱。“四·一一”后，在八户梁男子差不多都被捆绑押解在第一监狱，并分别关锁在各号中，监视与看守十分森严，书籍、笔墨、纸张被扣留和禁用，经过各方努力，才把联系渐渐打通，并克服了当时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进行学习，只有以号为单位去组织。在开始时，因苦于没书，就事先由某些同志准备一些所能记忆的东西，如游击战争、党与群众工作、民族问题、军中政治工作、自然科学常识等，作有系统的报告，再来进行漫谈。整理后与各号传阅交换意见，到后(来)有书时各号才正式订立计划，大体上不外联共党史、中国革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哲学、中文、俄文、数学等，除中、俄文外，主要自修、漫谈、讨论，检查只是作为辅助办法。这样的学习一直到第二监狱开门以前为止。在这个中间，也曾抽出时间专门研讨立场、气节和准备过堂的一切对策与方法。

乙，在盛氏垮台前到国民党上台后，我们所处的情况与当时学习内容和方法（1944年——1946年为止）

在这个时期，我们在新所有人员大体上分为两大部分，拘押于以下两个监狱中：

a、女监狱主要在西河坝，后转到七道湾，最后移到第四监狱（这里包括妇女、小孩和残废）的情况与学习。

女监狱从来与男监狱就有些不同，在形式上从来就是带软禁性的，表面上在某些地方可以自由些，并集中于一块（有时也曾强迫分押过），封锁与监视与男狱一样。大部分妇女为1938年以后学生出身之新党员，并有本地妇女群众，（以及）五个残废的老干部，原来的书籍仍然保存着，可以自由阅读和写作。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教育小孩，照顾病人、残废外，如果不学习就别无他事可做，所以当时口号以学习第一，并采取半公开形式组织学干会（3人），根据当时同志们政治文化水平和各人兴趣与需要，组成中国问题组、政治经济学、中文和俄文等组。在学习中多以自修为主，同时也有漫谈、讨论、作笔记、质疑、测验等办法作为辅助。惟有中文则以上课为主。可是从1945年至1946年我们出狱为止，由于国民党已完全控制新疆，开始从政治上向我们作积极地进攻，为了更加有准备有把握打退法西斯分子的进攻，除了经常研究时事，分析当时国内外情况外，并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了三民主义，研究了《过去回忆与目前之估计》、《百子一条心》、《目前形势与我们的对策》等三个文件。研究这些文件后，对于打败法西斯分子进攻起了重大作用。后来法西斯分子为了对我们加紧分化与加深对妇女们的迫害，曾把残废强迫到硬牢去了，以后用“解放”的名义强迫他们到救济院去（条件比许多地方的狱中更坏），然而他们也从未把学习间断过。

b、男监狱的情况与学习（主要是第二监狱东、南、北院和里院）。

在盛氏坍台后一个短时期，整个监狱的管理和看守比

较松一些，因此联系和外面情况之了解比较容易，而拘押在其它监狱的同志也都渐渐集中在第二监狱中来了（此时，航空队全体同志也集中到第二监狱），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实行整个学习总的计划和进行集体研究。这时主要的学习内容，为如何对付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进攻（包括准备过堂口供、气节、立场等），虽然过去曾有过准备，但国民党登台后，有些口供不得不有所改变，求得一致。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研究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时事研究也成了日常的课目，对于《过去回忆与目前之估计》、《目前形势与我们的对策》、《百子一条心》三个文件，曾以比较长久的时间专门研究，并详细讨论。我们自被中央审判团审判之后，学习重心仍然放在政治上（包括党建、时事和对航队同志特殊教育等）。为了更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把所有同志吸收到学习中来，过去在各排、号自动负责的几个同志，就临时组织一个总的委员会（秘密地领导整个学习与生活等事）。特别是各牢房门打开以后（1945年3月间）学习的条件更加便利了，因此，对于时事、中俄文指导、生活管理、文化娱乐之组织、政治之研究、业务之复习等等均设有专人负责。这样就把各种学习都统一和有计划地进行了。在这中间，为了准备航空队独立作战（被迫分散），除了在组织上选择7个同志准备单独负责外，并抽出时间进行了专门的教育（如斗争策略、领导方式与方法、立场气节、如何掌握与分析情况、团结同志、反奸细斗争、组织问题、秘密工作和通讯联络等）。到8月以后，法西斯分子便把过去我们从斗争中得来的一切利益（如白天开号

门，看报，出外看病等）都取消了，并把所有的书都没收，把我们的同志整天关锁起来，重新加紧严密封锁与监视，可是无论法西斯分子怎样，终不能隔断我们各号的联系，只是把广泛的集体学习，变为以号为单位学习罢了。这时除了各号经常举行研究座谈外（包括时事讨论在内），有个别号子还举行过辩证唯物论讲演（讲后写成文，送各号传阅），在政治学习上，经常举行座谈会（如政协决议），每一问题均讨论多次，并分别作出结论出来，使同志们均能掌握当前形势，以应付法西斯之进攻。在文化学习方面，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至于在狱中因病而去养病室休养的同志，对于学习也很积极，对于时事之研究特别重视，还给大家提供了不少的材料。

（三）对于在新四年来狱中学习的估计

由于全体同志自觉努力与有严密的组织、计划和狱中党组织的领导，并且得到同志们热烈的相互帮助与及时克服各种困难和一切不良倾向（拼命主义、娱乐第一，轻视政治学习等），所以在四年学习中，我们是获得了很好成绩的，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白过了这四年，这种成绩，不仅表现同志们在斗争中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心，行动上坚决顽强勇敢和善于对付各种各色的法西斯分子之进攻，而且表现每个同志在理论、政治、文化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一步。这样一方面使我们内部更加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也打下了绝大多数同志以后自学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四年监狱中没有学习，我们将不知落后到什么程度了。四年来，我们与法西斯分子斗争不知遇到了多少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在最困难

最恶劣环境条件下的单独作战，如果没有狱中党组织及时组织大家学习将更难以对付法西斯之进攻。必须指出一点，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各人努力程度、文化水准和环境与条件不同，因此各人所获得的成绩水平就不同，更不可忘记我们在狱中因环境所限，加上本身还存在不少缺点。总比不上牢外同志学习成绩好，在某种程度上说，特别是我们离开国内实际斗争生活太久，又加上长期得不到中央的指示与领导，使我们在政治上工作经验上大大落后了，我们切不可因坐了几年牢就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应该加紧在这一方面补习过来，一致努力，迎头赶上，才能消除个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现象。

(四)在四年监狱中的学习给了我们什么经验教训

我们在四年监狱中的学习，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大的提高了每个同志理论政治文化水平，奠下了每个同志以后继续自学的基础，然而四年学习过程，也给了我们不少经验教训，主要我认为：

1. 打破了一些同志认为除了在学校或工作中学习外，狱中是无法学习，而且不需要的观点。事实证明，狱中的学习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把监狱变为学校的口号，并不是不能实现的。

在任何环境下，只要善于利用时间和挤出时间来（不管时间长短），就可以进行学习，特别是学习与实际联系和从实际斗争中学习。

2. 在任何时候学习必须要有经常性和个人严格计划，并坚决按照一定计划去实行，那怕时间短，进度慢，都不

要紧，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和决心，要想学习任何一种东西，是不会得到很好成绩的。

3. 学习应该有长期打算(特别在狱中)，如果犯急性病，没有计划又没有步骤(什么都要学)，不去估计自己所处环境与条件，就会什么都学不好，结果使身体损坏，使学习中断以至于停止。

4. 一般说，紧张的学习也是坚定信心，消除牢中无原则纠纷的重要条件之一。

总之，在四年狱中学习过程中，我们所定的学习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在学习上能够得到很大成绩，固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但是由于我们能够及时领会和吸收在学习过程中所得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学习上获得很大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系参加新疆监狱斗争同志获释回延安后，由原新疆监狱党支部的同志集体撰写，然后由方志纯同志署名上报中央的，这里节选的是该报告的一部分)

附:

抗战期间中共人员 在新疆工作和斗争大事记

徐 慈 君

1 9 3 7 年

5月 中共中央通过苏联取得新疆边防临时督办盛世才的同意后,电告西路军余部400余人,可去新疆,并派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等五人,由苏联进入新疆迎接。陈云等抵新后,即前往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余部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西路军人员对外称“新兵营”。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新疆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开始。当时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代表。

9月底 邓发(化名方林),由莫斯科到迪化,接替陈云工作。

10月 在迪化南梁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由滕代远负责,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11月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新疆。月底,陈云与王明等同机回到延安。

25日 中共人员徐梦秋(化名孟一鸣)等5人,前往莫斯科治病,经新疆,徐梦秋被留下任省教育厅付厅长职。

12月 “新兵营”领导同志李卓然等6人飞回延安。

月底 中共人员韩光（化名韩明光）从苏联回国，留新疆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传科长。

滕代远等15人，携带武器弹药及医药用品等，离迪化返回延安。

1938年

1月 邓发应盛世才要求，从“新兵营”调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同时调汪小川（化名汪孝春）任“新疆日报”社付社长，同时抽调5人到军医学校学习（两年结业后返回延安）。

2月 毛泽民（化名周彬）到达迪化，被盛世才委任为省财政厅付厅长。沈谷南（化名张奋音）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被留下任迪化女中小学部主任。

3月 新疆航空队开学，中共中央批准陈云关于派员到新疆学习航空的报告，从“新兵营”调25人，从延安派19人，先后进入航空队学习。

邓发应盛世才要求，从“新兵营”抽调潘同（化名潘柏南）任和田区警备司令。

3月至11月间 中共中央应盛世才要求，又从延安先后选调约60名干部分三批到达迪化帮助工作。

4月 徐梦秋、毛泽民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派得力干部支援新疆工作，毛泽东批：“请陈云同志办。”

7月 吉合（化名吉国兴）从莫斯科回国，途经迪化，经邓发决定留于“新兵营”任教。

8月 盛世才出面留下赴苏联治病的中共党员刘西平（化名刘希屏）为哈密区代理行政长。

12月 经盛世才同意，新疆日报社开始公开出售《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

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向盛世才建议，为防止帝国主义者的渗透破坏、保卫边疆，应在新疆西部的蒲犁边卡成立边卡大队。此建议实施后，从“新兵营”调出胡鉴任边卡大队长。

1939年

盛世才政治态度向右转，为了削弱中共在新人员的影响，先后将在迪化工作的黄火青、林基路等10余名中共党员调往外地各区县工作。同时，借故寻衅，接连给汪小川等通报、记过和罚薪处分，致使汪小川无法继续工作，返回延安。

5月中旬 毛泽民因积劳成疾，病情严重，离新赴苏联治病。

曾三去苏联养病，途经迪化，邓发留他在新疆养病。

6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中共中央留他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并负责“新兵营”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工作。此后，陈潭秋化名徐杰，并用蔡直的署名写信与在新疆各区县工作的中共人员联系。

7月至9月 在陈潭秋领导下，“新兵营”人员将所学军事理论结合实战演习，进行野营训练，使“新兵营”全体指战员在政治思想、军事技术上都有很大提高。中共中央军委付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经迪化时，赴“新兵营”野营地视察并向全体指战员讲话，给“新兵营”人员以极大的鼓舞。

9月 邓发返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新疆情况，指出盛世才自称第三独立集团，对我党干部排斥。

陈茵素（化名陈文瑛，林基路之妻）等2人，从延安到迪化。

10月 陈潭秋从“新兵营”选派谢良洪等4人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11月12日 陈潭秋以蔡直署名，给在各区县工作的中共人

员写信，重申党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

月底 中共病残人员谢良等10余人，赴苏治疗，途经新疆，因苏芬战争受阻，留迪化。

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新疆局势未见改善，我在新同志常遭到诬陷控告。

12月22日 在新疆任哈密区教育局长的中共党员祁天民因工作劳累病逝。

1940年

1月 “新兵营”指战员除学习航空、兽医的和一部分干部，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留新继续学习外，其余360余人均离新返回延安。

2月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党员彭仁发在机场工作时，因机械兵违反操作规程，致使彭仁发身受重伤，医治无效而牺牲。

周恩来等一行4人，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时对在当地工作之中共党员讲了话，鼓励大家为了革命的需要，安下心来努力工作和学习。

4月 陈潭秋给在各区县工作的中共党员写信，指出由于新疆特殊的政治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条件所决定，我党沿袭苏联的“三不”^①方针和执行六大政策是必要的。要求党员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和发扬布尔什维克的优良传统。

5月 冯铨、曾三、荆振昌等14人，乘苏联飞机返回延安，陈潭秋到机场送行。

6月至7月 陈潭秋连续两次向中共中央报告新疆的政治形势：一年来盛世才反共日急，在新人员面临着迫害。据此，

^① 指中共党员在新疆工作时，不发展组织，不搞群众运动，不搞群众斗争的政策。

陈潭秋向中央提出了挽救危机之5条建议。陈潭秋还要求中央向苏联提出，由苏联出面将建议内容转达盛世才。5项建议是：

(1)立即停止逮捕并将扣留的各族代表遣回。

(2)重新改组审判委员会(苏联已作公开形式派人参加)彻底清查和清算所谓阴谋暴动案件，揭露(新疆)肃反机关反动阴谋。

(3)彻底改造公安管理处及其整个系统结构并改变工作方式。

(4)切实执行民平政策，实际改善农牧民众生活。

(5)切实培养和提拔各族干部，开展六大政策，民众运动，建立群众基础。

在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因盛世才刁难，无法继续学习，为此，要求陈潭秋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三条请求：1.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2.参加陆战队抗日；3.赴苏参战。

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9月 陈潭秋按周恩来指示，调黄火青返回延安。

10月 陈潭秋电告中共中央：新疆政局恶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形势混乱。

1941年

2月 张子意(化名刘干)等9人从苏联回国，准备赴延，因发生“皖南事变”在新疆受阻，留迪化。

6月 郑亦胜以省财政厅视察员身份，前往南疆各区县视察。陈潭秋趁机捎去给在南疆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一封工作指示信。郑亦胜返迪化时带回各地党员给陈潭秋的报告信，这才得以互通情况。

9月 杨之华(化名杜宇，瞿秋白夫人)等4人由苏联回

国，因前往延安的路线不通遂留迪化。

11月6日 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盛世才背信弃义，日益趋向公开反共，并再次提出挽救新疆危局的七条意见。

12月 林彪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返延时乘机随行的有苏井观等5人。

1942年

3月 盛世才玩弄阴谋手段暗杀了其倾向进步的四弟盛世骥，然后嫁祸于盛世骥的妻子陈秀英及苏联军事顾问。盛世才还伪造了各种“阴谋暴动案”借以嫁祸于苏联领事人员。并且别有用心地让毛泽民参加了对所谓“阿山暴动案”的审讯，因毛泽民对审判结论有不同意见，盛世才竟借题发挥，对毛泽民公开无理指责。盛的反共反苏行动逐步升级越来越公开化了。

5月7日 任弼时给陈潭秋电，提请注意：盛世才、蒋介石的相互勾结。蒋盛已互派代表在兰州谈判。谈判时蒋方代表转达了蒋介石的“只有先解决新疆，才能解决中共”的看法。

同日 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蒋盛勾结详情。

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潭秋，提出：（1）力争与盛世才继续维持统战关系；（2）由于盛对我党人员表示不信任，可撤回一部分人员，但须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取道苏联回延安；（3）我党在新人员回延安前，可暂组成调查研究分局，由陈潭秋任主任，研究大后方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后因形势变化调查研究分局并未开展工作）。

6月8日 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新疆情况日急，盛世才对在新中共人员全部不予信任，频繁调动我党人员工作或给予撤职处理，并拒绝与我见面，对苏联亦表示冷淡，对蒋介石则日益妥协。对此，陈潭秋提出我在新人员，应作好应变准备。

月底陈潭秋又向中共中央致电，告知在新人员不断被盛

世才调动、撤职的情况。为抗议盛迫害我在迪化之工作人员，拟全部自动辞职。同时向党中央报告了我党在新人员参加整风学习的情况，以及根据在新疆的处境，学习中增加了共产党员气节教育的内容以使大家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

航空队学员汪德祥在学习飞行特技时，因飞机失控坠毁而牺牲。

7月5日 中共中央电告陈潭秋，除盛世才提出留下的四人外，其余全部准备撤回。

同月初 蒋介石派朱绍良、翁文灏、毛邦初等乘飞机抵达迪化与盛世才谈判。

蒋盛随即达成协议，具体条款是：（1）加紧反苏防苏；（2）派国民党军队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集中在新中共人员，听候处理；（5）国民党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与外交办事处。

10日 盛世才通知中共在航空队学习人员撤出。陈潭秋获悉这一消息后，遂将我在航空队学习人员移住迪化南梁招待所。

19日 陈潭秋向中共中央告急，请从速决定我党在新人员的行止。

21日 中共中央电告陈潭秋，苏方已派副外长迭卡奴佐赴新调整关系，候其有结果后再定行止。

30日 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成立调查研究组的组织形式与负责人的人选问题。

8月29日 中共在新人员全部集中迪化，继续进行整风学习。鉴于不断恶化的形势，陈潭秋号召大家下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决心，作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9月初 盛世才借口国民党人员来新，在保护我党在新人员安全名义下，将我党人员全部集中至迪化郊外八户梁。

7日 中共中央电告陈潭秋，苏联同意我党在新人员中的首批55人于最近撤入苏联，其余人员亦可继续帮助解决撤退问题。据此，陈潭秋一面与苏联方面协商，拟定分三批撤入苏联的计划；一面教育大家做好多种准备，牢固地树立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观。

9日、10日 陈潭秋连续急电延安：国民党当局即将全面控制新疆，不从速解决撤离问题，后果难测。并向中央报告了第一批撤离之55人的名单。

17日 盛世才以“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软禁，陈潭秋临行前指示，他的工作交由张子意负责，并让吉合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交通站再转告中共中央。下午，盛世才又将林基路等12人“请”走软禁。同日我在新疆航空队学习人员也被全部软禁。

18日 陈潭秋向盛世才提出抗议书。抗议对我党人员的迫害。

在新人员于软禁期间一面不断向盛世才提出抗议，一面抓紧时间学习，准备对敌斗争。

航空队我党学员，在此期间，曾多次派人偷翻高墙，寻找党代表陈潭秋未果。又找苏联军事顾问，请求将此间危急情况转告中共中央，但对方未予置理。

同年 苏联驻哈密红八团撤离返苏。

1943年

1月14日 中共中央始获悉，陈潭秋等在新均已被捕。电告周恩来设法营救。

1月19日 新疆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部。

2月7日 盛世才将陈潭秋等5人投入第二监狱；将林基路等17人投入第四监狱。

8日 被押在第四监狱四号牢房的李宗林等4人，为抗议盛世才的非法逮捕及非人待遇，举行绝食斗争坚持三天，这是新疆监狱前所未有的行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成为在新人员以后开展三次大规模联合绝食斗争的先声。

10日 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要求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说明陈潭秋等系受盛世才邀请去帮助工作的；现被盛诬加罪名拘捕，实属无理，务必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措施使陈潭秋等在新中共党员获释回延。

11日 马明方等35人被投入第一监狱。其后，航空队学员被转移到刘公馆软禁，妇幼病残人员亦被软禁在西河坝。从此，在新人员转入坚持监狱斗争阶段。

3月 林基路在狱中写了《囚徒歌》和《思夫曲》，激昂悲壮。

10日 国民党当局特派“新疆审判团”从重庆乘飞机抵迪化，行前，蒋介石指令对在新中共人员，首要者杀。

3月至5月 “审判团”用酷刑审讯陈潭秋、毛泽民等15名中共人员。还利用叛变投敌分子潘同、刘西平等导演了一场对陈潭秋、毛泽民的所谓“对质审讯”丑剧，除叛徒遭到陈潭秋、毛泽民等严斥外，审判团一无所获。陈潭秋、毛泽民等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义凛然和坚贞不屈。

6月5日 蒋、盛合谋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死刑。

9月 盛世才赴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27日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3人被秘密杀害，三烈士的尸体还被挖出拍照，送蒋介石验证。

10月5日 被关在第四监狱的中共人员，为抗议盛世才的虐待和迫害举行了第一次绝食斗争，坚持6天取得了胜利。

同月 新疆警务当局将押在第四监狱的中共人员转移至第

二监狱。

1944年

2月 关在第一监狱的中共人员也被移至第二监狱。

此时，狱中党组总结了在狱中学习、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斗争口号和“百子一条心”的团结斗争方针，以利于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

7月1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3周年，中共党员李何创作题为《母亲》的诗歌一首，抒发了全体在新中共党员怀念党和延安之情。

8月 敌人把软禁在西河坝的病残、妇孺人员，集中到七道湾女子工厂，强迫做工。

11日 盛世才鉴于新疆将完全由国民党中央势力所统治，以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新形势，又想进行新的政治投机，遂故技重演，以“阴谋暴动案”，将国民党安插在新疆省党部的黄如今等数百人，悉数逮捕入狱，尔后，却向蒋介石报告黄等是共产党人。

月底 国民党当局任命盛世才为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

9月 盛离新赴渝。

10月15日 中共党员吴茂林在狱中患病，因得不到治疗而惨死，女牢为他开了追悼会。

11月6日 新疆警务当局将原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习人员转入第二监狱，他们因此恢复了与狱中党组织中断了两年多的联系。

同月 被软禁在七道湾女子工厂的中共病残人员和妇孺也被投入第四监狱。新疆进步青年组织“新疆共产主义同盟社”通过监狱养病室与狱中中共人员取得了联系。

1945年

1月至3月 国民党派“清理积案审判团”抵迪化，对狱中中共人员进行第一次普遍审讯。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我党人员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月9日和13日 朱旦华、王韵雪、陈茵素三人和杨奋分别写信给“清理积案审判团”，控诉盛世才暴行，要求无罪释放，送回延安。

3月15日 狱中条件日益恶化，我党人员动辄遭到毒打，为抗议非人待遇，遂举行第二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狱方惊呼：“长此羁押，恐非善策。”

4月17日 新疆警务处向省主席吴忠信呈报释放叛徒徐梦秋、潘同、刘西平。

5月 新疆警务当局将张子意等5名病残人员从第四监狱转到第二监狱。第四监狱只剩下妇孺及老弱人员，故被称为女牢。

6月22日 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新疆迎接苏联外交人员时，“视察”了仍被无理关押的中共人员，遭到了强烈的质问。

7月 中共人员乔国桢病逝于狱中，经过说理斗争，才得以安葬。

张子意写《狱中颂》一诗，控诉新疆监狱当局对革命者的摧残，抒发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情怀。

7月至8月 新疆警务当局对中共人员进行了第二次普遍审讯，采取威胁刑讯手段企图强迫他们脱离共产党、八路军，但均以失败告终。新疆第二监狱监狱长侯维城不得不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然结果均执迷不悟。”

8月上、中旬 狱中中共人员为反对迫害，举行第三次绝食斗争。绝食期间，狱方仍对中共人员进行审讯，甚至实行强

制进食，但均告失败，被迫停止审讯。狱方答应部分条件后，中共人员始复食。

26日 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和平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团提出了释放政治犯。

10月14日 张治中受命赴新疆与“三区革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1月下旬 新疆警务当局又对在新中共人员进行第三次普遍审讯，除极少数人外，均立场坚定，抱定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决心，战胜了反动派的阴谋。

1946年

1月 新疆警务当局将第四监狱中病残、妇孺等17名中共人员，转入迪化“救济院”，实与乞丐为伍。这些人便以摆小摊谋生，并将所获薄利，购物帮助狱中同志。

2月 新疆警务当局企图分化瓦解我狱中人员，单独提审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党员7人，使尽挑拨离间、威胁利诱之手段，终未得逞。

3月 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4月4日 张治中再次飞抵迪化。行前，周恩来、邓颖超拜托他关照在新疆关押之中共人员并尽快使这些人获释回延。张治中表示允诺。抵迪化后，张即派屈武等人去看望杨之华等共产党人。

7日 狱中党组织委托杨之华给张治中写信询问释放之事，并要求改善生活。张立即批示改善生活条件，并下令将关押在第四监狱中之中共妇孺、老弱人员也集中到第二监狱。

4月中旬 张治中数次电请蒋介石批准释放关押的中共人员。

5月中旬 蒋复电同意释放中共人员。

21日 中共人员得知释放回延消息后，以“王韵雪”暨全体被押中共人员的名义给张治中写信，提出出狱及平安返延之五条要求。

月底 张治中邀请杨之华等6位代表，共进晚餐，一一回答了代表所提要求，并告之时局不安定，最好速作回延准备，以早日成行。

6月初 中共人员积极准备返延。在“救济院”的谢良等17人，也集中到第二监狱。

5日、6日 《新疆日报》公开登载张治中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及新疆在押之中共人员已奉令获释的报道。张治中还分别电告驻兰州的西北行营及国民党陕西军政当局，要求在中共人员过境时予以接待放行。

10日 新疆中共人员分乘8辆大卡车，在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护送下，从迪化启程，踏上返回延安的征途。行前，狱中党组织决定由高登榜、吉合负责与刘亚哲的联络工作。

月底 车队进入陕境，在西安受到胡宗南阻挠。经党组织决定由高登榜、曹建培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由周子健负责将人员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经多方交涉，十天后始获准放行去延安。

7月8日 车队到达吉家村，朱总司令派代表王甫前来办理接交手续。

11日 中共人员一行除返延途中病逝2人外，129人胜利到达延安，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月底 周恩来致电张治中，除表示谢意外，还询问陈潭秋等20余未回延安人员的下落。

8月6日 延安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在新疆牺牲的林基

路烈士（因陈潭秋、毛泽民是否牺牲的消息，延安还未完全清楚）。

月底 张治中回电周恩来：除陈潭秋、毛泽民等三人下落不明外，其余已先后声明脱党出狱。

8月至10月 中共中央决定，返延人员进行三个月的休整和学习。

10月 狱中党支部，作了四年新疆监狱斗争的总结《在新疆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以方志纯署名交中共中央组织部。

11月 从新疆返延的100余人，分赴全国各地，继续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我的经历事实简述(节选)*

张 治 中

我主持新疆和谈^①成功后，即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后改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末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管辖甘、宁、青、新四省，还兼新疆省主席。赴任时，恩来先生特别嘱托我：“我们在新疆还有不知多少党员同志被盛世才杀害或关禁，请你到新疆后务必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并查明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还存在么？”（按陈潭秋是中共驻新疆代表，毛泽民是新省民政厅长，毛主席的弟弟。）我答应了。我到新疆迪化（现名乌鲁木齐）后，即拟先详查案卷，但无案卷可查，陈潭秋、毛泽民还有些人都被杀害了。于是先后派屈武、党必刚、余湛邦等去监牢看望他们，查明狱里连男孩子们共 130 多人，并告知他们，将释放他们送回延安。他们开始半信半疑，甚至怀疑可能是转移地点另有阴谋，所以要求先从监牢里搬出去住一个时期，并在报上发表消息才能走。我于是请他们先派代表到我的住处商谈。他们派出六位代表，其中有杨之华大姐（当时化名杜宁，1921年和

* 本文系张治中先生1967年8月16日向中央首长所写长信的节选。

① 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同“三区革命”方面代表所进行的和平谈判。

我在上海大学同学)、高登榜等。我略备酒菜,亲自陪同,很为坦白地说了一番话,郑重地说:“我是受了周恩来先生的嘱托,我是他的好友,你们不必怀疑。同时夜长梦多,以出狱上车就走为是”,他们答应回去商量一下。这样,就决定早走快走了。

我于是指派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因为他曾在胡宗南部下工作,人事较熟,算是一个干将,可以胜任。当即选派大汽车十辆,随带医务和警卫人员,并赠送途中每位足够的旅费,一切准备妥当,即由迪化出发。我同时还分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西安胡宗南、祝绍周等,请沿途招待放行,并电知恩来先生。临出发前我还特意交代刘亚哲:这是一次重要而又艰难的政治任务,务须当心谨慎,沿途情况须每日来电话或电报报告。后来果然途中发生了两次问题,有一次是胡宗南预备设陷阱于咸阳,电告咸阳过夜。刘亚哲料必有阴谋,决定冲过咸阳,直开西安。到西安时已夜深,暂在澡堂安顿大家歇下,随即电知我。我立即电胡宗南解说。次日,刘忽然想到中共在西安设有办事处,遂找到中共代表某,把大家移驻办事处,休息了几天,又再起程向延安进发,一直送到距离延安邻近一个村子交代,中共中央已有人在此等候了。

我此时已接朱总司令来电表示谢意。护送人员回程时,朱总司令厚意有所赠与,并带来延安自制黑色毛呢衣料。后来我回南京,董必武先生还特到我家拜访再致谢意。我说:“这没有什么,这在友谊上是应该做的事。”这130多人中,现在都散在各地,就我所知,马明方现任中共中央东

北局第三书记，杨之华现任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其余以在空军为多，都任高级干部。他们为党为国努力，贡献不少。他们由于在党中央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受尽艰苦，历尽煎熬，终于脱离虎口，胜利归来，这是值得敬佩和庆幸的。经得起残酷考验的，不是几个人几十人，而是130多人啊！

难忘的战斗岁月

高 登 榜

1983年9月下旬，我应邀回到阔别41年之久的新疆，参加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在自治区领导王恩茂、铁木尔·达瓦买提等领导同志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当年受中央委派到新疆工作的战友们济济一堂，追忆往事，缅怀先烈，心情格外激动。在乌鲁木齐市，我看望了当年一道在财线工作的老同事、老相识，参观了当年财政厅所在地以及毛泽民同志曾经执教并兼任校长的财专学校旧址，回想在乌鲁木齐市同毛泽民厅长相处的情景。41年前我在乌鲁木齐时，才是25岁的青年人，而这次重访旧地，已是两鬓飞霜、步入古稀之年。寻踪那如烟往事，怎能不为之动情。

(一)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份，我受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同志的委派，担任延长油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矿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迅速解决苏区党中央机关的照明用油和燃料，发展生产，支援前线。1938年夏天，

组织上通知我近期内工作有变动。当时就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的王鹤寿同志找我谈话，说明了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原来，我党应新疆盛世才的要求，从延安抽调文教、财政、新闻、军事、民政等方面的干部分三批入疆，帮助盛世才建设和保卫新疆。经新疆到苏联治病的毛泽民同志被盛世才挽留迪化为其治理财政，担任财政厅长。对组织派往新疆工作的决定我坚决服从，不久动身去新疆。

离开延安前，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找到我，谈到去新疆工作的任务及注意事项，临分手时，他告诉我，毛泽民同志的女儿冒着风险从白区来找父亲刚到延安，有张照片要我带到新疆亲自交给毛泽民，并要我到城隍庙招待所里看看毛泽民的女儿。

从延安到新疆，路途十分遥远。出发前，组织上指定曹建培同志为路上的党支部书记，行政上由我和郑亦胜带队。为了便于联系，我穿着八路军制服，打着武装带，为大家张罗前后。到了西安后，从新疆来接应我们的人还未到，我们就暂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候。组织上决定派曹建培、陈清源二人化装后先离开西安，到伍修权、谢觉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听情况。我们也随后租用一辆商车前往兰州。刚进入兰州城门，我们随身携带的留声机和马列书籍就被国民党检查站扣留了，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我们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当时，担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副官的韩光同志，已来到兰州迎接我们。在办事处我们进行了休息换装，男同志分别穿中山装、西装，有的穿长衫，女同志则换上花旗袍等鲜艳衣服，

记得在换装时，有位同志衣服挂到伍修权同志的煤油灯上，把灯罩掀到地上摔碎了，修权同志急忙说：“天啊，这里可不比西安，打了这个灯罩，三天都买不回来。”引起大家一阵大笑。伍修权同志接着说：“这里条件太差，管不起大家吃饭，请大家随韩光同志去招待所，那里条件好一些。”于是我们搭车来到中苏运输站明园招待所，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三天踏上了前往迪化的征途。

汽车颠簸行进在无边际的戈壁滩上，“出了嘉峪关，两眼泪汪汪”，此时此景，才深刻理解这首古老民谣所表现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劲烈的寒风扑面而来，目睹这飞鸟不落、寸草不长的戈壁滩，心境很沉重，离开革命圣地延安，离开党的怀抱，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心里很不是滋味。汽车昼夜兼程，几个小时不见一个人影，到了夜晚，黄羊出没，在汽车灯光的映射下，一群群黄羊还停下来，好奇地向着汽车探头探脑，有的竟莽撞地一头撞在车灯下。沙丘环立，戈壁滩上一片寂寥，粗犷雄劲的塞外风光和细腻雕琢的内地容貌相比，衬托得十分鲜明。

这一段路途整整走了15天，途中在酒泉休息一天，在哈密休息一天，到了新疆省会所在地迪化（现乌鲁木齐）后，督办公署指定我们住进小南门外的一个两层楼的招待所。由韩光同志负责传递联络。

住下之后，第一件事是填写履历，由督办公署发给每人一张表，说让大家三天内填好，送给盛督办过目。这一听，大家疑虑重重。还未见到党代表邓发同志，对盛世才的底细了解得不多，这样匆匆忙忙地填上表，是否合适？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我说离开延安前才刚刚在中央组织部填了表，还是当面交给王鹤寿同志的，怎么一到迪化，还未见到邓发同志就急于填表呢？陈解虚同志也说：不能填这个表，要填，也得见了邓发同志后再填。

我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韩光同志，第二天，韩光约好时间，让我和曹克屈、郑亦胜同志在南梁一片空地前等候，过了不久，来了一辆小车，在空地上掉转头，我们赶紧上车直接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见到了邓发同志。邓发同大家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大家的情况，告诉我们刚到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关于填表的事，邓发同志说：表还是要填的，不填表就不能在新疆工作，你们的简历表要送给盛世才，他看了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回到招待所后，按照邓发同志意见，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说服大家填表。当时我想，到新疆来是为了工作的，不能为填表把事情给闹翻了，还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每个人都得给自己起个化名，取什么好呢？我想，古训中常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叫“玉成”吧。想妥之后，说给周围的同志们听，大家都说起得好。表格填好送上去后，盛世才一看我的登记表，对邓发说：这高玉成是陕西延安人，从红区来的嘛，我怎能接收呢？邓发同志找到我说：盛督办一看你是陕西延安人，就说人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请人来，这不行。我说，那填哪里好呢？邓发同志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思忖，建议我填兰田，兰田离西安较近，我遵命填上兰田。这一关就算过去了。其他同志也遇上一些小麻烦，马肇嵩（马锐）

和罗乃棠两人年纪较小，盛世才看了表格后说：这两人年纪小了点，还是考虑考虑吧。办法自然是有的，把岁数改一改，多填了几岁，这样便全部通过了。过了几天，招待所奉盛世才之命通知，明早全体到督办公署集中，起先我们以为是盛世才谈话，到那里一看，是个考场，两个人一张桌子，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督办公署的政训处主任李一欧为监考人，考试开始，每人发一大张考卷，李一欧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各位是督办的亲朋好友，今日督办身体欠佳，不能亲自来见大家。现在出些题目，请大家认真作答。我看看题目，有一百多题，诸如“新疆有多少民族？”“六大政策是什么？”“新疆有多少行政区？”等等。题太多，一个上午考不完，中午每人在教室里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考。陈谷音同志就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行不行。他说：我正在考虑。我又埋头坐在一边动脑筋，知道的都已答上了，还有些题目是空白的。出题范围很广：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风土人情等无所不包，尤其是世界历史出题太偏，实在难以作答。我有点发愁了，但又想，你盛世才若欢迎我在新疆工作，我就留下，不欢迎的话我就回延安。这一想，心地坦然起来，伏下头来又审了两遍卷子，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其他同志也相继交卷走出考场。这一天的考试算全部结束。当天晚上，盛世才请客，我们有23人参加，韩光叫我们选两位年纪大的坐在盛世才那一桌去，大家推选出郭春则和我两人。盛世才来了，全副武装。他先讲了话，讲“六大政策”，讲新疆有14个民族、400万人口，要团结，等等。郭春则代表大家说了些感谢的话。

席间，盛世才吩咐经理部的王经理进来，对他说，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迪化，衣着单薄，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每个人买套衣服，等等。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官僚时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盛世才又把我们找去，他在客厅里坐着，把我们一个一个叫进去，当我进去时，他嘿嘿一笑说：“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你就到财税部门去吧。”工作去向就这样定了。我退了出来，回来一打听，这批23人中，有9个人是分到新疆做财税工作的，我是其中一个。

任命很快下来了，我担任喀什区税务局副局长。上任前还得集中学习一段，先是安排到省财政厅各科、室和迪化市税局各科、股实习，同时到财政厅创办的财经学校听课。我当了学习班长。毛泽民同志亲自来上课，分别讲授财政税收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意义，讲授开源节流。我经常把大家的学习情况和想法要求向他反映，同时把同志们对新疆政局的看法汇报给他。听了这些，毛泽民同志沉吟良久，从他深沉的目光和一字一顿的谈话里，我隐隐感觉到要做好财税工作并非容易，尤其是新疆政局，在盛世才的“六大政策”背后，更令人觉得莫测高深！

1939年2月的春节前夕，停放在省政府院内车库的一辆汽车不知何故夜间突然起火，省政府主席李溶出来喊救火。我们闻讯后纷纷赶来，提水桶、端脸盆，把火扑灭了。事发后，盛世才不明不白地记了财政厅长毛泽民一大过。我十分纳闷，省政府汽车着火，这怎么是财政厅长的过错

呢？邓发同志冷冷一笑，说：这是督办的权力，成心找岔子呀。这一年的5月29日，《新疆日报》把督办的“辦”印成“辨”字，虽然报上做了更正，盛世才却“认真”起来，给报社编辑长李宗林记一大过，给副社长汪小川记过罚薪处分，其余的编辑、校对等人员也都受了处分。后来又听到一些同志重新任职的消息，比如，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调阿克苏区任教育局局长，迪化一中校长李云扬调任喀什区教育局任副局长，反帝会秘书长黄火青调阿克苏区任行政长……人事变动频繁，谁也弄不清盛世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实际上这些磨擦，都是盛世才反共阴谋活动的前奏。

(二)

1939年春节过后，我启程到喀什赴任。

喀什地处南疆，是新疆的第二大城市，面积大、人口多，气候温和，但直到30年代后期这里依然文化落后，经济很不发达，虽然也有少数巴依富人家资充盈、骄奢淫逸，广大农牧民生活却是十分贫困。市场上物资匮乏，手工业制品价格也较高。喀什市是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文化历史悠久，位于市中心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是全国著名的文化古迹之一，居住在喀什市内的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兄弟同胞。

喀什税务总局负责管理疏附、疏勒、伽师、英吉沙、巴楚、蒲犁、乌恰、岳普湖等分局的税务工作。总局有一

百多人，设有办公室、税务科、稽查处、庶务科四个部门。工作量最大的要算是每年一次的田赋、牧税征收，任务十分繁重。收田赋时，事先都得组织好临时性的田赋征收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税务局长任副主任，全局动员，各司其职，直至征收工作完成为止。

当时的税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关税，凡是进口物资或出口土特产，都须按量纳税，关税高低根据物品类别确定。

2. 牧税，每年征收一次，根据牧主所养的牛、羊群数量的多少按比例征收。

3. 田赋，根据每户农家种植土地面积的多少、土地的好坏征税，缴纳田赋是以粮食作物形式上交，每年一次。喀什市按照省财政厅有关田赋缴纳章程加以修订，征收粮食以小麦为本位，规定了全区统一税率。上地每亩收税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每年于秋后开征，年底收清。

在这些税中，关税是喀什区税收的重要内容，占的比重相当大。当时苏联有较多的物资从喀什进来，喀什等地也有土特产品出口，如皮毛、棉花、牛马羊等牲畜。居住在喀什的印度商民由塔什库尔干进口的一些商品和出口土产，也征关税。当时全疆关税最多是伊犁，其次是喀什。

喀什税务总局对省财政厅负责，在省财政厅厅长毛泽民同志领导下，切实贯彻了省财政厅颁发的各项指示和规定。为了奖励在税收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也继续延用了一些奖励提成办法。

按规章制度办事，公平合理，不分亲疏，不缺斤短两，

不许打骂纳税农牧民，这是对每个税务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当时对税务人员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1939年3月29日，即我到职后的第二个月，毛泽民就整顿财政、提高财政系统干部素质一事发布通令，其中指出：“在此建设方殷巩固抗战后方之时期，各财政厅及地方税局负有整理财政扩大税收之责，对于各级人选尤不可不特加慎重”。“嗣后任免人员”“应于事前造具详细履历呈报本厅核准后再行委派。”通令强调了财政干部要严格挑选，不允许贪官污吏和敷衍了事者充塞在各级税务部门。这个通令在当时的确很有针对性。喀什税局为保证税收工作顺利进展，也面临着严肃财税纪律、清退贪污失职人员的任务。

刚到局里赴任，便风闻税务科一位姓李的科员有贪污的劣迹，经了解，确有此事，当时岳普湖县的税务人员每月来总局交帐时，会计均不开收据，明目张胆地贪污税款。这位科员是局长李英才的亲戚，屡屡得到庇护，因碍着局长的面，谁也不好作声。有了确凿的事实根据，如何处理？是闭一眼睁一眼，官官相护，还是整顿纪律，以戒效尤？我坚持要严肃处理，但困难不少。刚上任，遇到的不仅是混乱的财政状况，还有顽固、落后的习惯势力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从中作祟。在这时候，正好省里检查团莅临喀什视察，王宝乾任团长、卢玉琳任副团长，他们在喀什视察时听到这一情况，便找了税局核实，在视察工作期间，处理了这一案子。贪污者受到处分，局长李英才也被调回迪化另行任用。通过处理这件事，加强了税收管理，有效地制止了偷税漏税和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对全体税务人员是

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也注意完善各项税收规定，堵塞漏洞。当时一些税务人员外出稽查，常有损公肥私，白吃白拿的事情发生。原来，在税收规定中有一条，对于有偷税漏税的，一经查出，税务人员便可根据其态度、情节以及违法款项多少决定罚款、罚金。被罚的商人往往以好烟好酒、请客送礼来腐蚀拉拢稽查员，以减少被罚款项。有的人经不起这种诱惑，便心安理得从中受贿，变相地坑了公家。为了在管理制度上严格把关，在我的建议下，局务会上规定了收税罚金必须由局长、副局长审定，稽查员无权决定罚金，这样便堵塞了漏洞。同年十一月，继邓发后出任我党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同志给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写信强调：“我们是革命的公务员，是自觉的革命战士……要忠实于自己的职务，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应当把‘忠实’、‘积极’、‘负责’，作为全部公务员的工作作风。”接到这封信后，同志们互相转告、领会学习，本着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精神，更加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财税第一线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动全体税务工作人员对税收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为了使群众在思想上容易接受，我们在宣传中尽量避免空洞的说教，代之老百姓看得见的具体的事实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比如，每年秋天收回的田赋粮储藏在粮仓里，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间青黄不接，农牧民中不少人开始缺粮，这时候开仓平糶，接济缺粮户，平糶粮价比市场粮价要低，这就解决了老百姓粮食不足的难题。又比如，要在新疆发展农、牧、工、商各业，使人

民富裕起来，就必须奖励开垦荒地，保护牲畜繁殖，提高工艺品生产质量，改进交通运输行业等等，这些所需费用很大程度上是从税收中来的，如果我们把税收搞好了，农牧业产量可以迅速增加，市场的繁荣也就能提高农牧民收入。各项税款也将随之增加，这二者互相促进，相互相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为了提高税局全体人员对于税务制度的理解、掌握和执行税收政策的水平，每次局务会上总结工作时，我同其它领导反复强调大家要以身作则、知法守法。税局有些汉族维族青年工作主动性强、遵守制度、同农牧民之间关系比较融洽，下到乡村工作时收效比较大。但也有一些讲话不注意分寸，态度生硬、积极性差的工作人员，在秋后收田赋粮时，不按章程办事，出口不逊，打骂农牧民，或用压斗收粮，变相多收农民的粮食，表现蛮横的吏治作风。对此我很担心，每到收田赋粮的时候，便到各县看看征税情况，听听老百姓的反映，遇到问题当场解决。有一次来到伽师县，遇到伽师分局一位过斗人员同农民争吵，并动手打了这位农民。弄清原因后，我当众向这位农民赔礼道歉，批评了这名收税人员。那位农民见状，气也消了，回家拿了些粮食，补交了田赋粮。伽师税局对此很重视，加强了对税收人员的教育，这种风气以后便收敛了。

(三)

1938年底，正好是回收旧币、推行新元的货币兑换

时期。

盛世才1933年4月掌权，到了1937年这四年中，战乱频频，军事耗资巨大，财政上入不敷出。1935年的财政收入是七亿多两（银票），支出却达十二亿两。为了挽救困顿局面，盛世才靠借纳外债和滥发纸币维持家业，因此陷入了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尴尬境地。当时省财政厅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钞票，不够就印，印了就发，一家钞票印刷厂日夜赶印，纸币如同草纸一样不值钱，吃顿饭要用一迭票子，发工资每人一大捆，谁也顾不得去数。在币制的流通方面也混乱得不可收拾，省府发行五十两一张的省票，喀什自用喀票，伊犁用伊票，一些地区甚至还在使用清币青铜制钱，一些商号也发行竹筒或铁制币。除此之外，还流行天罡、元宝、油布贴等比值不一、五花八门的地方币和卢布、卢比等外币。各种价值不一的钱币互相折顶，混乱使用，致使货币流通紊乱，物价极不稳定，各族民众怨声载道，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旧币不值钱，其信用一落千丈，人民盼望能有所变通。毛泽民同志掌管新疆财政之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改革币制，统一全疆货币，争取全疆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38年9月，毛泽民同志借着召开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机，以库存的黄金白银为保证，通知大家要以此为基础，改两为元，实行新币。新币票面分一元、三元、五元数种。兑换率为省币二千两兑换新币一元，喀票一千六百两兑换新币一元，并规定今后统一以元作为计算单位。

全疆各民族人民吃够了旧币混乱的苦头，俟新币开始兑换之日起，家家户户奔走相告，拿出平时积攒的旧币，一捆一捆地搬到兑换所。为保证兑换工作顺利进行，喀什区的兑换工作由喀什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等单位派人协助工作，发新币、收旧币，工作进展顺利，市场物价也稳定住了。我作为税务局的代表前去参加监督焚烧旧币，一捆捆旧币被拉到疏附县北门外河滩上当众销毁。经过一阶段的紧张工作，散落在喀什区民间的喀票、省票已剩不多，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便基本收拾干净并且废止使用，新币的兑换工作就此结束。看到毛泽民同志制定的财政计划一项项付诸实施，并且得到各民族同胞的衷心拥护时，我心里无比喜悦。

经过以后几年的实践结果证明，新币价值稳定，使用十分方便，发行后五年从未贬值，公众舆论很好。至此，新疆货币终于从混乱不堪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货币流通开始萌现新的转机。

币制改革之后，百姓人称方便，活跃了市场，稳定了物价，社会秩序得到改善。1940年，认购公债的任务下来了。认购公债，这在新疆还是首次，这是非常大胆的创举。毛泽民同志亲自拟定公布了《建设公债条例》，宣传大纲，号召群众和政府通力合作，加速新疆的建设，以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在毛泽民同志的主持下，按全疆400万人口计算，每人一元，预计发行400万元建设公债。接着，《新疆日报》上又发表了毛泽民同志撰写的宣传建设公债作用和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发行公债，有利发展新疆经

济建设，支援抗日前线，巩固后方，提高人民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意义十分重大。当时驻新疆的中共代表陈潭秋同志也指示各地共产党员要做好认购公债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行公债的任务正式下达之后，喀什税局很快行动起来，局领导分头到各县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号召公务人员带头买，动员上层人士、巴依买，并在人民群众中做动员说服工作。由于毛泽民同志主持财政工作时，不尚空谈，言而有信，尤其是实行币制改革，成绩显著，深得人心。由于老百姓平素注意“信用”二字，也就从心底里拥护财政厅发行公债的新措施。虽然认购公债分十年还本付息，百姓仍然踊跃认购。经过几个月努力工作，南疆喀什在认购建设公债中远居首位，比起富庶的伊犁要高出许多，得到财政厅毛泽民厅长的表扬。

(四)

喀什区同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有较长的边防。鸦片战争之后，帝国列强侵入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英帝国主义曾一度从政治、经济上控制南疆大部分地区。30年代后期，英国在喀什仍设有领事馆，一些县里设有代办处、教堂和学校。形形色色的英国人带着商帮往返于国境线上，抗拒中国方面的检查，致使走私情况十分严重。在大批外国商品倾销喀什市场的同时，许多违禁品如军火、鸦片、大麻、鼻烟等被源源不断偷运入喀什，英帝国主义者企图用这些物品毒害中国人民，制造事端，进一

步达到颠覆政府染指中国领土的罪恶目的。在频繁的走私活动中，英国商人获取高额利润，成箱的黄金、宝石和稀有矿藏源源不断地运出边境，落入虎口。要打击这批不法外商的嚣张气焰，必须加强限制并严加查处各种形式的走私活动。

为此，喀什税局配合边防哨卡，加强边卡防守和进出口货物的检查，做了不少工作。从塔什库尔干县城出去，有一条通往印度的小道，这是走私集团来往的主要通道之一。对此，我们税局人员分别组成各个小组，配合边防战士，在这条通道上加强了对行旅商货的盘查，取缔非法活动，大约每天都能查出几起贩毒、贩运军火、走私等案件，轻者照章罚款，重者全部没收，或者连人带物扣压起来进行审讯。

蒲犁边卡的任务较重，那里是主要进出关口。蒲犁税局经常把大批被查获的违禁物品和金银钱物运来喀什市，经喀什区税局查验处理。缉私工作抓了之后，有力地遏制了不法奸商的走私活动，稳定了市场贸易和社会秩序。

当时，喀什城内有十几家商店囤积居奇、偷漏税十分严重，为了牟取暴利，还暗地里参与走私活动。我局稽查员好几次上门收税，刁钻狡猾的商店老板都以种种借口，把稽查员给瞒过了，事后这些奸商得意忘形，欺行霸市更加严重。局里对此早有察觉，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和张同智局长商量，着手调查摸底，在老百姓的协助下，弄清了这些大商店进出货的途径和走私的情况。然后，派出部分稽查员，来到市区商店、出示证据，对这批胆大妄为的

奸商以沉重打击。经过几天的稽查，查封了一批秘密仓库，缴获了大量违禁品，在人证物证面前，这些老板们低头认罪，再也抖不起威风来了。

连续几天在市里整顿，处理几个奸商，教育了一大批中小商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实际上也是一场生动的税务政策的宣传教育。

喀什有两项大的税收，即田赋、牧税。执行起来，收牧税远比收田赋困难得多。喀什地域广，牲畜分散，一年一度的税收开始时，税局工作人员要到牧民的牲口圈里查点牲口数目，工作量很大。有的牧民往往在税收前夜，偷偷转移部分羊只和牛马，以减少纳税，各地都发生过这类事情。1940年财政厅颁发《征收牧税奖惩条例》，其中几条很受欢迎，比如其中规定了“对于储足冬草、搭盖圈棚保养羊只好的牧民，减免部分牧税”，“对于农民耕地使用的牛马减免牧税”，“对隐匿羊只偷税漏税的要予以惩罚”等等。当时，区、县在征收牧税时统一规定的税率是：牲税由购买人从价征收6%，屠宰税由营业人按宰杀牲畜重量，按平均价征收6%，牧税按折中价，大畜马、牛、骆驼、骡、驴征收3%，小畜羊、山羊征收5%，等等，这些规定重新明确后，全区按一个尺度地照此执行。

为了做好收缴牧税工作，我和张同智等人合计，由区税局出面，举办牧税人员训练班，选择过去曾参加牧税征收、有经验的人员以及本年度准备派去收税的人员编组进行培训。培训期满，便委派这批人员下到乡村开展工作。我们还拟定了征收牧税宣传大纲，并翻译成维文，由区行

政公署发至各县税务局牧税组，转发乡绅、阿訇头目等，以促进牧税工作进行。

(五)

生活在他乡异土，和少数民族同胞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刚开始我对喀什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民情习俗、语言交流等等很是生疏，特别是语言。平时在机关上班，有翻译协助处理公务，十分方便，一旦离开翻译，出门买东西，下班串门聊天，在民族同胞中就得借助手势说明问题，语言障碍很大。为了使工作和生活更加方便自如，我努力学习维吾尔族语言，渐渐地能说一些少数民族的常用语，一些比较难的话虽然说不出来，但能心领神会。喀什区群众对内地来的干部是信赖的，在喀什四年，我们广泛接触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认真贯彻六大政策，宣传抗日主张，为新疆各民族人民做好事，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扩大了党在新疆的影响。人民群众把我们看作自己的亲人，逢年过节，总不会忘记我们内地来的几位同志，经常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表达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税务局里有一位同事结婚，新郎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一些，请我去当主婚人，盛情难却。我也认真地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为他们主持婚礼，祝愿新郎新娘美满幸福、白头到老。街坊亲友，对此十分高兴，大家说我这个主婚人能关心体贴群众，不摆官架子。有一年秋天，喀什区举办全区教育系统运动会，当时喀什区的体育器材设

备还很贫乏，运动场地简陋，群众性体育运动很少开展，这样的运动会对学生和农牧民却是很有吸引力的。运动会的第一天，喀什警备司令兼行政长官蒋有芬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随后是赛马和田径项目的预赛，搞得生龙活虎，热火朝天。李云扬是操办运动会的主持人之一，因为我负责财税，他提名要我当运动会奖品部副部长，负责运动会的筹备和分发奖品，前后忙了好几天。现在回想起师生一道在运动场上奔逐夺标、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在场外欢声笑语的情景时，仍是历历在目。

盛世才素来疑心很重，害怕和嫉恨民族间兄弟般的友谊和联系，以及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威望的不断提高，因此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找岔子。前面提到的记大过，免职降薪是一个办法，频繁调动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从北疆调到南疆，从总局调到县局，从这个系统调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系统，把原有的群众基础拆掉，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盛世才一旦对某个人不放心，还可以随便扣上“英帝国主义走狗”或“亲苏反动分子”的高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逮捕入狱。他还经常使用秘密逮捕、囚禁以至暗中处决的办法来清除所谓的“异己分子”，大批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就这样失踪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杜重远，曾于1937年、1938年两次来新疆，他怀有报国之心，满腔热情地为巩固、建设抗战大后方做贡献。他受聘为新疆学院院长之后，积极开展工作，联系各阶层人士，宣传抗日主张，在新疆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盛世才满腹狐疑，开始动用他操纵的特务系统在学院门口开店铺、摆烟摊，监视杜重远的行动

往来，并收买学生每周书面报告杜重远的言行。在重重压力之下，杜重远先生只好辞职在家休养，为了表明心迹，他亦曾数度致书盛世才。但盛世才打击异己力量，摧残进步势力的手段是十分卑劣的，为了把杜重远置于死地，捏造了所谓杜重远受汪精卫之命在新疆进行阴谋组织，联合各族反政府分子阴谋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等等罪名，逮捕了这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最终惨死在盛世才的屠刀之下。喀什区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后来也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割去舌头，活活整死。盛世才迫害进步力量的邪恶用心以及残暴伎俩，罄竹难书。在盛世才执政期间，每逢年过节，多少百姓人家泪流满面，思念着被盛世才关押在狱中的亲人。

喀什税局有一位副局长是维吾尔族人，他一家妻小就住在城外的一个花园里头，我到喀什不久的一个晚上，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时，突然外面人声嘈杂，传来恶狠狠的敲门声。开始我以为是公安局的人来搜查，赶紧把书藏好。开了门，进来的是几名凶神恶煞的便衣，一看我是汉族人，连连说弄错了，扭头就走。结果第二天刚一上班我就看到这位维吾尔族副局长的家属站在院子里哭泣，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副局长昨天晚上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了。这件事使全局上下人心惶惶，深感自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我也受很大触动，立即给邓发同志写信，把南疆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汇报，信中流露出这里有人人自危和“白色恐怖”之感。信是托人带去的。后来，当1942年盛世才把我逮捕后，审讯时就追问我，“有没有说过‘白色恐怖’的话。”

不愉快的事情相继发生，不久，便风传盛世才收到一封信，内称从延安来的共产党员中，担任蒲犁县县长的许亮同志和喀什区蒲犁边卡大队长胡鉴同志有矛盾，信中又“揭发”了所谓问题。许亮和胡鉴同在蒲犁工作，并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有意思的是，盛督办对这封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匿名信奉为至宝，指令要彻底追查，他亲自电令喀什区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负责查清这件事，并特地点名要高玉成参加调查组。蒋奉命组成四人调查组，即蒋有芬的一位副官、区公安局一人、行署一位科长，加上我，共四人。调查组由蒋的副官具体负责。当时我处的位置，一方面得按照盛世才的意见参加调查，一方面又得维护事实、主持公道。因此，我积极在调查组中做工作，在调查组开会时，我摆出事实，反驳所谓许胡矛盾的无稽之谈，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这是一个圈套。这是盛世才的嫡系部队——公安系统的某些人一手操纵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诬告延安来的同志自相不和，然后又让延安来的同志自己审问自己，按照他们设下的圈套往下走，这是盛世才一箭双雕的恶毒阴谋。调查了几天，我们见到了所谓的“证人”，这是县公安局的职员，他一开口便信口雌黄地说了一通胡编乱造的许胡矛盾的“事实”，这些谎言都是盛世才在公安系统的爪牙事先安排的。如何编造，如何应答，则由该县公安局长一手操纵。我揪住其中自相矛盾的破绽，层层批驳，问得他哑口无言。其余的证人，有不少是在公安局的刑罚和引诱下昧着良心说话的。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们无言以对，各种诽谤和捏造破

绽百出，这出由县公安局长一手导演的闹剧只得狼狈收场。调查结束时，得整理一份调查报告上报蒋有芬，这个报告如何写还有争议，区公安局的代表不甘心就此了结还想横生枝节，但调查报告必须按多数人的意见来写。区公安局的代表无可奈何，也只得在报告上签了名。终使想坐收渔利、等着看笑话的盛世才一无所得。事后我暗自庆幸在这场较量中能沉着应战，保护了自己的同志，避免了一场不该发生的冤案。

(六)

1942年2月，盛世才发出调令，调我去阿克苏区沙雅县税务局任局长。接到命令后，我登门辞别了合作共事四年之久的同事、朋友和民族同胞，依依不舍地离开喀什，前往沙雅县。同喀什相比，沙雅财政经济、生产方式更为落后，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县税务局设在一个简陋的小院里，一进门是三间并排的小屋。几张办公桌，几个木头柜，这就是县税局的全部家产。草草安置下来后，我顾不得休息，开始逐个谈话，了解该县几年来税收情况。面带菜色的科室人员则忧心忡忡地向我摆出工作中遇到的一大堆困难。当时，全疆的财政税收状况从紊乱中趋向平衡，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在沙雅这个只有四万人口的穷县，税收上却弊端频生。早在1932年，就把除了关税以外的各项税收，一律改行包税制度，而这包税主要是由一些官吏富豪承包，执行之后，包税人从中作弊，公开贪污，已成了普遍现象，

政府靠这些税头收税，漏洞百出，威信严重下跌。到了盛世才上台后，虽然取消了包税制，设立了税收提成办法，但仍然未能真正取消包税制。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税收提成办法，各地税收名目繁多，增设名堂五花八门。人民生活拮据，负担沉重。这些不合理税收的存在，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上任伊始，我先做一番调查研究，听完税局以往工作的汇报后，我带上一、两个人，下到各个乡村里走一走，实地了解情况。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基本上走遍全县各个乡村，对该县农牧民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沙雅人民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加上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税收不尽合理，百姓怨言很多，对税局工作也有不少指责。摸清情况后，我就开始考虑哪些税该收，哪些税可以减少，哪些税应该取消，做到合情合理，上不亏公，下不累民，使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在税务会上，我提出了在执行省财政厅财税政策的同时，要照顾各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大家合理负担税额。改变过去不管资本大小，税额一样的牌照税收法，实行核实资本，按比例征收。牧税也改为按牲畜数量多少、大小、牧场好坏分级征收。这个办法在实践中推开之后，符合每户农牧民的实际情况，照顾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农牧民的拥护和欢迎。

沙雅的盐碱地多达几万亩，春时辛勤耕种，秋时仍然颗粒无收，只能听其自然，长出青草来放牧牲畜。象这类田地，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虽然不能种植庄稼，每年秋天却要征交田赋，这样做很不合理。按照毛泽民同志财税

思想，象这类颗粒无收的盐碱地，是应该免交田赋的。因为早在1940年，毛泽民厅长就在他亲自草拟后来公布的一个通令中，通令申明了为改善人民生活，绝不愿民众负担太重等一系列主张。具体来说，即：对于因天灾欠收的地区，要实行田赋额粮豁免；为鼓励合理的个体经营贩运，要对行商的贩运牌照税实行订定核减；为稳定社会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禁止以各种形式向民众募捐、派款。其它各种不合理的税收，在毛泽民主持财政工作期间，也都一一得到修正和废除。所以根据毛泽民同志上述思想，面对沙雅县盐碱地比比皆是的具体情况，我提出了减少额粮，免去百姓拖累的建议，经县政务会上讨论通过行文报告省厅，很快得到批示，认为“准予照办，以示体恤。”批示一下我们立即通知全县，按此执行，除去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立夏过后，又到了征收牧税的时候。这一年，政治风云动荡不定，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多次逼着盛世才限期还债，债务又必须用实物偿还，盛世才穷途末路，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对以实物偿还一事表示同意。这一年的牧税征收同往年不一样，不收纸币，而必须用牛皮、羊皮、马皮等实物代之。这不单单是给税收带来新的麻烦，对全县农牧民来说更是一个灾难。

六、七月份，我和税务局同事冒着烈日分别到乡下了解牧民纳税情况。一到乡村，看到老百姓流着眼泪宰杀牛羊，不少维吾尔族妇女痛哭失声，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哭诉：老天爷啊，大热天宰杀这么多羊，吃不完就要烂掉，这样下去老百姓怎么活啊！又走了几个乡，情况都差不多，看

到百姓们呼天唤地的惨状，我心急如焚。回到局里，马上通知正在各村收税的工作人员回局里开会，研究如何改变目前这种收税状况。按照原来规定，每户养羊在二十头以上的须缴纳羊皮若干张，按此比例，对于养羊在数百上千只以上的牧民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我想，每户按养羊多少确定交纳皮数，这是一条死杠杠，没有灵活的余地，但如果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这个变通的办法在局务会上通过了，但执行起来就有户头多税票不够的问题，我当机立断，决定自刻自印税票，然后报请财政厅备案。当时心想，你盛督办视民众财产如草芥，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财产蒙受这样大的损失，事到如今，我只能先斩后奏了，你同意最好，不同意也只能这么办了。要处分就处分我吧。票一印出，立即按数下发。这样，牧民只杀了很少量的羊、马、牛，欣喜若狂的牧民在赤日炎炎之下大喊“胡达、胡达！”（青天的意思）他们奔走相告，感谢税局帮助他们减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

在短短几个月内，税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秋天的粮食收上来后，我们立即组织力量对旧仓库进行了维修，原有的仓库不够使用，我们又建了新仓库。为了防止偷税漏税，我们在远离县城的几处出产皮毛多又连接毗邻县境的要道上增设了关卡，加强税收管理。这一年的秋天，在税局的主持下还开辟了新的粮食市场和屠宰场，大大方便了群众。

除本职工作外，我也抓紧时间广交朋友，白天在翻译协助下处理事情，下班后翻译回家，我就一个人住在办公

室，傍晚有空出来串门，用自己学的维语同民族同胞交谈。当时，沙雅老百姓私下议论几起公安局滥施酷刑、老百姓屈打成招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问题。县公安局长是个东北人，早年参加抗日联军，斗争失败后转赴苏联，从莫斯科回到迪化后，分配来这里任职。一天晚上，我在屋子里哼起《松花江上》这首歌，这位公安局长在屋门口听见了，不禁敲门进来，他问，“老高啊，我已经听了好久了，有歌词吗？给我一张。”我给了他一份，俩人便一起唱起来，他流亡多年，家破人亡，一唱这歌，眼泪直流。谈起过去的流亡生活和不幸遭遇，说到目前的工作，我便劝他对待老百姓要秉公办事，不要随便打骂群众，要做对得起大家的事情。他都一一表示接受，以后，公安局无端欺负百姓的事情减少了许多。

1941年，世界风云急遽变化，德国法西斯的战火蔓延欧洲，苏联形势日告危急。国内，抗日战争正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日、蒋、汪联合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妄图一举扑灭革命力量。善于观测风向、精于投机钻营的盛世才一反常态，开始对我党在新人员进行限制、刁难和打击，1939年邓发同志走了以后，盛世才的反动本性逐步暴露，新疆形势逐渐逆转。首先是财政厅厅长毛泽民同志在1941年7月调任民政厅厅长。1942年5月9日乌什县县长林基路调到省里，一去便音信全无。同年6月以后，从延安来的程九柯、陈清源等同志一个个先后调回省里“另有任用”。这一年的11月，盛世才突然来了命令，要我去职回省“另有任用”，接到电报后，我把事情移交清楚，登门向各位同

事辞行。16日这一天，我早早便动身经库车去迪化，大清早，县长、副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邮政局长等县政机关负责人和部分县政务委员以及街道居民，农牧民等一二百人骑着马、坐着马车前来送行。在沙雅的时间前后虽不到一年，但同这里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同事的信任和支持，我心里感慨万千。同大家依依不舍，握手话别后我只身一人乘车直赴迪化，到库车时，我发现有人暗中在跟踪，联想到我党很多同志到了省里“另有任用”便一去不复返，知道情况不妙，思想上已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车到迪化后，在八户梁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个便衣模样的人截住车后在下面喊我的名字，说是奉督办的命令在这里给我找到了住处。我下了车，在南门外一个客棧登记住下了，整个夜晚，周围总有几个可疑的人在活动。第二天清早我到督办公署报到，承启官出来接待，要我稍坐片刻，他转身进去向盛世才报告。一会儿，承启官一溜小跑出来说，督办身体不好，不能见，他指示我送你去一个地方休息。待我坐上一辆小汽车后，发现后座上已坐着一个军人，窗帘也已被全部拉上。车驶到三角地，黑漆漆的大门一开，全副武装的士兵蓦然出现在眼前，进去后我才知道从延安来的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陈清源、胡鉴、白大方等大批同志都被软禁在这里，人身自由已被全部剥夺了。与此同时，盛世才也对新疆的革命青年、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肆逮捕、囚禁和屠杀，为了实现他们的反共罪恶阴谋，盛世才肆意捏造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作为迫害我党人员的口实，自此我党全体

在新人员身陷囹圄，开始了一场为期四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

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我党赴新人员坚贞不屈、光明磊落，不向恶势力低头、坚持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持真理的高尚革命气节。1946年6月，经过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长期多方营救，新任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宣布对长期羁押新疆监狱的中共人员，给予无条件释放集体出狱，随即派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重回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回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这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为了新疆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他们殚精竭虑，英勇捐躯。历史是由人民来谱写的，这些为着人民的利益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虽死犹生、浩气长存，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深深缅怀。那些倒行逆施、以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不管是怎样地显赫一时，终究要被历史所唾弃，这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辩证法。

自1946年离开新疆，到现在已经41年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同胞兄弟团结协作，开发和建设新疆，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我预祝新疆的未来更加繁荣昌盛，如花似锦，各民族同胞亲密合作，创造更加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新疆监狱斗争中的通讯联络工作

刘 护 平

为尽快与关在其他号子的同志们取得联系，我同李握如商量。我说：“我俩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直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在这场特殊的对敌斗争中，我们应主动把通讯联络工作担负起来”。李握如立即赞同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怎样进行具体的联络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开始时我们先设法与关在隔壁的秦化龙等同志联络，方法是用碗的底部扣在墙上，对着碗喊话，隔壁听见了，将碗反扣，耳朵对着碗底，听得比较清楚。但由于这个方法声音较大，易被看守发觉，只好放弃了。

后来我们又从木床上拆下一根木条，用牙齿咬尖，对着土墙的角缝一点一点地钻，当天就钻了一个小洞。为避免敌人发现，仍用泥团堵死。有一天“放风”时，我发现院子里有一把在沙漠上生长的“节节棍”的枝条编成的扫帚。这种植物枝条又细又长可以用它来从小洞中传递条子。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李握如。他乘看守不注意时，迅速抽下几枝“节节棍”插在裤腿里，带回牢房，插在铺板底下的缝隙中。

当时看守每天发给每个号子一根点着的土香，李握如

撕下自己的一块破衬衣，同牢房的郭春则再用烧黑的香火头在布上简单地写上我们的一些意见，然后卷在细长的“节节棍”上，从小洞里伸过去。从此我们就与隔壁的同志们建立起了安全可靠的联络。

衬衣毕竟有限，而且又不能反复书写。我们入狱时所有的衣物、财产、书籍又都被狱方查封，放在监狱的库房里。每月每个号子只能去取一次换洗的衣服。一次，我们利用取换洗衣服的机会，由李握如主动与监管员拉话，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则在开箱取衣时，迅速地将我的刮胡刀和所有铅笔，以及部分纸张塞进内衣和鞋里带回号子。这样通讯联络所必须的东西就解决了。这个方法以后也为其他号子的同志们所采用。

但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怎样通过一个联络点使其他所有号子的同志们都能互相建立联系？我和李握如、郭春则三人经过多次观察、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各个号子轮流放风，院子里的厕所是唯一的所有同志都可以去的地方，在那里建立通讯联络中心是最为合适的了。但这个想法以及具体联络的方法，必须使每个号子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就将通讯地点及具体方法写在小纸条上，揉成小团，乘放风倒尿桶路过其他号子门口时，由身高手长的李握如寻找机会，乘敌人不注意时，扔进关押我们同志的牢房（从门上的小铁窗扔进去）。联络的具体方法就是各号子的同志，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当轮流放风上厕所时，把材料反粘在茅坑的踏板反面，各号子按指定的蹲坑放材料。下面是很深的粪坑，臭气熏得眼睛都难睁开，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眼皮底下，我们竟能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我们的联络通讯点。

不久，敌人把我们四个人（刘护平、李握如、郭春则、杨南桂）转押到后院一个原先关羊的房子里。那里又臭又脏，空气混浊，地上的羊粪足有几寸厚。除我们四人外，还有三个少数民族群众，一个盛世才军队里的连长，共八个人关在一起。我们四人为便于商量问题，就睡在进门后靠右边的一个角落。

在后院里，也有三个号子关押着我们的同志。我们又用在厕所建立的通讯点与马明方等同志联络上了。这样，我们在第一监狱八个号子里的38位同志，就通过联络点，紧密的团结起来。在恶劣的环境下，步调一致地开始了新的斗争。

我们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以及从苏联学习回国途经新疆的同志和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同志包括家属孩子，共100余人被敌人先后分三批非法逮捕，分别关在第一、第四监狱等处，彼此之间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有一天，和我们关在一起的那个盛世才手下的连长，叫尹玉衡，无意中透露出：管辖所有监狱的新疆警务处在西河坝设置了一所“养病室”（也是监狱性质），专门关押各个监狱被打伤致残的人以及重病号，名义上给他们“治疗”。“养病室”关着100多人，几乎每天都死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认为那里可能会关有我们的同志，这是一个唯一能够打听其它同志消息的地方。经我们反复商量以后，决定由我设法去“养病室”打听消息。于是，我就开始“生病”。第

一次装病，因为查出来我没发烧而失败了。在认真的总结经验之后，我就悄悄的绝食了。蓬首垢面，两天之后身体就明显的虚弱了。我用毛巾把头缠住，第三天放风一开门，我就一个跟头栽在地上“昏”了过去。李握如、郭春则两同志立即大声喊起来“不行了”“要死人了”“赶快救命啊”，同号子的其他人这时也随声大喊（经过我们大量的宣传教育，同号的其他五个人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监狱员一见，赶快报告姓陈的看守所长。半小时以后，来了一辆被蓬布遮得严严实实的马拉囚车，把我押往西河坝的“养病室”。到了“养病室”，我被监禁在太平间里。由于两天没进食，太平间又阴又冷，我真的病了。在“养病”期间，我果然发现了第二批被捕的李宗林、胡鉴和乔国帙。乔国帙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卧床，李宗林则因患有癫痫病，敌人对他的限制较松，允许他在门口附近走动。他与我联系时是直接让工犯（未判刑而罚作苦工的人）送饭时把纸条传给我，这种方法十分危险。接上头后，我将在第一监狱里使用的联络方法，转告给他们。

不久李宗林又告诉我申玲也转押到“养病室”来了。她神经不大正常，有时疯颠颠颠，要我鼓励她。我写了一张条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要求她振作精神，奋发起来，坚持斗争。条子通过李宗林转交给了她。

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第二批被捕的同志17人被严密监禁在敌人的第四监狱，但他们也不知道毛泽民、陈潭秋及航空队等第一批被捕的同志和家属小孩、残废同志关在哪里。半个月之后，我又被押回第一监狱，我向同志们汇报

了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没有多久，新疆警务当局便将我们第一监狱的38位同志和第四监狱的17位同志，一起集中关押到第二监狱。

第二监狱的牢房共分东、北、西三排，每排十个号子。原在第四监狱的同志大部分关在西排的号子里，而我们第三批被捕的38人分别关在东排与西排的号子里。我关在东排，4个人一间，西排关的人最多，8人至9人关一间。环境变了，建立联络又成为一个新问题。经我与李握如商量，又想出一个办法，东排与北排两个厕所都紧靠在监狱中的东北角，两个厕所中间只隔着一堵砖墙，但两米高左右的地方有一根木梁，木梁和墙之间有一定的缝隙。墙那边就是北排的厕所，彼此可以从缝中传递东西。我们号中由李握如负责联络，北排则由于村负责。

随着狱中斗争的深入和狱中通讯联络工作的开展，我们认识到积极争取同情我们的看守，为我们传递消息是建立和搞好狱中通讯联络的重要手段。早在我们入狱后不久，就发现管我们几个号子的一个姓王的看守比较老实。经过留心观察和试探，发现此人确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思想，对我们比较同情。我们决定做他的工作，争取他为我们服务。在他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东北人，出身贫苦。东北沦陷后，生活没有着落，就当东北军，以后部队被日寇追击，逃入苏联国境被缴械送到迪化，后来又当了监狱的看守。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抓住他的思想状况，向他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我们

还在生活上照顾他体贴他，帮他打毛衣，送给他一些钱和衣物。就这样，我们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和同情，表示愿为我们做事。在以后漫长的监狱斗争生活中，王看守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经常为我们传递消息，告诉我们狱内外的情况。此外，他还经常悄悄地给我们找来一些报纸，除《新疆日报》外，还有《新华日报》。因此，我们不仅能及时了解时局，而且能及时了解狱中情况，掌握狱方的动向，指导狱中的斗争。由于有王看守的帮助，使我们狱中的通讯联络工作越搞越好。

1944年4月初的一个深夜，西排突然响起一片吵闹声，其中夹杂着看守们禁止喊叫的吆喝声，我们都被惊醒了，大家一致认为一定是关进了新的囚徒。第二天天刚亮，我们站在炕上透过门上的小铁窗，对着走廊的门口使劲地张望。我们号子，经过仔细观察和辨认，新关进来的正是我们曾千方百计想取得联系的航空队的同志们。安志敏等航空队同志的牢房正对着我们的号子。看见了分别两年多的同志，大家心里非常激动，当即写条子询问他们这两年多来关在什么地方，同志们身体是否都好等。写好后将条子塞进一根羊骨头的骨髓洞中，两头堵死放在一个装豆腐乳的小罐里封好，让王看守转送给他们。航空队的同志们看过条子，再把这两年多的遭遇写在小纸条上，经过王看守带回传给我们，我们又从通讯点把航空队同志的消息分别传给关在东排和北排的同志，并且建议各号的同志写信慰问，鼓励他们。这些条子最后又统一由我们传送给西排新来的航空队同志们。至此我们先后分三批被捕的同志都集中关

押于一处，并彼此取得了联系。

就在我们的同志被集中关押后不久，传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被敌人用黄表纸沾水糊住鼻口窒息残害而死（解放后查明，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指使张思信等刽子手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同志用绳索勒死）。噩耗传来，各个号子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囚徒歌》，深切地哀悼烈士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紧密地加强团结，决心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

在航空队的同志们到来前两天，监狱当局在东排、北排、西排门口的右边赶修起二米高的围墙，围成一个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给我们放风用。企图把我们先来的同志和后来的航空队同志隔离开来，但狱方的这种手段也不顶用。我们除了通过王看守建立联系外，还在放风时间把小纸条包在泥巴里，以咳嗽声为号，互相扔到对方放风的院中。同志们风趣地称这种投递方法为“航空邮寄”。

新疆每年10月10日左右开始下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年4月12日左右。在冬季，狱方以为只要用围墙把我们隔开，再把门一关就万事大吉了，所以，看守们经常一起溜到监房走廊里去烤火，放松了对我们的监视，我们便利用机会巧妙而大胆地互相进行联系。同时，我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避免使我们的联络工作遭到破坏。我们严格的规定，每个号中必须指定一个最为可靠的同志担负至关重要的通讯联络工作。

将狱中各排牢房间通讯工作打通后，我于同年六、七

月间又设法到了“养病室”，去探听消息。在“养病室”我同赖方槐同号，并与李宗林取得了联系。但他仍不知道张子意同志关在什么地方。当时李何也在“养病室”，我要他写了一篇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文章，好带回给监狱的所有同志传阅。李宗林听说狱中的同志们准备进行绝食斗争，提出不要轻易行动。乔国栋同志也有此意见。他们过去从事革命工作都曾坐过敌人的监狱，也进行过绝食斗争，有一定的经验。他们认为同志们狱中的生活条件很差，环境恶劣，应该慎重考虑。我回到狱中向同志们转告了他们的意见，但狱中同志们已作了绝食的动员工作，绝食已是势在必行了。我们只好与狱中几个核心的同志（有的同志称为支部）共同参与领导了这场绝食斗争。斗争的结果虽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但同志们的身体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这次绝食斗争后，狱方被迫同意我们有病可去省医院看病。

大约在1944年10月底，我和李握如获准去省医院看病。在那里我们意外的发现了女牢的小熊（熊梅影）。李握如立即机警地同监视我们看病的看守攀谈，我乘机同小熊联系约定：每星期三、六上午九时来看病，互相传递材料。万一敌人把我们看病时间错开，便从女厕所踏板孔下的指定地点取放材料。回到狱中后，李握如和我把已同小熊取得联系的情况转告了所有的同志，各号和凡有家属的同志纷纷写信，鼓励和安慰女牢的同志，这些信件统一转到我们号，由李握如和我转交出去了。我记得方志纯在给张子意的条子中写道“狱中的情况由老彭（即我在狱中的化名）转告你”。我们号中的同志还把狱中三年来同志们的情

况以及与敌人斗争的情况写成一个汇报材料，分几次转给了张子意同志，并要求他根据狱中的情况，在条件可能时分别写些有关斗争方面的指导性文章，给我们狱中的同志们传阅进行教育。我和李握如先后通过小熊收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争取失足者，回头是岸》、《百子一条心》等文章，经我们再传给了同志们。以后狱方改变了我们去看病的时间，我即按原来与小熊约定的方法，把材料反贴在女厕所的指定地点，但他们一直没有去取，也许是对这种联络方法不熟悉没经验的缘故。1945年4月间，我又到“养病室”治病（因在长征时吃草根树皮得了胃溃疡，加上在敌人监狱里吃的一直是发霉变质的臭发糕，又经过绝食斗争，我患有严重的胃病，在看守门眼里我是一个老病号了）。这次我和乔国桢关在一起，有一天意外地听见“养病室”隔壁院子里传来独伊同志唱歌的声音。原来张子意与家属孩子们就关在西河坝“养病室”的隔壁，李宗林仍然住在“养病室”的大门边，房门也未加锁，可以在附近行走。我建议他利用这个方便，把纸条包在泥巴里烤干后扔过去，与张子意等同志取得联系，监狱当局对家属及孩子们的看管较松，她们可以在院中活动。那时，院子中间是一道围墙，把我们和张子意等同志隔开，但围墙的中间开一个门，两扇大门底部离地面有五寸来高。取得联系后，互相从门底下传递东西比监狱里方便多了。

在“养病室”这段时间里，乔国桢的肺病日益严重，我一直护理到他病故，並安置好后事。于9月间又回到狱中，将所有情况转告给同志们。

以上就是我们在狱中建立通讯联络工作的始末。在新疆监狱的斗争中，我党在新人员被关押在几处的情况下，彼此间通讯联络的建立和保持，这为党组织能够有力地对狱中斗争加以领导，使我们的同志能在各方面条件十分恶劣的监狱中，克服困难，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坚持斗争，夺取监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历史真象

新疆监狱斗争史编写小组

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与新疆边防临时督办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应盛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党员干部多人进入新疆帮助工作。进入新疆的共产党员，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友谊，巩固新疆边防，整顿新疆政治，支援抗日战争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出于纵横捭阖、巩固其统治的考虑，出尔反尔撕下进步的伪装，将赴新全部共产党员逮捕入狱。这些共产党员又在新疆监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其余100多人则在党中央营救下回到延安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恣意篡改历史，把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从事革命斗争被捕的同志诬蔑为“叛徒集团”。而这段革命斗争历史又鲜为人知，因此，有必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党在新疆的斗争历史原原本本的记述下来，以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还可以使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新疆监狱问题身心受到折磨的同志从中得到慰藉。

中国共产党人应邀进入新疆

1933年4月，军阀盛世才利用政变，将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赶下台，自己当上新疆边防临时督办，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

盛世才上台之初，面临着军阀马仲英与张培元的东西夹击和前任金树仁留下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局面。盛世才这个军阀野心很大，为摆脱困境，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同国民党闹独立性。他对外标榜亲苏、反帝，对内采取一些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措施，争取苏联的信任和支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法西斯势力的威胁，也迫切希望中亚地区能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边界。因此，对盛世才的要求积极支持，帮助盛扫平敌对势力，并给盛以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面援助。1935年开始，苏联派俞秀松^①（化名王寿成）等联共党员到新疆协助工作。盛世才在他们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于1936年4月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施政纲领，在全疆推行，并编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进行公开宣传。几经危殆的盛世才，在

^①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后进入苏联工作时转为联共党员。

苏联的援助下，终于站稳了脚跟，政权得到初步巩固，局势渐趋稳定，社会也有所前进。

当时新疆政治形势的显著特点是：苏联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英、德帝国主义在新疆有一定的势力，日本帝国主义也千方百计企图插足新疆，但由于地理方面等原因，都不能与苏联的影响相抗衡。当时中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民族危机，而国民党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倾全力于消灭中国共产党，虽想控制新疆，却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发动全国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表示抗日的盛世才，则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态度。当时的形势，正如陈云1984年所指出的：盛世才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1937年4月，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等奉中共中央之命，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进疆事宜，经苏联与盛世才联系后去新疆的。不久，陈云等又亲赴甘新边界地区的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余部顺利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组成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陈云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第一任代表，以及抗战爆发不久，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是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开始，陈云当时指出：我党在新疆建立的

是特殊的统一战线。新疆实行的六大政策，是我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六大政策与我党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我党的最低纲领。不久，陈云返回延安。接替陈云工作的邓发（化名方林）也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对抗战和对将来都有深远的重大政治意义。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巩固和发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加强在新疆的工作，我党接受了盛世才的要求，先从“新兵营”抽调一批干部到盛世才政权中工作。之后，又应盛世才邀请，从延安抽调部分干部，于1938年分三批入疆，担负各种职务。在此前后，还有来往于延安与莫斯科之间路过新疆的一些同志，经中央决定，也留下来工作或养病。

1939年11月12日，继邓发后出任中共驻新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陈潭秋，在其署名蔡直^①《致新疆各地工作同志的信》中指出：“根据新疆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环境及其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我党在新疆的工作方针为：“1.怎样保持新疆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土，不致陷落在帝国主义的血手中；2.怎样巩固这个抗战的重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3.怎样推进这个落后的社会前进，使各民族人民过和平友谊的生活。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只有拥护和坚决彻底执行六大政策。”

中共派往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分配在民政、财

^① 即陈潭秋同志在新疆工作时的化名。

税、文教、军事、新闻以及群众团体等部门中工作。他们坚决执行我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团结、教育、影响着周围的群众，使落后、沉滞的新疆很快出现欣欣向荣与民主、进步的新局面。

在新疆工作的党员还沿袭执行了苏联与盛世才确定下来的不公开党的面目，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规定。当时，在新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党谨慎而清醒地执行了这些规定，这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我党在新疆的工作方针与任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人员在新疆作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赴新人员在中共中央先后派驻新疆的代表陈云、邓发和陈潭秋的直接领导下，在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克服各种困难，为新疆的发展，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友谊均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切实贯彻“六大政策”致力于新疆建设

盛世才公布的六大政策，符合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陈潭秋指出：“即（使）全新疆完全交给我们治理，我们根据客观条件，也只能施行六大政策这样的政策。”^①因此，在新疆的中共人员，为六大政策能够获得实

^① 陈潭秋《为使同志们更深刻了解在新疆工作任务和方针特作如下说明》，（1940年4月20日）。

施倾注了全部精力。

改革政治，加强民族团结，推行政治民主化。盛世才政权实际上是实行独裁统治，欺压群众。当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民政厅长时，废除了农村由地主、巴依、宗教上层分子把持的“农官乡约”，在他的主持下起草修订了行政长官公署（相当专区）、县、区三级政权的章程和条例，同时规定由农牧民群众直接选举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毛泽民还起草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印发各县作为培训区、村长的教材。后各县又相继成立了政务委员会，重大事项由政务委员会会议决。当时担任行政长（相当于地区领导）、县长领导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韩光、李云峰、许亮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十分注意推行政治民主化，成为认真贯彻六大政策的表率。他们还处处从维护各民族人民利益，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出发，体察民情，解除冤狱，兴修水利，修桥补路，救苦恤贫，为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

整顿财政，发展生产。盛世才原来滥发纸币，大借外债，弄得通货膨胀，天怒人怨。毛泽民代理财政厅长时，一面要党中央派“强有力”的干部来新疆帮助改革财政；一面将省银行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同时，对五花八门的币制进行改革，决定以元为单位，统一发行新币“大洋票”投入流通。为改善财政状况，毛泽民还提出要“开源节流”。在大力发展农、牧、工商各业的同时，厉行节约，惩治贪污，健全财经、税务制度。财政收支平衡后，他又主持制定了建设“新新疆”的第二期三年计划。在毛泽民负责财政

厅工作期间，新疆的财政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对改善各族人民生活，亦起了相当作用。当时在各地负责财税工作的郑亦胜、高登榜、钱萍、罗乃棠等共产党员，积极贯彻了上述措施。

巩固边防。尽管盛世才不愿意中共人员到他的军队中工作，但在苏联敦促下，要求我党从“新兵营”中抽调一批干部到其军队中工作。“新兵营”四大队政委胡鉴，担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带领大队与当地塔吉克、柯尔克孜族人民结成联防，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周纯麟、曾玉良在喀什四十八团、谭庆荣在和田骑兵三十八团、谷先南在和田警备司令部、赵海丰在叶城四十团工作。他们为巩固新疆边防作出了贡献。

文教建设。在文化教育岗位上的中共人员，计有林基路、李云扬、郭春则、朱旦华(女)等27名。他们在新疆学院、女中、一中、省立师范以及各区、县的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和任教。他们提出了“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教育”的方针，改革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增开《新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军事体育课程。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时，为该校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并决定以“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作为建设新校风的基本方向，他还以实际行动带动全院师生劳动建校，改造环境。他们经常讲述抗战形势，讲解革命人生观，以延安的抗大、陕公革命精神教育和影响青年一代。他们传播的革命思想，在青年中结下了硕果。尤其林基路，他火一般热情和卓越的才华，

受到各族青年的衷心爱戴。

此外，在共产党人主持下，增办学校，扩大招生，编辑出版汉、维、哈、蒙四种文字的小学和民众学校课本，为发展各民族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

黄火青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期间，和韩光、白大方、于村等一起，对该组织进行整顿，许多分会的主要负责人由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定期举办训练班培训干部，向学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六大政策，宣讲抗战形势和我党的主张，帮助各族文化促进会、学生联合会工商联合会进行抗日宣传和开展工作。沈谷南(女)、朱旦华(女)、刘勉(女)鄢仪贞(女)等共产党员在妇女协会工作期间，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疆妇女代表大会；由伍乃茵(女)主持在南疆先后成立了喀什区和巴楚县妇女协会分会。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妇女组织都成了我党团结、教育群众的有力阵地。

在共产党员主持《新疆日报》工作期间，邓发、陈潭秋要求负责编辑工作的同志每周汇报，每月工作计划要经党驻新疆的代表审核，发表重要社论、文章、消息，也要经审阅和修改。在汪小川、李宗林、李何、王宪唐和王谟、马殊、陈清源等努力下，《新疆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报道抗日救国的文章和消息。他们还利用这个阵地，刊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宣传党对时局的主张，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除延安和重庆由我党直接办的报纸外，《新疆日报》是当时最进步的报纸之

一，刊登过《马克思传》、《大众哲学》、《资本论》、《列宁选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

抗战爆发后，新疆各地迅即成立了抗日后援会。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底，掀起四次支援抗日募捐热潮，共捐款200余万元（金银物品不在其内），并用通电、慰问信等方式不断给前方以精神支援。在这些工作中，中共人员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在新中共人员的努力工作，六大政策得到程度不同的实施，保持了延安与莫斯科交通来往畅通。当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是人员来往的中心。党中央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任弼时、邓发、王稼祥，以及王明、康生、林彪，和外国党一些领导人胡志明、野坂参三等，来往莫斯科与延安之间都是路经迪化中转。苏联援助的军火、物资、药品也是经由新疆分别运到内地支援抗日。

（三）为抗战和建设新疆培养人才

与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之初，在陈云倡议和组织下，我党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以新疆作为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兵营”下分四个大队和干部队，分别学习炮兵、装甲、汽车和无线电等，成为我军一所多兵种军事技术学校。1938年，抽调吕黎平等25人，加上从延安调来的严振刚等19人（1人因病除外），共43人，进入盛世才的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等航空技术。这批人经过四年零五个月严格训练，胜利地完成各种训练课目，后来成为我军空军建设的骨干；“新兵营”的许多人后来也成为我军有关技术兵种的领导骨干。

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我党除在新疆学院、女中、一中、省立师范等校培养出一批批毕业生外，在我党党员主持工作的财政厅、民政厅、反帝会、《新疆日报》以及各地区、县，也办过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培养了大批各民族的人才，对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疆学院学生、惨遭盛世才杀害的乔国仁、田毓桂；新疆学院附中学生、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阿巴索夫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反抗盛、蒋迫害，在狱中进行 英勇不屈的斗争

（一）盛世才背叛六大政策，公开投蒋，反苏反共

由于共产党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盛世才疑忌越来越深，开始限制和刁难在新工作的中共人员。1939年，他将许多中共人员派往边远地区，大多安置在老百姓不欢迎的财税部门工作，企图以此造成民众不满。他还以种种借口，横加指责，随意处罚中共人员。

1939年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逆转。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燃起战火，迅速占领欧洲大片领土。我国抗战也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盛世才一方面疑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惮于国内外形势的恶化，越来越背离六大政策，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1939年冬至1940年5月，盛世才先后三次

发出布告，假借“防止敌探、汉奸、托匪混入新省破坏”之名，下令公务人员及民众互相监视和检举，鼓励“直接”向他告密。在两三年间，接连不断地制造各种所谓“阴谋暴动”、“托匪”、“反政府”案，逮捕、杀害大批汉、维、哈、回各族人士。通过这些手段，盛世才不仅摧残了进步势力，打击了异己力量，更重要的是以此反苏反共。他派人暗中监视苏联在新外交人员，大批逮捕昔日的留苏学生，还诱迫被捕“人犯”诬指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是新疆“阴谋暴动”案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诬陷苏联派到新疆边务处工作的联共党员陈培生（化名刘进中）是新疆“托匪”的首脑。对我党也不断制造事端，胡鉴、许亮等被陷害；郝冰清、曹建培、伍乃茵（女）等遭到诬告和监视。当时，“凡由口内来的都是托派”、“新疆快要赤化”等流言四起。盛世才公开宣扬：共产党“在新疆绝不需要。如果有人要介绍你们加入共产党，那人必然是托派”。^①盛肆意捏造借口，频繁调动我党人员，并以有病为由，拒绝同我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会见。因此，陈潭秋给中央的《新疆情形概略报告》中说：“他对我们的关系在1938年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到1939年冷淡以后，则逐步恶化，以前还借口不信任新党员，现在的行动则对整个党不信任”。^②

1941年冬至1942年，德国法西斯侵略军进逼莫斯科，太平洋战争也已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最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国内亦处于空

^① 陈潭秋《迪化新省情况报告》，1939年11月28日。

^② 陈潭秋《新疆情形概略报告》，1941年11月6日。

前困难时期。这时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加之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终于投靠了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

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加紧图谋新疆，一面以嫡系胡宗南部接替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防务，用武力威胁新疆；一面接连三次召见盛世才驻重庆代表张元夫，提出与盛谈判条件。1942年3月19日，盛杀害了倾向进步并握有兵权的四弟盛世骥，以此嫁祸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军事顾问等人，并向斯大林写信，捏造事件的所谓“真相”。5月，盛世才派五弟盛世骥随他派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一起去重庆，面见蒋介石讨价还价。盛世骥返回迪化后，盛世才对中共在新人员的迫害亦随之升级。他诱使在1月份被捕的前教育厅长、政训处长李一欧诬供曾在苏联领事馆及八路军新疆办事处同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召开“阴谋暴动”会议，凭空构画了所谓“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矛头直指我党在新领导人。随后，盛世才一面要求国民党派朱绍良、翁文灏到新疆与他谈判，达成了国民党向新疆增派军队，停止中共人员的工作并集中起来，在航空队学习的中共人员全部调出，在新疆成立国民党省党部等六项协定；一面以“另有任用”为名，将中共在南北疆工作人员陆续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已被迫停止工作的中共人员一起分别集中在羊毛湖、“新房子”和八路军办事处。7月，又将在航空队学习的中共人员全部调出。在处境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代表陈潭秋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新疆形势，多次提出将在新疆工作人员全部撤回

的意见。7月5日，中央回电，决定“除督办留的四人①外，其余136人”全部撤回。据此，陈潭秋拟定了分三批撤往苏联的计划，并决定自己为最后一批。这计划本来有实现的可能，但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以及苏联方面无暇顾及等原因，终于未能实现。9月初，盛世才将中共在航空队学习人员单独集中于“新房子”，其余人员被集中在八户梁。

(二)软禁期间的斗争（1942年9月17日至1943年2月7日）

1942年9月17日，即我第一批人员预定撤出的前几天，盛世才突然派兵包围中共在新人员集中住地八户梁，以“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和徐梦秋、潘同、刘希平②等软禁于邱公馆③；将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胡鉴等12人软禁于三角地。他们的眷属也分别被软禁于邱公馆和三角地。同日，还以“请开会”为名，将中共在航空队学习人员从新房子转移至督办公署后院教导连驻地软禁起来，其余人员就地被软禁在八户梁。这时软禁的总人数是123人（不包括孩子）。9月17日以后，陆续由南疆回到迪化的谷先南、谭庆荣、许亮、高登榜、郑亦胜等5人。也被软禁于三角地。1942年6月，中共人员被软禁前，陈潭秋目睹局势的险恶，即已意识到“苏联与中共（特别是中共）在新疆的地位不免要发生变动。”因此，“须做必要的准备，以

① 这四人即郑亦胜、蒋连穆、高登榜以及王明朝

② 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三人先后于1943年春夏间叛变脱党。其中徐梦秋后沦为国民党特务。

③ 盛世才岳父邱宗瀚的公馆。

应付新的可能的事变。”

陈潭秋所做的应变准备，主要是：一、争取撤退；二、准备坐牢。他深知，撤退当时虽有可能，但主动权不在我手中，也有撤不出去的危险，因此他把立足点放在准备坐牢上。首先，在按照党中央部署开展整风学习的过程中，加进共产党员革命气节教育的内容。他多次教育大家，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要“士可杀而志不可夺”，要学文天祥、夏明翰、季米特洛夫。他还要求大家清理文件和物品，转送苏联领事馆。更重要的是，为加强党对整风的领导，也从组织领导上为坐牢做好准备，建立了以他本人为主任，张子意为副主任，徐梦秋、马明方、方志纯、谢良、吕黎平为委员的总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并按照住地，建立了四个分会干事会即学干会。陈潭秋在被盛世才“请”走之前，明确指定张子意为他离去后的总负责人。软禁之后，陈潭秋虽与大多数同志隔离，但仍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同志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不要去做盛世才的官，不要为盛世才做工，争取集体回延安，为以后狱中斗争指明了方向。

软禁后，中共人员虽被分离四处，但在斗争中形成的新的学干会，发挥了临时党支部的作用，继续领导大家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整风学习，进行气节教育，使大家进一步做好坐牢坚持狱中斗争的思想准备。

三角地的同志在学干会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中心材料，以整风的十几个文件和陈潭秋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为辅导材料进行学习。没有文件就凭回

忆，组织漫谈讨论。李宗林向大家讲述肖楚女、恽代英、方志敏等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并通过个人谈心得，谈体会，表决心，以达到一旦被捕入狱，在敌人面前要坚持崇高的革命气节的目的。他们还举行问答晚会，以磨炼和提高应付敌人审讯的能力。

软禁在督署后院的航空队员，向盛世才写信抗议，要求会见中共代表陈潭秋。他们为得到党的指示，曾分别派金生、陈熙、吕黎平先后五次冒着生命危险翻墙外出，寻找党派驻新疆的代表未果。便与原航空队苏联教官联系。苏联教官开始答应转告延安，后来以处境困难为由，未予置理。这时，他们决心同敌人作长期的韧性斗争。大家作好准备，决心在敌人审讯拷打面前，要像季米特洛夫、夏明翰那样，把法庭变战场；在敌人长期监禁时，把牢房变成学校，为以后出狱工作积累知识，增加才干。

在坚持整风的同时，陈潭秋等不止一次给盛世才写抗议信，指出：我们是受你邀请来帮助建设“新新疆”的，在支援抗战、建设新疆过程中有功无过。现在竟然将我在新人员全部拘禁，这是无理、完全非法的。同时坚决要求无罪释放，送回延安。

（三）监狱时期的斗争（1943年2月至1944年秋）

1942年冬，盛世才派亲信彭吉元赴重庆，要求蒋介石尽快在新疆建立国民党省党部，并派员参加对所谓“共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审讯。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3月10日，中统高级特务王德溥率季源溥、朱树声、郑大纶等到达迪化，以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名

义，直接参与对中共在新人员的审讯与迫害。

在此前后，盛世才除将原在航空队学习的和妇幼病残以外的中共在新人员悉数投入了监狱。2月7日，将由邱公馆转移到刘公馆^①的陈潭秋、毛泽民以及徐梦秋、潘同、刘希平，徐梦秋的公务员王义福等6人投入第二监狱；将三角地的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胡鉴、高登榜等17人投入第四监狱。4月11日，盛又派出一连军警突然闯入八户梁抓人，这时中共人员男女老幼与之进行激烈的搏斗，残废同志也挥起拐杖与敌人撕打，但终因寡不敌众，马明方、方志纯、刘护平、吉合、冯家树、张东月、刘子平等35人被匪徒强行绑走，投入第一监狱。到4月13日为止，被投入监狱的总人数达60人，其中有两名妇女。航空队王聚奎、杨光瑶二人因意志薄弱经不住考验，当了逃兵；其余人员于1943年2月24日被转移到刘公馆拘禁，妇幼病残人员亦被软禁在西河坝蒙哈柯学校。

在入狱时和入狱之后，中共人员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由三角地被投入第四监狱的中共人员在第二天，就由关在东排十号牢房的曹建培、陈谷音等6位同志自动成立狱中党小组，选林基路为组长，高登榜为副组长，并研究了斗争对策，做出三条决定：1.要求盛世才公开审判，利用公审在法庭上揭露敌人。2.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坚持要求盛世才将我党同志集体送回延安，个人单独出狱是叛变

^① 盛世才上台时曾任省主席，后被盛关押的刘文龙的公馆。

行为。3.要有共产党人革命气节，宁可牺牲个人，不能损害党的利益。同日，四号牢房的李宗林、白大方、胡鉴、陈清源四人举行绝食，坚持了三天，对无理投入监狱进行抗议，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改善伙食。这是中共人员入狱后第一次绝食，它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是以后三次大规模集体绝食的先声。

国民党中统高级特务王德溥等四人在离渝赴新前，蒋介石曾面授对中共在新人员“首要者必杀”的指令。他们抵达新疆后，便伙同盛世才从关押和软禁的中共人员中，提审已公开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各方面负责人及有关人员15人。其中有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潘同、刘希平、林基路、马殊、吉合、李涛、周绍光、黄义明、吕黎平、李宗林、申玲(女)和王义福，其余人员未被审讯。

敌人以陈潭秋、毛泽民作为重点，妄图逼迫他们：1.承认“阴谋暴动，推翻政府”；2.宣布脱离共产党；3.反对苏联。经多次审讯，陈、毛二人大义凛然，据理驳斥各种诬蔑。敌人无计可施，便于1943年5月7日用已经叛变的刘希平、潘同，以及盛世才的官员李一欧、藏谷峰同陈、毛进行所谓“对质审讯”。并对陈、毛施以酷刑。审讯时，陈潭秋经受了站炭渣、抽鞭子、冰火和打手板等刑，但他意志如钢，毫不动摇，怒斥审讯人员说：这些残酷刑法“本是十五世纪野蛮时代的东西，你们用来摧残革命志士，有失中国列为五强之一的荣誉”。当要他承认“阴谋暴动”时，他正凛然指出，那不过是“空中楼阁”、“伪造事实”。对盛世才本人的电话劝降，他气愤的摔碎电话机以表示抗议。毛

泽民也受了背杠子、坐飞机、抽皮鞭、疲劳战等百般折磨。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回答敌人审讯时他指出：“你们所说的有什么阴谋，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共产党决不会做这回事”。审讯人员企图用没完没了的折磨来迫使他脱党，他丝毫不为所动，并旗帜鲜明地表示：“脱党！脱党！脱党！那是我的政治生命，不能脱离。”“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为国家为民族，自有他的气节！”。

林基路在经受了针刺指尖、坐老虎凳、关黑牢房等酷刑后，表示：“指尖刺烂心如铁”，“烈火焚烧见赤金”。他在牺牲前用香头写成的共产党人的战斗诗篇《囚徒歌》，由陈谷音谱曲，被狱中同志们“广为传唱”。正如后来向党中央写的《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中所说：“林为梁^①等同志的宁死不屈精神，创造了新疆法庭上受审者的新模范，抑压了特务分子无计不酬的气焰，打破收罗刘希平等叛徒后的新幻想——对于全党的荣誉，对于全体同志的战斗鼓舞，对于特务继续审讯的遏止，都有重大意义”。

他们的顽强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威武不屈、不畏强暴的高风亮节的坚贞节操，彻底粉碎了盛蒋特务的罪恶阴谋。盛世才为了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经蒋批复，1943年9月27日，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名秘密杀害。为取得杀害他们的根据，敌人卑鄙地制造了假口供。

在这次审讯期间，出现了徐梦秋、潘同、刘希平三个

^① 林为梁即林基路。

叛徒。他们按敌人的需要，捏造了所谓“阴谋暴动”的秘密会议、行动计划、组织机构和经费分配等情况，并发表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帮助敌人搞劝降、策反等可耻活动。

1943年10月5日，为抗议敌人的虐待和暴行，被关押在第四监狱中的四个号子的中共人员，提出要求举行公审，发书订报和改善伙食等三项条件后，同时举行绝食。坚持了六天，除公审一条外，其余要求基本实现。这是狱中发生的第一次集体有组织的绝食斗争，时间恰在三烈士殉难之后，客观上形成对盛世才暴行最强烈的抗议。

1943年10月和1944年2月，盛世才分别下令把第四监狱和第一监狱被押的中共人员集中于第二监狱。从南疆回迪化较晚的蒋连穆、陈广竹等三人，于1943年被软禁在西河坝，到1944年2月也被投入了第二监狱。同年8月前后，盛世才又下令将妇幼病残人员由西河坝转移至七道湾女子工厂，强迫她们做工，并妄图分化瓦解。她们坚决挫败了盛世才的阴谋诡计，当年10月他们为病逝的吴茂林举行了悼念活动，用挽联、悼词等形式，表达对死者忠贞不渝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的哀悼思念之情。

（四）朱绍良、吴忠信时期的狱中斗争（1944年秋至1946年3月）

1944年夏秋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趋明朗，盛世才为了进行新的政治投机，于8月下令逮捕了驻新疆国民党省党部人员。于是盛世才、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激化。8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将盛世才

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并令立即离新赴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由吴忠信^①接任，在吴未到职前，暂由朱绍良代理。从此，中共在新人员的处境更加困难，所受迫害愈益加剧。

11月前后，国民党新疆当局下令将软禁在七道湾女子工厂的妇幼、病残人员全部投入第四监狱；将软禁在刘公馆的34名航空队人员投入第二监狱。至此，中共在新人员主要分成两部分：男的监禁在第二监狱，女的监禁在第四监狱。

盛世才下台之初，监狱当局一时处于混乱状态，有利于我党人员取得各牢房之间的联系。同时，由于集中关押，也有利于组织统一的行动。这时，以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等为首的领导核心，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张子意针对斗争形势，提出“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狱中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和绝食斗争。

第一次反普遍审讯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1944年底至1945年3月，是中共在新人员入狱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当时，正值重庆派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新疆清理特种刑事积案审判团（简称清理积案审判团）审讯。该团的使命是：借“清理积案”为由，释放1944年8月被盛逮捕入狱的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人员和其他非中共人员，以

^① 吴忠信（1880—1959）安徽合肥人，1944年9月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调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59年12月16日卒于台北。

收买人心，并借机向中共人员策反。

狱中党组织为揭露敌人所谓“清理积案”的真面目，掌握斗争主动权，先后向吴忠信和审判团发出两封控诉信。一封，由陈潭秋妻子王韵雪、毛泽民妻子朱旦华、林基路妻子陈茵素三人署名，揭露盛世才残酷杀害她们亲人的罪行（当时已有消息说陈、毛、林已被杀害），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家属”、“无罪开释”被关押人员等；另一封由医生杨锡光署名，揭露敌人对女牢妇幼、病残人员的迫害虐待，要求无罪释放，送回延安。这两封信，向国民党新疆当局和“审判团”表明了中共在新被监禁人员的正义立场。

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清理积案审判团”开始大规模、普遍的审讯。

在审讯中，审判团极力掩盖蒋、盛合谋制造假案的事实，威迫利诱两手并用，逼迫中共人员背叛投降，填表。对此中共被押人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狱中党组织针对审判团逼令填表企图乘机策反的阴谋，决定填表时在“政治信仰”栏中，填“拥护三民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是否拥护蒋委员长”栏内，填“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在“志愿”栏，填“坚决要求无条件集体释放送回延安”。这次审讯，除极个别别人外，绝大多数立场坚定，没有上当，有力地粉碎了审判团的阴谋。不久，清理积案审判团宣布将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中的非中共人员无罪释放，而对一百余名中共人员，则一个不放，声称要“另案处理”。该团宣判后，将案卷全部运往重庆，并在1945年春离新返渝前，将中共在押人员移交新疆省警务处继续审理，而后者对狱中中共人员

的迫害控制愈甚。新疆警务处先将中共在狱人员通过斗争取得的阅读书籍、开小牢门、生火取暖等全部被取消，继而又采取分散关押、吃掺砂的高粱面馒头及动辙施以严刑拷打等手段横加摧残。对此，由薛汉鼎、白大方、秦化龙出面，向狱方交涉，提出改善政治、生活待遇的六项要求。这一正当要求竟被诬蔑为“无理取闹”，三位代表在受到毒打后，被分押黑牢。于是，全体男同志敲打牢门，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以示抗议，并于1945年3月15日开始绝食。绝食斗争坚持三日，狱方无法，只得将三人放回，但又妄图将航空队人员分别监禁。被押中共人员众口一词：“宁死不散”，“死也不让航空队同志们出去”，同仇敌忾，迫使监狱当局不得不让步，基本答应所提要求。此后，号门又打开了，可以到院内自由活动，时间连续有五个月。这次斗争，充分显示了“百子一条心”的威力，沉重打击了敌人在狱中的秩序，使敌人心惊胆战，惊呼“长此羁押，恐非善果”。^①

第二次反普遍审讯斗争。1945年7月，在国民党新疆当局主持下，对中共人员开始进行第二次普遍审讯，在这次审讯中，主审人员杀气腾腾，从污辱漫骂、滥施酷刑，到逼令写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明”等，无所不用其极。审讯中共产党员杨南桂、胡鉴、蒋连穆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站立，但他们没有屈服，第二天就联名向新疆主席吴忠信写了抗议信。8月初，新疆警务当局又组织所谓“审判

^① 《关于新疆省警务处附属新疆监狱10月份工作报告》，1945年11月6日。

委员会”继续审讯，并将中共人员吉合、白大方、谷先南、胡鉴、李涛等一个个地逐日提出过堂，然后调出里院，分散关押。为抗议狱方的分散关押和侮辱打骂，男牢全体又进行了绝食斗争。

这次斗争的导火线是第二监狱监狱长侯维城对中共人员张毅进行挑衅辱骂和毒打，为抗议侯维城的暴行，挫败监狱当局实行第二次普遍审讯和分散关押中共人员的阴谋，第二监狱男牢的中共人员决定发动绝食斗争。绝食后，一些同志奄奄一息，监狱当局仍惨无人道的拖去审讯，并对吕黎平、周绍光、方子翼、马殊等人施以非刑拷打，甚至用从肛门灌进掺有辣椒面的牛奶的方法，让你死活不得。在生死关头，狱中全体人员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到底，集体返回延安。绝食坚持了七天，狱方被迫停止刑讯，把调出隔离的人调回里院，大家才同时复食。后来监狱当局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这次对中共人员的第二次普遍审讯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男牢进行绝食斗争期间，女牢也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斗争。她们不仅战胜了敌人的审讯，还经常高唱革命歌曲，抗议监狱当局的迫害和鼓舞大家的斗志。女牢中的中共人员在残酷迫害下，还要扶老携幼、照顾病残，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除几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外，还有24名最大不过12岁、最小刚出生的孩子和两名危重病人，以及五位残废军人。她们自始至终在学委会领导下，有组织地斗争、学习和生活，并以崇高的信念，

顽强的意志，响应党组织“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号召。她们不但自己分班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还把孩子们组成大、小两个班，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和教唱革命儿歌。使饱尝铁窗风味的孩子们在苦难和饥寒交迫中学习长辈的革命斗志，日益成长。逢年过节，她们还将变卖衣服的钱，购买食品送到男监，使男监的同志们倍感组织和战友的关怀和温暖。

1945年底，谢良、谢江庭、罗云章、余良辉、胡子明等五位残废军人，与12名老人、家属、孩子们一起，被国民党新疆警务当局先后送到贫民救济院，日与乞丐为伍。国民党企图以此消磨这些同志的意志，拖垮身体。但这五名残废同志以谢良为领导，决心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他们在迪化西大桥桥头摆摊，变卖狱中同志们的衣物，销售香烟杂物等，用经营所得支援狱中同志，并为狱中提供报纸、传送消息。1946年春，这五名残废同志还通过当地进步青年张玮（张玉贞，女）赵明（赵普琳）把狱中中共人员名单及给毛主席的信转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魏传统送交周恩来。

在长期、艰苦的监狱斗争中，国民党新疆警务当局虽竭力想把狱中中共人员与外界隔绝，但在新疆狱中的中共人员仍不时得到当地进步青年、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援。

第三次反普遍审讯斗争。1945年11月下旬，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新疆省警务处又对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中共人员进行了第三次普遍审讯，这是中共在新人员与国民

党新疆当局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斗争。在审讯中担任主审的仍是新疆省国民党的警、特。他们来势汹汹，大肆诬蔑共产党“破坏统一”、“挑动内战”、“抢占地盘”、“破坏交通”、“杀人放火”，还要求受审人员在审讯笔录上签名等。狱中人员在党组织领导下，已对审讯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审讯时，中共人员据理驳斥各种造谣诬蔑，并申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绝不作危害国家和各族人民利益的事，八路军英勇抗日，不怕牺牲，举世皆知。这些回答，表示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誓为共产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当局的诬蔑，粉碎了第三次普遍审讯的阴谋。

1946年2月初，国民党新疆省警务处认为知识分子软弱可欺，变换手法专门提审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李何、王漠、陈广竹等七人。但这已是第三次审讯的强弩之末，主审人员虽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仍是一无所获。敌监狱长侯维城哀叹“该等受马列主义学说之麻醉太深，决非以言语之力而能冀其清醒”，竟然恼羞成怒地以毒打李景春而使这次审讯收场。

在监狱斗争中，也有少数人贪生怕死，意志薄弱的，经不起考验，自首变节，甚至堕落为叛徒。

(五)党的领导是坚持狱中斗争胜利的保证

在新疆监狱斗争中，100余人远离中央，彼此又被分隔成几处，在几乎每天处在有生死考验的复杂环境中，他们能坚持斗争，不断挫败敌人的阴谋，直至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党的坚强领导。

早在被软禁之前，赴新人员为进行整风学习，就组成了以陈潭秋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下设四个分会干事会，领导整风学习，并根据所面临的形势，对全体同志适时地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为以后的狱中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

软禁时期，中共在新人员被分别囚禁在邱公馆、八户梁、三角地和新房子四处。邱公馆由陈潭秋负责，八户梁由原总学委会留下的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谢良领导，三角地学干会由李宗林、林基路、李云飞、胡鉴组成，李宗林负责。新房子航空队仍以原学习生活指导委员会（即党支部委员会）为领导，吕黎平为书记，方华为副书记，陈熙、金生、方子翼、朱火华、周立范为委员。

入狱初期，由于互相隔离，各牢房自动组成党小组，一般由经验丰富、有威望的同志负责。之后，联系逐渐打通，男监在斗争中形成了由方志纯、马明方、刘护平、李云飞组成的领导核心，直到出狱没有改变。女监，即妇幼病残人员，一直由张子意、谢良、杨锡光组成的学干会为领导；当女监的男同志转到男监去之后，则以朱旦华、沈谷南、伍乃茵、刘勉组成新的学干会为领导，由朱旦华、沈谷南负责。领导狱中斗争的总负责人一直是张子意。

以张子意为首的狱中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把揭露盛世才、揭露叛徒、团结教育内部作为中心工作。张子意写了《狼种猪》一文，在狱中传阅，对揭露盛世才又蠢又狠的反

动本质，打破对盛的幻想，坚持革命立场，保持革命气节，起了重要的作用。每当发现叛徒时，党组织都认真研究其经历，分析其叛变原因，并提出认原则不认人，和叛徒断绝一切联系，遇见叛徒时拒绝谈话或痛斥他们的罪行等对付办法。徐梦秋原是红军高级干部，曾任盛世才政府的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在我党人员中曾有较大影响，但他个人利益看得重，对党不满。叛变后，张子意给他取名“无足怪”，既暗指他失去双足，又明白指出他的叛变是不足为怪的。一语双关，发人深思，催人猛省。党组织还以极大的精力，进行内部的团结教育工作。张子意为此写了《百子一条心》和关于“三反”（反叛徒、反兵痞、反逃兵）的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是延安的儿女，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要求无条件释放，集体回延安，决不当逆子。此后，“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一直成为全体人员的奋斗口号与目标。

党组织还提出了“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号召，带领全狱同志们利用争取到的看书看报权利，认真学习讨论保存下来的马列书籍及偷送进监的报纸，从而不断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斗争艺术。盛世才下台后，鉴于他早已将赴新中共党员告知国民党，党组织又及时决定公开共产党或八路军身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为保存党的领导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党组织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在中共人员由软禁地八户梁投入第一监狱时，张子意因患重病，便有意将他与妇幼病残人员一起留在八户梁，以便掌握全局情况，领导斗争。在妇幼、病残

人员中，出面与敌人交涉的是医生杨锡光。男牢中方志纯、马明方等同志也隐蔽得很好。每次公开与敌人交涉，都由薛汉鼎、白大方、秦化龙等同志出面。未曾暴露的同志入狱时使用化名，也是当时隐蔽自己的有效办法之一，如张子意化名刘生财，方志纯化名王民生，马明方化名马有德等，在联络时也多用别号代替化名。

为实现党的领导，贯彻党组织的指示，首要条件就是建立起各监狱、各牢房之间的联系，形成完善而隐蔽的联络网。为此，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厕所、砖缝、墙头、房梁等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放置纸条，或利用“放风”扔纸团（称“航空信”）来建立联系。各狱之间，则通过送衣服、食品，或借看病之机互通情况，传送暗语或密写信件。个别还通过团结争取工犯、狱卒找来报纸，传递消息。特别是利用狱外的“养病室”，作为各牢之间的总联络站，长期在这里养病的李宗林、乔国桢，不仅为联络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狱中斗争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刘护平、李握如、于村、王顺志等同志也为通讯联络作过很多的工作。这样就有力地保证了党组织自始至终对监狱斗争进行领导。

经党中央营救，狱中 中共人员集体回到延安

中共赴新人员被软禁、关押之后，党中央曾进行多次营救。1943年1月13日，中央刚从共产国际来电中得知在

新中共人员被关押确息，次日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营救。1944年6月5日，林伯渠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要求国民党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1945年9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中共严正提出将释放爱国政治犯问题列入谈判条款，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还政于民”的诺言》，明确指出我党中央委员陈潭秋、候补中央委员马明方等“依然被监禁着”，敦促国民党必须予以释放。《双十协定》签订后，重庆《新华日报》又多次发表社论、文章，敦促国民党立即释放各地爱国政治犯，以实际行动贯彻《双十协定》。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1946年初颁发行政府训令，命令全国各地释放政治犯，称：“此项人犯无论已判未判，准由各机关查明释放具报”。但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对这一训令不予公布，更不执行。

《双十协定》签定前后，国民党政府为解决1944年9月爆发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①问题，派张治中先后两次赴新同三区革命人民代表进行谈判。1946年3月，张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并于4月4日抵迪化就职。

^① 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人民因不堪忍受新疆省政当局的压迫，发动武装斗争，成立革命政府，这一斗争被称为“三区革命”。

在张治中赴新前，周恩来、邓颖超亲赴张寓，当面嘱托说，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请务必按《双十协定》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念及他们长期狱中生活，条件艰苦，亦请改善一下。张治中先生当即应允。

张治中到新后，即派屈武、党必刚等到监狱探望，了解情况，初步改善了狱中人员的生活。接着，张治中电告蒋介石称：盛世才时期逮捕的中共100多人，领导人已被处决，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妇孺一般人员。为贯彻《双十协定》，表示和平建国诚意，请准予释放。电文几经往返，至5月中旬蒋介石才复电同意。张治中随即将中共狱中人员全部集中到第二监狱里院，为释放预作准备。

当时狱中人员尚不完全了解外界情况，为了防止意外，党组织以“王韵雪等全体”名义给张治中写信，提出登报公布释放消息及出狱进行短时期休息等五项要求。张阅后即邀中共人员代表杨之华、吉合、朱旦华、沈谷南、李云扬、独伊等六人到他的寓所面谈。在会见中，张对信中所提的问题作了解释，着重说明此次释放大家，是受周恩来先生委托，请人家放心，一定派人护送大家回延安。当前时局不定，宜早不宜迟。一旦准备好了，就立即起程。

四年的铁窗生涯，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至此，狱中同志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进行回延安的准备，党组织则针对从迪化到延安长达6000多里，沿途充满艰难险阻，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再予扣留或杀害的可能等情况，及时教育大家，务要提高警惕。同时党组织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以避

免节外生枝，影响回延。在分配车辆时，妇幼、病残人员与青壮年分别搭配，指定高登榜、吉合负责总的联络和生活事宜，全力保证安全顺利返回延安。

张治中指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拟具护送中共人员回延的计划，6年5日新疆省政府发出遵照行政院关于释放政治犯训令给各专区、县的电令。6日，《新疆日报》公开发表释放在押中共人员消息。10日，长期羁押于新疆监狱的中共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由刘亚哲负责护送从迪化出发。同时，张治中还分别电告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说明经国民政府中央批准释放了这批中共人员，请予沿途放行。

车队登程后，沿途历经坎坷，在刘亚哲周旋操持和全体人员积极配合下，均化险为夷。惟6月20日在陕西邠县宿营时，刘亚哲忽接胡宗南电令，要车队直去咸阳“招待所”（关押、迫害共产党人的集中营），不准去西安。刘知其中有异，心中焦虑，告诉了负责途中联络事宜的高登榜，高立即报告党组织。当时，适原新疆航空队中共学习人员谢奇光病危。党组织当即通过杨之华将谢病危情况告知刘亚哲，并要求到西安急救。刘心知其意，考虑这是摆脱胡宗南控制的好办法。随即电复胡宗南，假称对其电文“遵照办理”，实则带领车队连夜急行闯过咸阳桥，直抵西安城。高登榜、曹建培随即秘密进城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取得联系，遂将出狱人员全部接往八路军办事处，并通过报纸发表新疆释放中共人员已抵达西安的消息。胡宗南对

刘亚哲未将这批人送到咸阳十分不满，声言政治部对车队人员要进行审查，不准放行。刘亚哲遂急电张治中报告情况。张治中接电后，一方面致电胡宗南要求放行车队，同时电告蒋介石请令胡宗南对车队予以放行。中共中央接到驻西安办事处的电报后，由朱德总司令出面致电胡宗南，要求放行。7月3日，刘亚哲接到胡宗南同意放行的回电。

7月5日，车队再次登程，并于9日抵达护送终点吉家村，全体新疆出狱人员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刘亚哲一行亦受到热情接待。边区军民还向刘等一行馈赠礼品，感激他们沿途护送。朱德总司令还委托刘亚哲带回给张治中先生的亲笔感谢信和礼品。数月后，张治中从新疆到南京时，董必武同志又代表中共中央亲往张宅当面致谢。

新疆出狱人员在吉家村稍事休息后，换乘我边区的汽车驶往延安。7月11日，当车辆行至距延安尚有数十里的七里铺时，受到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安子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程迎接，中央领导同志并登上汽车和同志们一一握手。下午，车队抵达延安城，受到数以万计的边区军民夹道欢迎。从新疆监狱归来的同志热泪盈眶，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至此，他们结束了数年监狱生活的磨难和6000余里的艰苦跋涉，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出发时共131人，途中因病去世两人（航空队谢奇光、儿童胡狄燕），返回延安129人。他们在延安继续受到党中央和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还亲往他们的住地亲切慰问，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的归

来，就是胜利”。中央还召开欢迎会、宴会和文艺晚会招待慰问出狱人员。

不久，马明方、张子意等向刘少奇汇报了赴新人员在监狱斗争的情况，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详细总结了四年来在新疆监狱中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由方志纯署名，报送中央组织部。原新疆航空队党支部也写出了《在新疆学习与生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历史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共赴新人员中，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经党中央营救、国民党进步人士张治中的帮助，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全体人员，也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好同志，正如延安杨家岭党代会致新疆出狱人员慰问信中所赞誉的：“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这正是参加新疆监狱斗争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真实写照。

但是，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当年参加新疆监狱斗争的同志，却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中生有的诬蔑和残酷迫害，不少同志被诬为“叛徒”，“内奸”，致使马明芳、杨之华(女)、沈谷南(女)、李宗林、白大方、王宪唐、冯家树、胡鉴、陈谷音、程九柯、刘子平、陈广竹、薛汉鼎、曹建培、陈御风、陈旭、朱火华、安志敏、杨翼德、王东汉、曹麟辉、胡子明、周健(女)等24位同志含冤而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的关怀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赴新人员在监狱中坚持革

命斗争这段英勇悲壮的历史恢复了真实面目，林彪、江青一伙对参加新疆监狱斗争的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也被彻底推翻。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衷心告慰当年参加新疆监狱斗争的英烈和慰藉受到冤案迫害的同志，更要继承革命先辈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好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促进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综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它位于华北北部，包括以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北与绥远省东部、察哈尔省北部、热河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相接，东、西、南三面分别以津浦、同蒲、正太、石德线为界，与山东、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接壤^①，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和建党、建军、建政、群众工作以及经济、文教等工作方面，均创造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经验，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②，为我国各族人民所向往，为世界和平进步人士所关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抗战八年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对全国战略反攻及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收复东北

① 这是1945年8月大反攻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区域范围。

② 《中共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1938年10月5日。

失地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和发展的历史，可以深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和中流砥柱作用。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地区的形势和 中共中央在这里创建根据地的决策

共产党、八路军所以必须而且能够在晋察冀地区最早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这首先取决于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和政治形势，取决于中共中央对战局的正确判断与决策。

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后，1933至1936年又占领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的北部、河北的东部，扶植起伪“满洲国”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先后签订和承认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在华北“特殊化”的幌子下控制了冀、察两省的主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芦沟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三个月内吞灭全中国。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7月8日，中共

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①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重申了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等条件，力促国民党会谈合作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命令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称第十八集团军）。随后，八路军各师先后从陕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蒋介石国民党在日军大举进攻、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和中国共产党督促推动之下，8月14日宣言“自卫抗战”，9月22日由他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从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华北和全国各地掀起了团结抗战的高潮。

国民政府的广大爱国官兵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8月末攻陷南口、张家口，9月占领大同、保定、沧州，10月攻占石家庄、娘子关、德州，11月8日攻陷太原。至此，整个华北几乎完全沦陷，日军直逼黄河北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芦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

在此形势下，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

当时，晋察冀地区的形势，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环境，具有以下的特点：

晋察冀地区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沿。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以北越长城，直捣伪“满洲国”，扼住日军进关的咽喉要道山海关；可以控制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北宁等铁路干线，卡住日军运输的大动脉；还可以紧紧包围日本华北方面军大本营和华北伪政权的驻地北平、天津、张家口等战略要点，就象在华北敌人的心脏插上一把匕首。它既可直接袭扰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达到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的目的，将来还可以作为全国大反攻、解放东北的前进阵地。

晋察冀地区的人民在日军的不断侵略之下，不堪国耻，不堪亡国的痛苦，早在芦沟桥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就曾不断地爆发英勇的抗日斗争：如二十九军等部的长城抗战，孙永勤部热南抗战和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也直接激发了这一地区人民坚决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斗争。抗战爆发后，晋察冀地区首先遭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人民强烈的保家卫国、武装抗日的要求，如遍布各地的干柴，一经启发和组织，就会立即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的燎原烈火。

晋察冀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党的地区之一，有党的长期工作基础，工农群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刘少奇等曾先后在这一带从事建党和革命活动。从二十年代起，冀东、冀西、冀中，以及晋东北、察南各地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晋察冀地区爆发过不少革命斗争，特别是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武装斗争，如：1925年太原市民学生反房税斗争；1927年冀东的玉田县农民武装暴动；1930年完县五里岗暴动；1931年“平定兵变”和阜平苏维埃斗争；1932年前后的高蠡暴动及保定二师学潮；1934年唐山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和1935年平山县木盘武装分粮斗争等。这些斗争虽然大都失败了，却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锻炼出许多优秀的干部，积累了斗争的经验。1936年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后，党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的有广大抗日爱国青年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山西，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以薄一波为首的党的公开工作委员会与阎锡山谈判合作抗日，接办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各县迅速发展了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抗日救亡组织，开办了培训各类抗日救亡军政干部的训练班。这些工作基础，为党在这一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干部和群众条件。

晋察冀地区西有北岳恒山、五台山、太行山雄峙，北有燕山山脉绵延，冀东、冀中平原沃野千里，山地与平原

相连，互为支撑依托；境内盛产粮、棉、海盐，煤、铁矿藏丰富，工商业和文化较为发达，这些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抗战初期，晋察冀地区首先沦为敌人的后方。当时，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且在战略进攻中，急于南进，无暇后顾，仅占领了这一地区的铁路干线和重要城镇，对广大农村，便无法经常武装占领。国民党在晋察冀地区的旧统治，在日军进攻下迅速瓦解，而伪政权尚未建立起来。

鉴于以上形势，中共中央认为，在晋察冀地区首先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有重大深远的意义，而且有光明的前途，并为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上，毛泽东即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指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9月，八路军总部根据华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发布命令：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地区，一一五师进入晋东北五台山地区。

9月24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并转北方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

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队及群众组织”^①。

9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河北党也应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以便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9至1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赴山西与阎锡山接洽协同作战时，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上述决策，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在山西北部和察哈尔省沦陷区普遍建立起我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半政权性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和民主政权。

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在《关于晋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具体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同月，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筹建边区政府等诸项具体的工作，也进行了安排和部署^②。

中共中央的正确判断、决策和部署，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得以成功创建的根本前提。

① 《毛泽东对恒山、五台等地工作布置的指示》，1937年9月24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0页。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粉碎日军对边区25路围攻，为根据地的创立阶段。第二，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百团大战”结束，为根据地的巩固阶段。第三，从1941年初到1943年底边区军民粉碎日军的“毁灭扫荡”，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恢复阶段。第四，从1944年初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为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大发展阶段。

(一)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决策，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先后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平型关伏击敌坂垣师团所属部队。歼敌千余人。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及以后一二〇师在雁门关地区阻断敌交通补给线、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胜利，使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声威大震，为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平型关大捷后，10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主力随八路军总部南下驰援娘子关，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奉命留守五台地区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和三四三旅及一二〇师三五九

旅工作团部分同志共约二千余人，着手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已派王平、李葆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配合八路军部队在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聂荣臻部乘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分兵挺进，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在月余时间内，杨成武为首的独立团向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克复了涞源、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打开了晋察冀边区北部的局面；赵尔陆为首的军政工作团和少数部队，在晋东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打开了晋察冀边区西部地区的局面；王平为首的地方党工作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冀西的曲阳、行唐、完县、唐县等地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腹地逐步形成；周建屏、刘道生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在地方党的支持下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在井陘、获鹿、正定、平定等县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打开了晋察冀边区南部的局面。

11月7日，即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宣告成立，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廷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13日，军区决定下设四个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辖雁北、察南、平西及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辖晋东北及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

远，政委王平，辖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的冀西地区和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辖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军区成立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黄敬任省委书记。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中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遂初步形成。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从五台移驻阜平。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二万余人对边区的八路围攻，歼敌千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住了脚。

与此同时，冀中平原根据地也开辟起来。七七事变后，驻石家庄的中共平汉线省委决定党员一律坚持地方斗争，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石家庄失陷后，平汉线省委西迁泉阳与一二九师会合，下属保东、保南两特委合并为中共保属省委，继续组织抗日武装。这时，红军团长孟庆山受党中央派遣到达冀中，任保属省委军事委员，在高阳、蠡县、任丘、安新一带组建抗日游击队。10月中旬，当国民党军队从河北平原仓皇败退之际，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回师北上抗日，14日在晋县小樵镇，将该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为司令员，李晓初为政训处处长。10月底至12月初，人民自卫军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配合下，先后摧毁深泽、安国、安平等县伪组织、建立抗日的县政权，并攻占了高阳城，与保属省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合，迅速打开了冀中平原的局面，出现了群众参军、抗日的高潮。12月，吕正操奉命率领人民自卫军开赴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整训，冀中新组建的抗

日游击武装统编为“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任司令员。

人民自卫军在路西整训期间，晋察冀省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在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之间的平原地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划出了冀中范围，制定了冀中工作方针。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改名为冀中省委。北方局派鲁任书记，随人民自卫军回到冀中。二、三月间，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迅速收编和解决了多股游杂武装和汉奸土匪武装；并派部队进军大清河以北开辟平、津、保三角地带；四月，粉碎了日军对冀中的第一次春季“扫荡”。至此，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西迄平汉，东至津浦，北抵平津，南达沧石路的广大区域开辟和建立起来。

为了统一全边区的军事、政治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更好地支持敌后持久抗战，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出席代表一百四十九人，代表着边区共产党、国民党、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着边区内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义勇军，代表着各县政府和“动委会”及有着一百二十万群众的一百二十四个民众团体，代表着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以及和尚喇嘛等宗教界人士。会议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文教、司法、民运等决议案，作为边区政府的施政准绳。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以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张苏、刘奠基、吕正操、孙志远、娄凝先、李杰

庸等九人为委员。会后，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月31日承认和批准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正式委任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边区政府成立后，在冀西和晋东北分设两个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不久即改为专署），张苏、宋劭文分兼主任。4月1日又设立了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署），主任吕正操，副主任李耕涛（后为徐达本）。同时，重新委任了边区各县县长。从此，边区政权走上统一领导、健康发展的轨道。

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在彭真、聂荣臻主持下，制定了边区党的工作方针：巩固与扩大边区，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平、津、保等大城市，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之敌以威胁和打击，以支持华北抗战，牵制敌人兵力，并配合主力军在徐州的会战^①。

4月21日至5月1日，冀中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统一冀中区党、政权和军队的领导。会后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为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为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副司令员，孙志远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军分区（不久又增设第五军区分区）。

3至6月，边区级的农、工、妇、青救国会也相继成立起来，拥有会员一百余万人。

^① 1939年1月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工作报告。

根据毛泽东指示，为创造冀热察边区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进入平西，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先后开辟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地的工作，建立了四个抗日联合县政府与党的工作委员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挺进冀东和平北建立了前进基地。1938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和在平西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6月8日挺进冀东。与之相配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于7月6日举行。起义由丰润、滦县、迁安、遵化、昌黎、乐亭等七县迅猛扩展到十七个县，组织起十万抗日联军。8月，冀东抗日联军与四纵队在遵化铁厂镇会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并派马辉之、姚依林连同河北省领导机关一起到冀东，加强对起义的领导。这次大起义先后克复卢龙、玉田、迁安、薊县、平谷、乐亭等县城和几乎所有重要集镇，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路，给冀东敌伪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10月以后，由于日军调集重兵“围剿”，由于我主要领导人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决定除留三个小支队坚持冀东外，四纵队和抗日联军全部向平西撤退，致使大起义的成果未能巩固下来，军队和人民群众蒙受重大损失，后来李运昌等率抗日联军一部返回冀东，与三个游击支队会合，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以来，为配合徐州、武汉会战，曾多次袭击平汉、津浦、平绥、正太等铁路，炸火车、毁

桥梁、掀铁轨、攻车站，甚至袭入北平、保定等大城市，加上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的震动，使华北日军感受严重威胁。1938年9月，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调集了五万兵力，分二十五路向晋察冀边区腹地五台、阜平、涞源等地大举进攻，妄图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军民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四十八天激战，毙敌少将旅团长常冈宽治以下官兵五千三百余人，粉碎了敌之围攻，保卫了根据地。

为了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从1938年春开始，冀中区党委即动员全冀中军民，进行拆城、破路、挖道沟、改造平原地形的伟大工程。到1938年日军五次围攻前，冀中区内二十四座县城的城墙全部拆毁，公路全部破坏，贯通冀中各村的大道都挖成了深四五尺，宽五六尺，只能通大车，不能走汽车、坦克的道沟，造成了阻止敌机械部队行动而利于我军作战和转移的有利地形。

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两个政治主任公署、八个专署、七十二个抗日县政府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10月5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主席团在致晋察冀边区电中，高度评价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时期的工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二)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由于兵力不足，经济窘

迫，加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成为其心腹大患，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而主要致力于确保占领区，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掠夺，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军由战争初期的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变为开始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方针。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主要占领区华北，1939年初，除将参加武汉、徐州会战的日军第五、十、二十七师团回师华北外，又新编八个混成旅团扩充华北方面军，使日军在华北常驻军增至三十万人左右。从1938年冬至1940年春，日军对华北敌后新建的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期“治安肃正”“讨伐”作战。地处华北前哨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连续发动五次大围攻。1939年五、六月间，日军先后对五台、涞(源)易(县)地区和平西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1939年10月至12月，日军以两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中心区发动了大规模冬季“扫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汪精卫投降的形势下，开始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鹿钟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张荫梧为“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兼“河北保安司令”、“民军总指挥”。鹿钟麟等公然宣称不承认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和冀南主任公署。从此，河北地区磨擦事端不断发生。1938年12月，张荫梧亲率“民军”三个团从冀南闯入深泽、博野，扬言要“消灭八路军”，“收复失

地”，向冀中八路军三纵队二分区司令部进袭，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并在安平县崔安铺村杀害中共冀中二特委宣传部长宋振恒、深泽县委书记何昆山等重要干部四人，制造了“博野事件”。1939年2月，张荫梧策动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叛变投敌，并为其辩解为“施行曲线救国”。6月，张荫梧又率“民军”突袭冀中军区在深县的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将士四百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出尔反尔扬言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39年秋趁日军围攻晋察冀边区时，派白志沂带一个师到雁北地区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制造了“灵丘”、“广灵”等事件，叫嚷“赶走八路军，收复雁北十三县”；还指使杨澄源、金宪章的新编第二师在晋东北制造磨擦事端。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①成立，以彭真为书记。分局下辖晋察冀（领导晋察冀三省交界的中心区，书记刘澜涛）、冀中和冀热察（领导平西、平北、冀东三区，书记马辉之）三个区党委。北方分局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制定了边区党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指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已经来到的形势下，边区党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为此，要深入巩固边区党的组织，加强部队政治军事整训，巩固边区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开展根

^①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改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1941年彭真赴延安后，由聂荣臻为书记。

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①。

为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帮助年轻的八路军三纵队，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命令贺龙、关向应亲率一二〇师部分主力，从晋西北挺进冀中。1939年1月，与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组成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指挥的冀中区作战指挥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程子华任冀中军区和三纵队政委。

一二〇师开入冀中后，先后在曹家庄、大曹庄等战斗中，给敌以很大杀伤。4月23日，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在冀中军民配合下，由贺龙师长亲自指挥，在河间县齐会村，将敌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八百余人包围，激战三昼夜，毙敌渡边佳行联队长以下七百余人，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辉范例。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士气，稳定了冀中战局。

平汉以西晋察冀军区各部队经过整训，政治、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在1939年5月9日反“扫荡”中，与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三五八旅协同作战先后取得上下细腰涧、大龙华和陈庄等“模范的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共歼敌二千余人。10至12月，在粉碎敌冬季“扫荡”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和一二〇师特务团等在雁宿崖、黄土岭激战中又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击毙敌第二混成旅团长、敌冬季“扫荡”总指挥官、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创全国毙敌中将

^① 见《北方分局党大会的成功与为实现大会的决议而斗争》，载《战线》第十四期。

军官之首例。这一连串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进攻，巩固了根据地，鼓舞了边区和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心，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嘉奖，也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赢得了—个相对稳定的建设环境。

在反“扫荡”的同时，晋察冀边区军民对配合日军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挑衅，也按照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坚决的斗争和应有的回击。1939年6月22日，一二〇师独立二团、七一五团和冀中军区赵承金部，在深县张寿寺村打垮了专事磨擦的张荫梧部。10月，将阎锡山派来捣乱的白志沂、杨澄源、金宪章等部赶出了边区。1940年初，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和冀中部队配合一二九师和冀南部队，对进攻八路军总部的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反共军以有力打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使根据地军民能比较集中精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了。

1939年，根据中共北方分局青山组织会议的决定，晋察冀边区进行了深入巩固党的工作，着力进行边区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自下而上地进行了村、区、县各级政府的民主改造，建立、健全了各级政府的完整的行政工作系统，使边区的政权建设得到了加强。在连续两年行政村选举的基础上，1940年7至10月，晋察冀边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施“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在各战略区进行了空前热烈的民主大选举运动。边区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和区长、

县议会和县长、边区参议员和准备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逐步健全了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体系和一整套民主制度确立起来。在这次民主大选中，边区各地参加选举的选民平均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九，游击区也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妇女参选者达百分之八十三·六。这在战事频繁、碉堡林立、日伪法西斯统治横行的华北敌后，是一件了不起的民主壮举。当时华北日军的反动刊物《剿匪指针》惊呼：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大选“浓厚的表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之实施”，“人民认识到与政权有了关系，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的现象”。

在民主大选中，1940年8月，北方分局颁布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即著名的“双十纲领”。这个纲领是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制定的，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它适时地总结了我党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验，颁布了边区党的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为此后根据地的建设拟出了一个全面的纲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双十纲领”的颁布，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力进行了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行减租减息，整顿税收，统筹统支，赈济灾民，奖励生产、开荒、修滩、兴修水利和合作运销事业，使边区经济开始得以复苏和发展。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即建立了边区银行，发行了“边币”。随着边区财政经济的发展，“边币”逐步排

斥了境内各种杂钞和日伪“联银券”而独占边区市场。根据地的巩固，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以战养战”的阴谋，改善了民生，保障了军需，也使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据统计，全边区有四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华北联大、抗大二分校、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十一所中学、六所师范和一所农中，小学一万所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百分之六十五以上^①。全区有各类重要报刊二十余种，如《抗敌报》（后改《晋察冀日报》）、《抗敌三日刊》（后改《子弟兵》）、《新长城》、《边政导报》、《抗敌画报》、《冀中导报》、平西《挺进报》、冀东《救国报》等，有的发行量达万份以上。边区还有从延安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大众剧社、联大文工团、冀中火线剧社等十余个职业剧团。这些学校、报刊、剧社以及数不清的民间夜校、冬学、村剧团、歌咏队等，汇成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洪流，大大提高了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力地抵制了敌伪反动腐朽文化的侵袭。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巩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1939年初，在成立冀热察区党委的同时，在平西建立了以肖克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2至6月，挺进军粉碎日军对平西的两次围攻。3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平西设立第四专署，专员杜伯华（后改第六专署，专员朱其文）。到1940年初，平西发展为东北至平绥路，北至张家口，南

^① 宋劭文《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43年1月。

至紫荆关，与晋察冀区连成一片，有三十万人口的巩固的根据地。1939年6月以后，冀东党和部队坚决执行中共北方分局军城会议确定的“由小股的多股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大的游击队，由多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游击根据地”^①的方针，使冀东游击战争蓬勃展开。1940年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冀东设立第十三专署，专员焦若愚；以冀东十三支队为基础建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员包森。到1941年初，冀东已逐步连结为大块游击根据地，人口达一百余万。1938年10月和1939年夏，宋、邓四纵队和冀热察挺进军先后两次派部队开辟平北。1940年初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部派苏梅、钟辉琨带一个主力连和平北游击支队到平北，站住脚之后，又派白乙化率十团开入平北，在“巩固向前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很快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7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平北设立第十四专署，专员张季樵（又名张致祥）。到1941年初，平北已发展成为东至潮河，西临宣化，南迄平绥路及十三陵，北抵白马关、汤河口和云州堡，拥有五个抗日联合县政权和四十万人口的大块游击根据地。

到1940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包括晋察冀（后改称“北岳区”）、冀中、冀热察三个战略区，拥有一个行署（冀中）、一个办事处（冀北）、十三个专署、九十余个县政府和一千五百余万人口的广大区域。

①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冀东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25日。

为了配合全国正面战场的作战，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振奋民心，1940年8至12月，晋察冀边区部队四十六个团积极参加了闻名全国的“百团大战”，担任破击正太路平定至石家庄段以及平绥、平汉、北宁各线和克复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敌主要据点的任务。数十万群众和民兵协助部队破路、炸桥和拔除敌伪据点。边区部队与晋绥、晋冀鲁豫边区兄弟部队一起，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敌大小据点二千九百多个，破坏铁路九百余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还一度攻占了天险娘子关，使正太路中断一个月之久，给华北敌人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有力地遏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暗流，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此后，华北日军加强了对我根据地的进攻，边区进入艰苦斗争时期。

(三)

在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就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把侵略矛头指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广大区域。为此，日本急于解决中国战事，一面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军事压力和外交劝诱，一面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进攻。1941年，华北日军增至三十二万五千余人，伪军增至十余万人^①，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也换成阴险毒辣

^① 彭德怀关于《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1941年11月1日。

的冈村宁次。他们吸取了以往“肃正作战”的教训，研究了
中国内战时期反动派“剿共”的经验，变单纯的军事进攻为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位一
体的“总力战”，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
步为营、有计划的“蚕食”和连续围攻、反复“清剿”；变一
般的烧杀抢掠为彻底摧毁我根据地的“三光”政策（即杀光、
烧光、抢光）。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伪在华北连续进
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使其在华北地区的殖民
统治稳固起来。处于华北敌人心脏地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首受其害。1941年五、六月第一次“治强”运动期间，
日军先后集中四万和二万余兵力，分别对冀东和冀中十分
区进行大举围攻。同年8月第二次“治强”运动期间，日军
集中在华北所能抽调的全部机动兵力七万余人，由冈村宁
次直接指挥，对北岳^①和平西区进行了“铁壁合围”大“扫
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华北变为“大东亚战争
的兵站基地”，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扫
荡”和摧残。1942年第四、五次“治强”运动期间，日军先以
四万余兵力对冀东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三期大规模“肃正作
战”；又从5月1日起，集中五万余兵力、八百辆汽车，配
以飞机、坦克、骑兵，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月
之久的空前残酷的“拉网扫荡”。为避敌锋芒，冀东和冀中
八路军主力分别转移至长城以外和平汉路西，边区的平原

① 1941年1月1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改为北岳区党委，其所
领导的晋东北、冀西五个地委范围的行政区域——“晋察冀区”也称为
“北岳区”。

根据地遂大部暂时被敌占领。日军在“扫荡”中，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烧杀，制造了丰润县潘家峪、遵化县鲁家峪、平山县驴山和定县北町村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抓捕、屠杀我干部、群众十万余人。日军还进一步推行“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内外增修铁路、公路一万余公里，封锁沟墙六千二百余公里，据点碉堡四千二百余个，将冀东游击根据地切割为二十余块，将冀中平原切割为二千六百七十小块。同时，在长城两侧、热南山区和晋东北实行野蛮的“集家并村”政策，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无人区”。日军妄图凭借这些密如蛛网的点碉、公路和封锁沟墙，割断山地与平原、根据地与游击区、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这时晋察冀根据地巩固区缩小，大部变成了游击区，部队和地方干部牺牲很大，财政经济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为了保卫根据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边区党和政府领导军民与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1年秋，北岳和平西区军民在冀中区和晋绥、晋冀鲁豫边区兄弟部队配合下，经过两个月奋战，毙伤敌五千五百余人，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易水河畔狼牙山战斗中，日军二千五百余人分数路向我围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战士，为掩护主力转移，打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承受了数千发炮弹的轰击，退路被切断后，全班战士顽强奋战，杀伤敌近百人。最后五名战士，即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战士、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砸毁武器，壮烈跳崖，表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

的英雄气概^①。1942年，冀中军民在“五一”反“扫荡”战役中歼敌一万一千余人。在赵户村、白庄、北侯村等地，冀中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利用地道和地雷爆炸运动，坚持地方斗争一月之久。在宋庄战斗中，冀中军区两个连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击退敌二千五百余人的多次冲锋，毙敌“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四百余人，我只伤亡七十三人。在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随主力部队暂时转移后，6月4日，北方分局决定，成立以程子华为首的冀中临时区党委，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领导冀中军民，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东八路军在1941年冬至1942年2月，发起打伪治安军战役。三个月毙伤俘日伪军官兵五千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二十余个，粉碎了日军企图依靠伪治安军统治冀东的阴谋。在基本区暂时被敌人占领后，冀东主力部队又转入长城外热南山区，把抗日的火焰燃烧到了伪“满洲国”境内；同时还开辟了滦河以东和北宁路以南新的游击区。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进攻和封锁，根本扭转根据地缩小的被动局面，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指示，制定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正确反“蚕食”斗争方针，将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部队相配合，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变敌占区为游击区^②。并决定以主力部队

^① 狼牙山五勇士中，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负伤幸存。

^② 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2年9月15日。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分散活动和深入敌后，协助地方大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地道战和地雷爆炸运动。会后，部队与地方党联合派出数十支一元化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在县委领导下，负责恢复重建游击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工作，在敌后坚持与创造各种各样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武工队”的深入敌后和主力部队的分散活动，使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得到蓬勃的发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及“雁翎队”水上游击战等空前活跃，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加上游击区抗日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使各种隐蔽的抗日村政权在广大游击区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逐渐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封锁，扭转了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使根据地重新恢复发展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1942年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加强了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成为边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保证。边区农、工、妇、青以及“文教”、“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改组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1943年1月，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到会代表二百八十八人，党外人士接近半数。会议总结了边区政府五年来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提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确定中共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及纲领实施重点、边区选举法和边区各级政权组织法等法规；按照“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成仿吾、于力，驻会参

议员和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臻于完善，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边区党政军民各机关结合整风运动厉行了“精兵简政”。1942年初，取消了冀热察挺进军番号，肖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下属平西、平北、冀东部队改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归晋察冀军区直辖。同时撤销了冀热察区党委，平西地委划归北岳区党委，列为十一地委。平北、冀东地委由北方分局直辖。1943年8月，又撤销冀中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建制及北岳区党委建制，设立冀中和北岳区工作委员会，作为北方分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该区日常工作。同时，程子华、刘澜涛调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①。在精兵中，军区还抽调十二个团，并配炮兵营、工兵连等支援晋绥、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通过精兵简政，部队缩编，各级党政群机关脱产人员精简一半以上，减轻了边区人民负担，休养了民力，也使机关工作效率和部队素质得到了提高。

边区还深入实行了统一战线的财政经济政策。从1941年起实施了有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的统一累进税。修订了减租减息条例，进一步调整了边区抗日各阶级间的经济利益。同时，整顿了合作事业，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众互助经济组织，在组织群众互助救灾，发展生

^① 1943年9月聂荣臻赴延安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肖克代理军区司令员职务。1944年肖克赴延安后，军区司令员由程子华兼理，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

产，繁荣贸易，平抑物价，打击奸商，与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和合作事业的发展，不仅活跃了边区经济，而且使边区在最困难时期取得了与敌粮食、物资等争夺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挫败其以华北为“兵站基地”的阴谋，为根据地渡过难关提供了物质基础。

1943年9至12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四万余兵力对北岳区为时最长、最野蛮、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扫荡”。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屠杀、破坏，制造了井陘县老虎窝、黑水坪，易县寨头村，平山县岗南和阜平县干阳等一系列的大惨案，用毒气熏、刺刀戳、铡刀铡、军犬咬、剖腹、挖心、火烧、活埋、轮奸等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我无辜群众六千余人，烧毁房屋十三万余间，掠走衣物四十五万余件，牲畜、家畜八万余头……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但日军想摧毁我边区的企图却彻底破产了。在三个月的反“扫荡”中，边区主力部队与民兵游击队紧密配合，打得非常出色，共毙伤敌伪军九千四百余人。边区民兵单独与敌作战二千一百九十二次，爆炸地雷四千四百余个。毙伤敌伪军五千六百余人，占歼敌总数一半以上。主力部队作战二千零八十三次，收复据点二百零四处，还先后袭入保定市和易县、望都等十二个县城，与敌后武工队紧密配合，在敌后展开政治攻势，瓦解伪军，共恢复和开辟了一千零七十四个村莊。边区军民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宣告了日军“蚕食”、“扫荡”政策的彻底失败。

到1943年底，北岳区被敌“蚕食”的地区已基本恢复，还新增了孟寿、蔚阳宣、怀涿、定易涿、龙崇宣五个抗日联合县。冀中区军民攻克、逼退了日伪军据点、碉堡一千余个，恢复和开辟了三千多个抗日村政权，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在冀中平原广大地区恢复建立起来。冀东八路军主力1943年春、夏返回关里，开展了恢复基本区的战役，到8月末，攻克敌据点、碉堡三十九个，歼敌二千三百余人，在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摧毁了敌人的沟壕堡垒，解放了长城沿线的“无人区”，除蓟县部分地区外，基本区的抗日政权都得到了恢复，还新增了八个县。由于冀东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当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冀东设立冀热边行署(十三专署即撤销)，李运昌兼行署主任，朱其文为副主任，下辖五个专署、十八个联合县政府。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的不断恢复和发展，为迎接对日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根据地大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四)

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巨大变化。在欧洲，苏联红军将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境后，发动了全面进攻，直捣法西斯巢穴；英、美军队也于6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接连在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和菲律宾群岛登陆，展开了对日军的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已面临穷途末路。7月，

东条内阁辞职，次年4月，小矶内阁又告垮台……为了挽救在亚太地区的颓势，支持太平洋战争，日军急于打通中国大陆到南亚的交通线，从1944年4月到12月，集中兵力沿平汉、粤汉、湘桂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这时华北日军频繁南调，兵力空虚，开始部分收缩据点。这就给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进行局部反攻和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

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热烈的减租减息和全民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减租减息已开展过两次，这次按“二五减息”、“分半减息”、“地租不超过租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活租”改“死租”、“租种年限一定三至五年”等规定，进行普遍的“查租、减租、增资”运动，使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基本区和广大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深入的贯彻。从而使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佃农、雇工的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和对敌斗争的蓬勃开展。在全民大生产运动中，1944年边区政府发放贷款二千万元，贷粮一万八千石，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仅冀西、晋东北二十六个县即组织“拨工组”三万八千五百个，参加群众三十二万七千二百余人，冀中组织了三万余个劳动互助组，平均提高劳动效率百分之三十。全边区扩大耕地面积五十三万亩，旱地改水田十一万亩，施肥量比1943年增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增产粮食三千四百万斤，增添牲畜二万二千头。部队、机关也参加了大生产，做到了自给一个半到两个月的口粮和全部菜金。边区的副业、运销、生

产合作社，由1943年的二千余个增加到三千八百多个。社员由二十九万余人增加到六十八万八千余人，股金由二百余万元猛增到二千七百余万元^①。边区经济开始振兴和繁荣起来，为根据地进行反攻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力量。

1944至1945年初，边区开展了热烈的“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大练兵运动，密切了军政、军民团结，大大提高了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军事素质。

1944年，北岳和冀中区开始了局部反攻。北岳区军民全年作战一千三百八十四次，歼敌七千二百六十七人，攻克敌据点、碉堡四百四十一座，恢复和开辟村庄一千六百多个，解放国土一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八十万，打开了察南、雁北地区的新局面。冀中区军民举行了“拔碉战役”，全年作战一千八百五十四次，毙伤俘敌伪军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八百一十五座，解放村镇五千余个、人口五百余万，不仅恢复了冀中全盛时期的局面，而且开辟了津南地区。冀热边区也开辟了通县以南地区，打通了与冀中的联系。由于边区地域的扩大，为适应反攻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1944年7月28日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下设四个区党委：原北岳区党委划分为冀晋（王平为书记。辖第二、三、四、五地委）、冀察（刘道生任书记。辖第一、十一、十二、十三地委）两个区党委，恢复冀中区党委（林铁任书记。辖六、七、八、九、十地委），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李运昌兼书记。辖第

^① 见宋劭文《1944年大生产运动总结及1945年的任务》，载1945年3月6日《晋察冀日报》。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地委)。同时，在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下，也分别设立与区党委名称、辖区相同的四个二级军区和四个区行署。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委王平，行署主任杨耕田；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行署主任张苏；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林铁，行署主任罗玉川；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行署主任张明远。

中共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1944年还领导边区各级党委大力开展了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特别是东北工作^①，扩大了对敌占区宣传，争取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中数百万工人、贫民和数十万伪军、伪警及各阶层人民，以迎接全面反攻的到来。

1945年上半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②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向敌伪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春夏季攻势。到7月，冀晋、冀察部队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二百三十三个，收复灵丘、涞源、怀安三县城，解放了察南雁北大部地区，使冀晋、冀察两区联成一片，为向察北、热西挺进，解放张家口奠定了基础。冀中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任（丘）河（间）、文（安）新（镇）、安（平）饶（阳）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战役，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三百多个，克复任丘、河间、饶阳、

① 晋察冀边区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从根据地初创时即开始，到1944年得到加强和发展，多年来，对根据地建设和全面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② 引自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载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安平、武强、文安、新镇、深泽、新安、交河等十二座县城。除赵县、高阳、雄县等部分县城外，我军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而且向津南、北平近郊发展，与渤海、冀热辽区联成一片、为围困平、津打下了基础。冀热辽区军民2至5月打退了日伪军七万余人的大“扫荡”，毙伤俘敌伪军五千余人，巩固了基本区；6月，组织三个挺北支队深入锦承路北围场、赤峰、朝阳、锦州一带，进行热辽战役，收复热中和辽西部分地区，为挺进东北开辟了通道。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军出兵东北，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10日、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大反攻令。根据延安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冀晋、冀察部队向察绥挺进，于8月16日与苏蒙联军在张北胜利会师，23日冀察部队攻占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地张家口市，接着解放了察哈尔全省和绥东地区。冀热辽军区12日成立以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纵队”，19日军区主力及朝鲜义勇军万余人和四个地委书记、二千五百余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向热河、辽宁挺进。西路克复围场、隆化、滦平等县城，与苏军会师承德；中路北出长城喜峰口，经凌源，抵平泉、赤峰、建平、新惠、乌丹等地区，与苏军会师，解放了热中、热北广大地区。东路从抚宁县出发向东北挺进，30日与苏军协同攻克山海关，9月5日与苏军胜利会师沈阳，沿途接管十三县和锦州、阜新两市。14日，曾克林等飞抵延安，及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进军东北的情况。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立即组成以彭真为

书记的东北局。还决定从延安及各根据地抽调十万大军、二万余名干部和二千余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赶赴东北，创建东北解放区。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我冀热辽军区部队又分赴东北各地接管了几十座城市，消灭日伪满残余势力，维持秩序，镇压土匪，为我解放区部队和干部大批开入东北，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冀中军区部队东线八、九、十分区主力向天津市郊和北宁、津浦路沿线进攻，在北起北宁路、南至津浦路唐官屯的一百五十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以攻打天津为重点的全线大出击，曾攻占杨柳青，攻入天津西站。南线六分区向石德线出击，解放了束鹿县城，切断了石德线敌之交通，先头部队直逼石家庄。西线七分区主力向平汉线保定至正定段展开进攻，攻克保定外围众多敌据点，并一度攻入保定机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阻止日伪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我军的进攻遇到日伪军的顽抗。因此，根据中共中央军委8月22日指示，晋察冀军区改变以主力部队夺取大城市的作战部署，除继续围困大城市外，采取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大解放区，歼灭敌伪有生力量，获取敌军装备的作战方针。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坚持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在大反攻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七万多人，收复了张家口、宣化、山海关等七十多座城市，解放了热河、察哈尔两省的全部和河北省的大部、山西、绥远、辽宁省的一部，从而使晋察冀边区与晋绥、晋冀鲁豫、

山东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边区正规部队由初创时的二千余人发展到三十二万余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九十余万人，党员发展到二十二万余人，群众团体拥有会员三百余万人，区域也由初期的四十余个不完整的县发展到拥有一百六十余县和三千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贡献与成就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关怀领导下，在各兄弟根据地的紧密配合下，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与成就概括起来主要有：

1. 晋察冀边区作为我党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我党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理论和决策的英明正确。它的创立和发展，“在华北抗战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①不仅为我党建立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道路。它屹立在华北敌后，还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但中国是不会灭亡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走，从而大大

^① 彭真：《军区三周年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与晋察冀日报》，载1940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

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声誉。正如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晋察冀边区“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其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①。

2.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抗击了敌人大量兵力，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战八年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抗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华北日军和二分之一以上的华北伪军及部分关东军、伪满军。据不完全统计：边区1938年抗击日军七万六千余人，1940年抗击日伪军十一万余人，1942年抗击日伪军十八万二千余人，1943年以后，抗击日伪军总数超过二十万人以上^②。边区军民共与敌作战三万二千余次，歼灭敌伪军三十五万一千余人，收复国土三十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三千余万。它在军事上、战略上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以其英勇的斗争直接威胁着敌人的战略后方，使敌人深陷敌后游击战争的泥潭，拖住了日军西进、南进、北进的步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也支持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堪称“华北抗战的堡垒”^③。

① 见《中共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

② 引自《晋察冀边区七年来的军事战果》，载1944年7月18日《晋察冀日报》增刊。

③ 见毛泽东为聂荣臻著《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5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一书写的序言。

3.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模范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在敌后最早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并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在华北敌后树立起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典型。晋察冀边区还按照党的“三三制”政策，在历次民主大选中，逐步调整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成分，使边区内的国民党及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巩固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制定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又称“双十纲领”），把边区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经验，以纲领的形式总结公布出来，受到边区内外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被赞誉为“目前全国模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设施计划上“最好的参考和借镜”^①。由于边区党模范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最广泛地动员团结了边区各阶层人民，才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能在敌人心脏地区创立起来，而且能在最残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一支重要力量。

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雏型，建立了一套新民主主义制度，制定了很多新的政策，

^① 《新中华报》1940年10月3日社论《中共晋察冀边委的施政纲领》。

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在抗战中，它不仅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即新民主主义政权，彻底摧毁了封建的政治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了崭新的政权机构和民主制度，而且实施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各项经济文化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激发广大农民抗战的积极性，争取了抗日的地主，改变了农村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使边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把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模型具体地体现出来，因而使全中国人民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光辉前景，对于促进全国政治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5.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非常重视财政经济建设，与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经济斗争。边区不仅在敌后最早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边币”，还最早实施了救国公粮制度，卓有成效地支持了游击战争中军队的粮草供应，先后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比较完备的、统一战线的税收政策——“统一累进税”，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繁荣经济的有效措施，从而使边区经济即使遇到敌人严重破坏的最艰苦时期，仍具有持久的健康的耐力，并取得了对敌货币斗争、粮食斗争和市场、物资争夺战的决定性的胜利。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抗战军需民用，支持了持久抗战，挫败了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以战养战”和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阴谋。

6.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对日反攻的前进阵地，为

收复东北失地，建立巩固的东北解放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建立之初起，就对平、津、唐等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工作。此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为晋察冀分局）“城委”和“城工部”的直接领导下，这一工作得到深入的发展。1942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又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数年中培训了大批优秀干部派往东北各地，侦察敌情，建立地下交通，联络抗日力量，为收复东北积极准备条件。在大反攻中，晋察冀边区部队最早挺进察绥、热河和东北，与苏蒙联军会师，解放了察哈尔、热河全境和东北广大地区。此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又输送了数万人的部队和数千名干部支援东北，为我党建立巩固的东北解放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坚持实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形成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紧密配合作战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军事作战体系。同时还依靠群众创造了一整套适合游击战争环境的后勤供给、兵源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讯联络等工作系统和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群众游击战术。这样就实现了不仅在地，而且在平原动员起千百万群众参战，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形成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奇观，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8. 八年抗战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的残酷

性和剧烈程度是罕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边区子弟兵伤亡十一万六千余人，干部、群众被敌残害致死七千余人，被敌抓劳工五十万五千余人^①。但是，残酷的对敌斗争也锻炼了这里的人民，在他们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如：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回族人民的英雄儿子马本斋和他的母亲——马老太太，青年英雄金方昌，少年英雄王璞，战斗英雄邓世军，爆炸英雄李勇，“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和印度人民的好儿子白求恩和柯棣华；以及周建屏、刘云彪、李光汉、白乙化、王仲华（董毓华）王平陆、包森、周文彬、鲁贲、常德善、翟晋阶、袁心纯、王先臣、刘萍等。他们是在这块土地上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抗日英雄、烈士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伟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后人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而奋发努力。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造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正确政策的胜利，是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独立自主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和进行持久战的思想，以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和体现。同时也是边区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军民

^①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抗战八年来边区人民损失初步统计》，载1946年2月6日《晋察冀日报》。

英勇斗争、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人民战争的光辉胜利。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造和成就，作为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一部份，已经载入中华民族解放的光荣史册。

(此篇由居之芬、谢忠厚执笔，丛书顾问和编委集体修改审定。)

1927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长江局的成立经过、组织状况、 管辖范围、职权与任务

长江局是在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由汉迁沪后建立的。党的八七会议决定“组织南方局于广东”^①；8月9日，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决定成立北方局。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由于八七会议决定“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仍在武汉”^②，由中央直接领导。“八七”会议后，两湖秋收暴动是全党工作的中心，所以也要由中央直接指挥，故未设立长江局。9月中旬，两湖秋收起义失利，同时，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中央乃决定离汉迁沪，等广东工作有了头绪再迁广东。这样，中央迁离武汉后“将与长江各省隔绝关系”^③，也就无法直接领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9月21日，中央常委在讨论党中央驻地迁移的同时，提出了对于中部几省的工作指导应有“一个办法”，但未作具体研究。9月

①② 中共中央《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1927年8月7日。

③ 《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议决案》，1927年10月1日。

28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了中央三个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即行赴沪的日期。鉴于中央主要负责人即将离汉，长江局的设立便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而提上议事日程。故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建立长江局的各项具体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责成由罗亦农提出的长江局组织草案，确定了长江局委员、秘书长名单；并决定设立长江局军事特派员和人选。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对长江局的管辖范围、职权及主要任务作了明确规定。10月2日，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罗亦农、王一飞、任旭，李维汉代表中央常委参加了会议，并对长江各省的工作作了“移交”。会议讨论了长江局的组织分工和湘、鄂、皖、赣各省的工作。会议决定，长江局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等五人组成。这次会议实际上宣告了长江局的正式成立。10月2日，长江局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兼八省军事特派员，调易礼容为秘书长，蔡振德为秘书，欧阳钦负责军事方面的技术工作。但是，作为长江局成员之一的毛泽东，当时正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与中央的联系一度中断，长江局也始终未能与他取得联系。而易礼容时在安源，不久脱党，也未到职，秘书长一职，改由蔡振德担任^①。

10月17日，罗亦农、王一飞奉中央之令去长沙改组湖

^① 《蔡振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7年12月23日。

南省委，此前两天，长江局召开会议决定：由任旭代理长江局书记，任旭、陈乔年和共青团长江局书记刘昌群三人组织常务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大的政治问题还需留待罗亦农回汉后决定^①。10月28日，罗亦农由长沙返汉，王一飞则留在长沙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②。此后，在汉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即为罗亦农、任旭和陈乔年。

长江局的管辖范围，《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规定“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10月2日长江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中央又将甘肃划归长江局管辖。

对于长江局的职权，中央指出：长江局不是中央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所辖各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八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③。

中央还规定了长江局的任务：第一，“坚决发展土地革命”，这是长江局的“最大任务”。在土地革命中心区域的湖北、湖南，“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对农运较发展的河南，也须“同样注意”；对安徽、四川、江西、陕西、甘肃等省的农民运动，“亦不可忽略”。第二，“发展所属范围内之职工运动特别是武汉三镇，目前的主要工作为：发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与

①② 《罗亦农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0月17日。

③ 《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

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①。第三，“改造所属各级党部”，特别要“注意党内干部之培养与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同志工作”^②。

11月初，中央通知罗亦农：决定撤销长江局并调他到中央工作^③。11月2日罗亦农召集长江局会议，宣布长江局工作结束。4日，罗亦农与任旭离汉去沪参加9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罗亦农即留中央工作。11日，中央正式作出了撤销长江局的决定。

1927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从成立到撤销，时间只有一个月。由于时间短，交通不便，对于所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党的工作指导并未实现。但是，对于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党的工作指导是卓有成效的，主要表现在：抵制了党内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正确指导了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为党在湘、鄂、赣、豫、皖等省由夺取中心城市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转变，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共同努力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抵制“左”倾盲动主义

长江局成立时，中国革命已处在严重的困难中。继九月中旬两湖秋收起义失利后，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流沙

^{①②} 《中共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

^③ 《罗亦农给中共中央信》，1927年10月17日。

西又遭敌伏击，退入海陆丰。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第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浪潮已经过去。在新的形势下，党的策略是继续进攻、夺取大城市？还是退向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力量，待机而起？这是当时成为对革命进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使八七会议上已经开始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在党内继续生长。同时，国内出现了新旧军阀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混战的形势：10月2日，北方爆发了晋奉战争；在南方，广东的张发奎与李济深之战和宁、汉间李宗仁与唐生智之战也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更增加了一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长江局所属各省，到处都出现了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急性病。当时中央认为：“军阀混战，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稳定；叶、贺失败之后，中国革命不但不低落，而且正在高涨而进于新的阶段”。因此此时党的政策，应以“发动群众反对混战的南北军阀，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①。10月10日，中央发表《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号召“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的政府”，“建立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在实际工作中，中央继续坚持夺取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认为此时对于广东“应当确定准备暴动夺取全省政权”^②，命令南昌起义军在失去潮、汕后，迅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取得

^{①②} 瞿秋白文章《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② 瞿秋白文章《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广州后，即“召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①；同时，“严厉的批评”湖南省委取消9月16日长沙暴动的计划，是“临阵脱逃”，严令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②，并决定立即“召集湖南紧急会议，改组省委”^③，以贯彻中央原定方针。

对于中央的上述错误方针，长江局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以罗亦农为代表的长江局认为：“依两湖秋暴失败与广东失败（按：指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失败）及暴动力量之准备等情况，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④并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着的对形势盲目乐观的估计和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情绪，长江局还反复地、着重地阐明了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指出由于敌人政权的分裂和在反动统治下工农、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日益下降，中国革命潮流“必然继续向前发展”^⑤，但也要看到广东、两湖秋收暴动失败的影响，目前，我们不能即刻举行大规模的总暴动，“要达到暴动，首先须创造新的革命潮流，否则不能集中群众的力量镇压敌人”。^⑥

第二，新军阀混战，在客观上可以推动革命的发展，

① 《中央致南方局及广东省委信》（文件收文印戳日期为1927年9月，但从内容上判断应为10月上旬）。

② 《中央给湖南省委信》，1927年9月19日。

③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④ 《罗亦农给中共中央信》，1927年10月17日。

⑤⑥ 罗亦农：《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10月。

党应当利用这一形势，“发展和扩大我们党的工作，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工作”，^①但能否立即暴动，还要看“我们主观的力量”和“暴动之前的组织上、技术上与政治方面的准备”，如果“过于把敌人的力量估量太低，我们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就会“发生冒险主义的行动，把暴动看做玩笑”^②。

根据上述方针和指导原则，长江局对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在条件不成熟时立即举行暴动的主张，进行了抵制，突出的有三件事：

第一，反对河南省委即刻举行全省暴动的计划，支持豫南特委有准备的，“从小的暴动开始，进行到大的斗争”的方针。

9月7日，在河南爆发了冯玉祥与靳云鹗之战。27日，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攻河南。在此形势下，省委认为：河南此时已是“暴动局面”。为了“响应两湖暴动”，省委决定于10月10日“开始全省总暴动”^③。暴动的计划是“将河南全省分为四个暴动区：东以杞县为中心，北以彰德为中心，中以郑州为中心，南以信阳、确山为中心，以及京汉、陇海两路发动部分的暴动，汇而为全省的暴动”^④。同时，规定农民运动要以“摧毁冯玉祥的统治，铲除土豪劣绅大地主，夺取乡村政权，以至

① 《长江局亦农致江西省委信》，1927年10月24日。

② 《亦农同志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③ 《霍锷镛报告》，1927年10月30日。

④ 《河南省委报告》，1927年11月14日。

⑤ 《胡健报告》，1927年10月5日。

建立城市平民革命政府”^①为目标。

河南省委的上述计划是不符合实际的。客观上，“河南军队，非常之多，密布全省”，“各县各村，几乎都住满了军队”；主观上，“党的力量在农村中非常薄弱，除杞县和确山稍为〔微〕有点组织外，此外可说毫无组织”^②。在这种情况下，想发动大规模的暴动，是绝不可能的。10月10日，由于暴动发动不起来，省委又决定全省暴动时间“改为17号，并严令豫南特委特别动作”；指示信阳四望山，非立即进攻不可。但到了17日，“除焦作方面动了，而其他方面因事实关系并无动作”^③，省委不得不再次更改全省暴动时间为25日。但是到25日，全省的暴动仍然未发动起来。

河南省委的上述错误决定，受到了豫南特委的坚决抵制。当时四望山上虽然有被地主屠杀政策逼迫而自发上山的农民三四百人，但党的工作并无基础，只在8月下旬，才有一名党员王伯鲁上山与之“结成生死兄弟”，并被推为团总。同时，山上粮食甚少，长枪也仅有30枝，手枪10余枝。而在离四望山几十里之信阳，驻有岳维峻一个旅和一个团，岳还准备加派两个旅；确山还驻有冯玉祥的精锐部队。尽管确山有二名党员做民团团总，可率领五六百支枪，但暴动也只能杀几个豪绅，要取得夺取政权和分配土地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根据上述情况，豫南特委以自己的组织和其他力量毫无基础，时间太快，准备不及等为理由，提议推迟暴动时间，“先行从小的暴动开始，进行到

^① 《河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9月。

^{②③} 《胡健报告》，1927年10月5日。

大的斗争”^①。豫南特委还尖锐地批评河南省委原定几天内举行大暴动，夺取县城的计划，是“坐书房里作空的计划，发空的命令”，“勉强令几个地方动作一下”，结果只能是“徒牺牲几个同志”^②。但是，河南省委却指责豫南特委要求推迟暴动时间的意见，是“丧失暴动的机会”，以组织无基础准备不足为名，实际上是“取消暴动”；还说“群众革命的热情，就是暴动中的机关枪、迫击炮”，只要有“如狂如潮的群众暴动”，则不仅能“铲除豪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财产”，而且能“夺取乡村政权，甚至解决敌军武装”。因此，省委训令豫南特委须完全接受省委的意见，即时发动暴动。

在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争执中，长江局坚决支持了豫南特委的正确意见。罗亦农指出：“17日之暴动可暂停止，因无一点准备工作，徒然惹起一番屠杀，于工作无补”，并尖锐批评河南省委把“暴动好象看作玩笑”的错误，强令省委停止全省总暴动，“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从事暴动的准备工作”。10月底，长江局函召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和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到汉，当面解决河南省委关于暴动问题的争论。根据长江局指示精神，11月，河南省委在《最近工作计划决议案》中规定：“目前河南工作方针，在深入工农群众，组织这一革命潮流，不是即刻发动一个总的暴动，而是要于最近时期内，坚决的依据贫苦工农群众的要求，依赖贫苦工农群众自身争斗的力量，集中的发动游击战争，

① 《霍锐镛报告》，1927年10月30日。

② 《河南省委致豫南特委信（第五号）》，1927年10月。

朝着与湘鄂赣一致总暴动的路上走去”。

第二，抵制了中央关于发动湖南全省暴动的错误主张。

湖南暴动，是中央继续暴动政策的全盘计划中的重点。在中央的严令下，湖南省委于10月初，指令全省各县“不要顾及失败、成功，应即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反动派”，并要求各县普遍的“夺取县城”，而“不要顾虑夺取县城后无法可守”，认为只有“各县暴动，动摇现在反革命的政权，我们才可夺取省城”^①。

17日，中央派罗亦农、王一飞离汉赴湘。在罗亦农的主持下，于22日至24日，在长沙郊区召开了湖南省委紧急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执行了中央的错误决定，对9月间湖南秋收起义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进行了不正确的分析，指责湖南省委停止16日夺取长沙暴动的决定是错误的，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因而改组了省委。但是，这次会议还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这就是在罗亦农指导下抵制了当时党内颇为强大的盲动主义思潮。会上，罗亦农代表长江局作了《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针对党内不顾成败、暴动就是一切的思想，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的暴动，并不是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一句某年某月以中国农民暴动为光荣，而是要得着实在的胜利。暴动是要破坏敌人的军队，毁坏敌人的一切力量，才能夺取政权，但它必须经过认真的“准备工作”。所以党的策略，依

① 《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1927年10月5日。

旧是照着暴动的路上走，但不是马上暴动。当前，“主要的工作”，是“准备第二次暴动”。湖南省委紧急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罗亦农的意见。会议通过的由罗亦农起草的《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指出：湖南“全省总的暴动”“暂时已经过去”，新省委的责任，在于“准备最近将来全省总的暴动”，党目前在湖南的主要政策应当是：“组织与集中这许多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与行动，制造全省的新的革命高潮”，也就是“在最近的将来积极地组织与爆发湖南全省的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暴动，推翻新军阀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革命的政权”。

第三，制止武汉暴动。

1927年10月18日，宁汉战争爆发。宁方组成了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西征军，分两路向西进击。25日，西征军不战而入安庆，汉方唐生智部队自安徽退入湖北。26日，湖北省委在得知唐生智兵败的消息后，召开了第八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在新形势下的党的策略。会议一致认定：“唐生智的崩溃很迅速的就要到来，整个湖北有由局部骚动达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决定立即“竭尽全力征调其所有之群众”，“向群众提出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27日，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布的《目前紧急斗争决议案》决定：“领导武汉工人立即发展普遍的斗争及骚动，一直发展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动，准备实现苏维埃的政权”，并提出：“暴动打倒唐生智的反革命政府！”“暴动占领工厂管理生产！”“暴动杀尽工贼改组委员会及一切反动派！”“暴动实现工农兵的政权！”等口号。随后即开始调查自己的武

器情况及反动机关、反动派的住址，准备宣传品，并分区召集武汉三镇活动分子会议进行动员，积极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也认为：“宁汉战争有第二次发动工农群众整个的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遂指令两湖省委“立即召集省委会议，仔细讨论如何实现这一个可能”，并“坚决的勇敢的准备”^①。

28日晨，罗亦农由长沙回到武汉。在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罗亦农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当即表示反对马上举行夺取武汉政权的暴动。他指出：新军阀混战与唐生智统治的日益崩溃，固然在客观上“造成了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②，但从主观力量来看，武汉三镇“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没有领导群众的把握；工人运动还没有大大的发展。换言之，工人情绪还没有从日常争斗发展到总争斗的形势；武装暴动的技术准备几乎等于零；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展到割据的局面，且未普及全省；群众的政治宣传非常之弱”，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即时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③。共青团代表在会上，坚持党应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暴动夺取政权，将党的“其他一切工作”，都立刻转变为以“这总的策略为出发点”。对此，罗亦农答复说：“暴动不是开玩笑，不能随便决定的”。他强调：只有经

① 《中共中央致两湖信》，1927年10月29日。

② 《亦农同志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③ 《亦农同志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1927年12月21日。

过“充分准备酝酿群众的革命高潮，然后才能说到暴动不暴动”，“现在应长期的做准备工作，不应马上暴动”^①，最后他表示，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问题还有待于长江局正式讨论后决定，对此，“省委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②。

10月29日，长江局会议正式讨论了宁汉战争期间党的策略方针。出席会议的有罗亦农、陈乔年、任旭和刘昌群。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由于任旭、陈乔年赞同与支持罗亦农的意见，刘昌群在会上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会议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的革命潮流，因“受了相当的打击暂时不能有总的暴动”，党在目前的“主要的责任”是：“积极领导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新军阀战争，聚集与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力量，加紧一般的劳苦群众的政治宣传，加紧乡村中土地革命之发展，创造新的革命的大潮，准备夺取政权的总暴动，但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决议案还规定了举行反新军阀宣传周；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争取农村割据局面；加紧工人经济斗争，组织秘密工会等七项具体任务。

10月30日，湖北省省委作出了“一致接受”长江局10月29日政治议决案的决议，并决定“按照该决议案的精神”，重新“规定湖北最近工作”。省委决议特别指出：长江局政治决议案强调“目前情形不是马上暴动的局面”，“这一点

① 《湖北C·Y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对于湖北问题的报告》，1927年12月3日。

② 《亦农同志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对于湖北工作上的指示，更非常之适当”，因之，省委决议明确规定当前湖北党的方针，不是马上暴动夺取政权，而是“准备”群众的暴动。

11月中旬，武汉地区形势剧变。由于西征军在鄂东战事的胜利和唐军内部何键部与南京方面暗通款曲。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随即出亡日本。13日，唐军退往湖南，武汉落入宁方桂系之手。此时，湖北省委贯彻长江局的方针，认为目前“虽不能马上暴动夺取政权”，但应“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各方面的工作”，决定12日集合群众攻击友益街，公开恢复总工会，13日举行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但结果，攻击友益街的斗争因“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缴友益街工人武装队的枪械，法租界在各街口布置电网、机关枪断绝交通”，不得不取消这次总同盟罢工。又因“13日是星期日，有许多雇业工人本来停工，无所谓罢工。其他如车夫、码头、店员等工人均没有罢工，仅仅徐家棚铁路工人在11日因要求发放工资而罢了工”^①。可见，当唐军在武汉溃退时，连总同盟罢工也因主观力量不足而做不到，更不用说武装暴动了。这充分证明长江局关于停止武汉暴动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总起来看，尽管长江局当时没有看到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仍然不恰当地强调“目前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②；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也还缺乏必要的认识。认为只要有“一月至三月的酝酿的大的革命潮流”，就

① 《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②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927年10月30日。

可以“再来总的暴动”，当前党的策略正是为了“创造一总的暴动的局面”^①。但是，长江局在上一片暴动声中，顶住了强大的压力，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停止了作为党内盲动主义倾向为主要特征的、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盲目暴动，从而为保存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避免重大损失，作出了贡献。

三、正确指导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为了夺取革命新的胜利，以罗亦农为首的长江局认为，党在当前的工作方针应当是：把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这个方针的要点如下：

第一，党在目前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领导农民暴动，党的工作的中心区域，即农民暴动中心区域；主要的斗争方法，是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以发展土地革命。如攻取某城镇，则须实行割据以建立工农革命的根据地。

第二，对于割据地区的选择，应依照农民组织力量和敌人空虚的情形而定，各省应依照上述条件，将全省“划成若干重要区域，动员大批党和团的同志前往指导，占据县城或据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的村镇”^②；在时机上，要利用新军阀混战，特别是“利用军队移动开拔的机会及敌人政权动摇或空虚的地方”，“造成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暴

^①、^②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927年10月30日。

动局面，并继续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发展更广大的农民群众暴动区域”^①。尤其对“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农民运动更须特别注意”，长江局决定“组织一特别委员会专门指挥”^②这一带的工作。

第三，只有在“各农民暴动较大的区域”，“建立群众组织的新形式的政权机关”^③，使暴动“发展到割据局面”，并“普及全省”，如此之后，“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④。如果“忽略了农村的农民割据的局面之发展”，则“于将来的总暴动之爆发是很有妨碍的”^⑤。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当时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长江局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当然还不可能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述方针也并不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根本转移，而仍是为在“最近的将来”举行总暴动创造条件。但是，在游击战争还几乎没有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初创，农村暴动还普遍地被认为只是当前夺取中心城市的一种力量的情况下，罗亦农把农村工作提到战略地位，明确提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实现有政权、有武装的“割据”，初步论述了割据得以存在的条件；指出了只有在农村武装割据普及于全省的情况下才

① 《长江局亦农致江西省委信》，1927年10月24日。

② 《江西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决议案（长江局议决）》，1927年10月。

③、⑤ 《亦农同志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④ 《亦农同志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1927年12月21日。

能举行总暴动。罗亦农的这些思想是极为可贵的，它对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战争向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游击战争转变，以及全党对中国革命新的道路的探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在罗亦农的主持下，长江局从实际出发，对所属各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并作了具体的细致的规划，绘制了在长江流域各省，主要是湘鄂赣豫皖等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蓝图。

对于农运基础较差的安徽、河南，长江局认为，应当以发展游击战争为主。长江局要求安徽省临委：“以芜湖、安庆、宿县、寿县、旌德等处为中心”，“特别注意以上数县农运之发展，同时并宜注意各该区域之四周邻县之农运”。“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应当是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抗粮、抗捐，袭击敌人”，并“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县分应即秘密组织农军”，“数量愈多愈好”^①。

长江局对河南指示：“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其他关于暴动准备工作”^②，但“应当加紧信阳、确山一带的工作”^③。根据长江局的指示，11月1日，河南省委、豫南特委领导并发动了确山县刘店镇的暴动，暴动胜利后，成立了确山县革命委员会，起义队伍编为确山农民革命军，并规定了对敌人的进攻“要审查自己的力量，如能解决他，马上解决之；如不能解决，当避免冲突，使用游击战术以扩大民

① 《安徽临委今后(三个月)工作计划决议案》，1927年10月。

② 《罗亦农给中共中央信》，1927年10月17日。

③ 《长江局第二次通告》，1927年10月17日。

众力量”^①的正确方针。11月下旬，王克新从武汉回到豫南，在张板桥召开了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确山县革命委员会三方联席会议，进一步贯彻长江局的指示，提出“在四乡同时爆发游击战争”，“建立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分给贫农”和“必须找一形势甚佳、可战可守之根据地点作为经常争斗之中心”等八项任务^②。后来正式成立了豫南工农红军，在豫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对农运发展不平衡的江西，长江局要求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割据。

赣西南之吉安、万安一带农运基础较好。八九月间，万安农民“曾占遂川一次”，“莲花、永新、安福之农民有百余支枪，曾与钱大钧部冲突一次，后遂驻于武功山和井冈山”^③；10月初，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与井冈山农民起义队伍会合，开辟了第一块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根据地。此外，赣北，星子农军“于9月底武装占领县城一天”，“以后变成游击形势，至今实力尚保存”；德安农军“于9月中旬与〔朱培德〕第三军冲突”，后“败退武宁界山中”^④。根据上述情况，长江局认为，江西虽“不能即刻举行大规模的总暴动，但须采用部分的不断的游击战争”，在占领某些城镇后，则须“实行割

① 刘明《确山暴动工作报告》，1927年11月。

② 《确山工作报告决议案》，1927年11月。

③ 《江西省委书记报告》，1927年10月。

④ 《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7年11月30日。

据”^①。特别指出：江西“目前农民战争的中心为赣西南”，省委“必须在工作的中心区域（即农民暴动中心区域）直接指挥，然后才不致（脱）离斗争”^②，命令省委“应即搬到吉安或万安去”，直接指挥赣西南之暴动”，并任命宛希俨为江西军事特派员组织江西暴动，调派余球为长江局代表，赴赣西南组织暴动^③。

江西省委接到长江局指示后，虽不同意省委南迁，但表示“完全接受”长江局的工作方针，决定“全力注意”对“赣西南农民斗争的指导”，“于最近期内”发动“以万安为中心”的暴动^④。省委并派出省委委员宛希俨以及候补委员汪群、曾延生前往领导。10月下旬，汪群等在万安县罗塘召开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先控制万安县的广大农村，然后举行暴动，夺取县城。会上正式成立了万安县行动委员会，在1927年11月20日至1928年1月9日间，先后四次攻打万安县城，建立了江西省最早的县苏维埃政权——万安县苏维埃，并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⑤。11月中、下旬，江西省委、赣西特委又领导了吉安县东固、延福的武装暴动，形成了以东固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即江西红军独立二团的前身。

① 《江西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决议案（长江局议决）》，1927年10月。

② 《罗亦农给中共中央信》，1927年10月17日。

③ 《长江局对江西的几点新决定》，1927年10月17日。

④ 《江西省委给长江局的报告》，1927年10月21日。

⑤ 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

两湖是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地方，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这里发动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因此，这个地区成为长江局要求普遍建立武装割据的重点区域。

长江局要求湖南将全省划分为长沙附近各县，湘南、湘西和湘西南四个区域，指出其中湘西、湘南“尤其重要，省委应当多派得力同志前往参加主持，在最近一二月内即应创造一农民暴动割据的局面，为将来全省农民暴动的重镇”。同时提出不论是“暴动的中心区域”或“非暴动的中心区域”，都应普遍发动农民的经济斗争，“以游击战争为主要的”工作方法^①。

长江局认为湖北省委目前的工作是准备将来全省有组织的暴动。在这一前途之下，省委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实行抗租、抗粮、抗捐、抗税，并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但在力量可以攻城或可以占据数县的地方，省委应当坚决的领导这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某一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以发展各地的运动。对鄂中之潜江、监利、天门、汉川等县，应当继续骚扰至暴动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麻城，(云)梦(罗)田，黄安以及京汉路之应山，安陆，鄂北之襄(阳)、枣(阳)均应如此。同时省委还应“派大批同志”去鄂西，“恢复旧有的局面，完成暴动”。

根据上述部署，10月中旬，湖北省委得到黄安、麻城两县的报告，了解到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并已举行过“九月暴动”。省委遂派符向一巡

^① 《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1927年10月。

视黄麻区。10月21日，省委又派刘镇一、黄赤光二人前往指挥（注：黄赤光未到），并决定由黄麻两县县委书记及刘镇一、黄赤光，再加二三个真正的农民领袖组成黄麻区特委。同时，省委还给黄麻区党组织一封指示信，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本党的任务就在把这个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在四方普遍地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发展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并即时没收地主一切财产，用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①。接着，省委根据鄂东为宁汉军阀战争两方必争之地”，唐军败退的情况下，于10月底派符向一担任黄麻区特委书记，“并令他尽可能的发动黄麻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夺取溃败军的武装，占领县城”^②。此后，省委又加派吴光浩、王志仁到黄麻区领导暴动。11月13日，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夺取了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以后在强敌围攻下，起义武装退出黄安县城，在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夏在黄安光山边界上的柴山堡，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

10月初，省委派黄大全去鄂中巡视，黄大全到达监利后，与鄂中特委肖人鹤一起，制订了“以洪湖为中心”，“在新堤附近大举骚动，再向沔中、沔北发展，更会同段家湾之农民领袖向潜江及监利北部发展”，以期“在洪湖附近及

^① 《黄麻地区农运情况——湖北省委向中央报告》，1927年10月。

^② 《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西乡造成一个割据的小局面”^①。不久，起义军攻占了沔阳县城，随后在沔西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五军。这支武装后来与湘鄂西贺龙的队伍会合，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总起来看，长江局在这个时期的方针是正确的，它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湘鄂赣豫皖等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金再及 李婉霞执笔)

^① 《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1月。

1930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其他国民党地方军阀同蒋介石在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正式爆发。一时红色区域周围的反动武装力量减弱。这对发展红色区域、发展红军和发展党的白区工作都是有利时机。然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骄傲起来，夸大这种有利形势，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可以组织武装夺取中心城市了。6月11日，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从而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接着就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命令几支主力红军分头攻打几个大城市，企图最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1930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并开展工作的。

一、长江局的建立及其组织状况和 管辖范围

为了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派出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7月下旬，长江局正式成立，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组成常委会，项英任书记。8月6日，项英（化名江钧）从上海到达武汉。7日召开长江局会议。会议决定：长江局同湖北省委合并，党与共青团的组织统一起来，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长江总行委由项英、关向应（化名西一）、任弼时（化名诗圃）、顾作霖、华少峰（即华岗）、秦了君（又名陈了君）、李大汉（即李震瀛）七人组成，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主席团，项英任书记，关向应兼军委，任弼时兼宣传，顾作霖兼组织及青年秘书处^①工作，华少峰参加区行动委员会会议，李震瀛负责工会，秦了君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8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指示湖北省委可暂撤销，成立武汉市委，并批准了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名单。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暂调关向应去主持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工作。同时，中央又调刘伯承接替关向应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刘伯承于9月2日到达武汉。

^① 当时，为领导暴动，各级均设立党团合一的“行动委员会，在这一机构内设立‘青年秘书处’，负责青年工作”。

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常委缩小至三人，由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组成，项英任书记，任弼时任宣传并参加武汉市委工作，顾作霖管湖北外县及团的工作。

此时，长江局组织很不健全，干部缺乏。妇女工作无人担负。团的工作也由于党团合并，实际等于取消。9月3日，邓中夏到武汉时，转达了中央青年秘书处关于要求顾作霖专作青年工作的决定。9月4日，长江局向中央报告，表示尊重中央青年秘书处的意见，但提出：就现在长江局成员来看，任弼时因兼武汉市委书记，只能出席长江局会议，不能担负其他职责，剩下的只项英、顾作霖二人管理各项工作，已无法应付，如若再让顾作霖专作青年工作，则只有项英一人担负其他一切工作了，而项英在外行动又很困难（项是本地人，过去长期在武汉从事工运），因此，要求中央速派干部加强长江局。10月2日中央指示，任弼时应专作长江局工作，中央另从外地调王弼接任武汉市委书记职务（王弼到汉前暂着他人代理）。

9月下旬，项英、关向应赴上海出席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后，项英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关向应回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接着，中央又从上海调张采真（化名苏立民）到武汉任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

长江局的管辖范围前后也有所变化。7、8月间，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五省均归长江局管辖。这些省的省委与长江局建立直接关系；湖南、

湖北、江西、四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归长江局军委指挥，各前委、军委、师委等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

8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为使苏维埃区域的巩固与发展，红军指导的集中与加强”，“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长江局则指导非苏维埃区域工作”^①。当着有些苏区还没有联成一片时则由长江局、南方局或省委暂为管理。这样，长江局所管辖范围缩小到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河南等省的白区，以及鄂西、湘西、鄂东北、豫西南、鄂北、鄂东（包括江西边界的瑞昌、武宁两县）等尚未与湘鄂赣三省苏区联成一片的苏区。中央这个指示还规定，“铁路、海员工作直属长江局指导”。

二、长江局全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情况

8月上旬至9月中旬，是长江局全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时期。在此期间，长江局依据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对武汉敌我力量对比也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8月上旬，长江局负责人到达武汉伊始，即认为：“统治阶级的恐慌非常”，“到了无法统治的道路”，“敌人已完全崩溃”。而实际情形如何呢？蒋介石当时虽然忙于军阀混

^① 《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苏区成立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29日。

战，但对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却从未放松控制。1930年2月，成立了以夏斗寅为司令的武汉警备司令部，强化对武汉的统治。蒋、冯、阎中原混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除调遣军队加强武汉防务外，更加紧对武汉人民的残酷镇压。专事对付共产党的军警机关就有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和武昌、汉口公安局以及水上公安局等。军队、铁甲车每日巡逻，密探遍布三镇，举行不定时、不定地点、不定次数的检查。各水陆交通要隘专设瞭望哨、盘查哨，配以轻重武器，严密监视和防范。4月底宣布部分戒严，7月宣布全市戒严，夜晚9时起断绝市内交通，12时后断绝长江交通，中外船只一律不准通过。并颁布戒严条例16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处死刑。从8月起，更执行蒋介石秘字第11号密令，凡属共产党案件，不再经法院审判，迳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办理，往往刚一逮捕即行枪决。显然，敌人对武汉的统治并非“完全崩溃”，而是异常强化，白色恐怖严重地笼罩着武汉。但长江局负责人却不愿意承认这个客观现实。

虽然，长江局负责人承认革命力量还“薄弱”，但错误地强调所谓只要“路线的转变”，便能一举使自己变弱为强，夸大了革命发展的可能性，犯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急性病。当红军于7月下旬一度攻占长沙的时候，沉闷许久的武汉人民群众闻之自然欢欣鼓舞；粤汉铁路工人自动怠工，组织纠察队；店员自动上街写“欢迎红军来武汉”的标语；党组织在兵工厂举行飞行集会，发传单，呼口号，燃放鞭炮，曾有一二百群众相和；福源纱厂失业工人提出自愿到红

军去大干一下。面对部分群众为红军一时攻占长沙的胜利而激发出来的革命情绪，长江局负责人便认为：“武汉工人在目前对于经济斗争的要求反不如要求大干来得迫切”，“要干就大干一下”。由此得出结论：“武汉在目前形势之下，暴动条件在客观上更加成熟，尤其是事变的发展都有随时实现武装暴动的可能。中央决定目前在武汉坚决的组织武装暴动是万分正确”^①。他们既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也不了解党应以农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城市斗争配合农村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根本上也不承认敌强我弱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时，武汉地区革命的主观力量是异常弱小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虽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坚持了武汉的白区斗争，但是，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在武汉建立了比旧军阀更残暴的反革命统治，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十分困难。自1928年以来，湖北省委遭敌多次破坏，曾多次重建，往往新的省委刚刚建立，还未站稳脚跟，就又遭到破坏。1930年7月，长江局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前夕，虽然武汉三镇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乘军阀混战之机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仍仅有一个阳夏区委，共有党员100余人，团员80余人，赤色工会会员100余人（其中一大半是党员），总共加起来不出300人。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组织可以说微弱到极点，纱厂只申新、泰安有组织，水厂有党员2人（已失业），铁路有党员30余人（京汉线20余人，粤汉线数人），海员、兵工厂各

^① 西一、江钧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布置暴动工作及成立总行委的情形》，1930年8月8日。

建有仅六七名党员的支部，市政、码头、烟厂、人力车、蛋厂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党的支部生活多数都不健全，各级党部的关系非常隔阂，下层群众的实际情形难于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这便是长江局建立之初，准备在武汉举行武装暴动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为加强党的主观力量，中央曾经指令长江局：“你们必须切实的动员全党，极猛烈的扩大组织，大批的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至少每个党员每日须介绍一个同志，同时每人须组织一队赤色先锋队，加紧工人群众中组织，特别加紧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罢工和海员罢工工作，以加强党的力量”；“同时须立即从赤色区域调大批干部到武汉”，“以迅速扩大党的工作”^①。长江局对于迅速加强武汉工作的主观力量也盲目乐观，他们认为：“在这种现象之下，固然表现主观薄弱，可是据我们的观察，就以这样极少数组织和力量能在坚决路线和正确策略之下，主观的加强并不是严重问题。严重的还是路线的转变……这并不是我们过高估量，因为在目前主观形势之下，无疑的是有这种可能”^②。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又采取以冒险进攻为特征的“左”的斗争策略，要想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主观力量，是很难办到甚至是不可能的。直到9月中旬，武汉三镇的党员人数虽略有增加，但仍然只有150余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共73名，计：武昌区被服厂10人，

①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

② 西一、江钧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布置暴动工作及成立总行委的情形》，1930年8月8日。

一纱厂4人，震寰纱厂3人，铁路(徐家棚)3人；汉口区打包厂7人，蛋厂3人，烟厂3人，印刷2人，码头8人；汉阳区兵工厂12人，码头5人，海员1人；硚口区泰安纱厂7人，申新纱厂3人，码头2人。这些“工厂支部大多数不能开会，仅只区委负责人与之接头谈谈与传达上级命令而已。”^①就在9月下旬，武汉党的组织又因遭敌破坏而受到严重打击。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竟不顾这一切，以为在他们的“总路线”和“新策略”之下，可以凭自己艰难聚积的一点力量就能“去发展一切工作”，以至发动武汉的武装暴动。

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出发，长江局在战略方向和斗争策略方面全面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主要表现是：

(一)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组织武汉暴动，是长江局的中心任务。193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8次会议讨论了长江局工作计划，规定长江局的工作中心，是在布置数省工作中更注意湖北，首先是布置武汉三镇、武长路、京汉路的罢工斗争，实现武汉总同盟罢工，紧接着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反复强调：“党在目前之最基本最严重的工作，是要加重在武汉工人中的政治宣传与鼓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发动政治罢工，准

^①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9月1日。

备武装暴动”。“中心任务就在加重斗争的配合，努力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8月7日，项英在武汉召集的长江局会议，“全体一致认为中央对于全国革命总形势估量非常正确，完全同意中央组织武汉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和一切决定，并根据这一总路线来布置全部工作”^①。

于是，他们在成立直接领导武汉暴动的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以后，又将武汉地区党与团的组织也由上而下统一起来，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武汉附近市镇均归属武汉范围。武昌、汉口、硚口、汉阳各成立区行委。徐家棚、青山镇一带及豹子懈（离武昌60里，有党的组织，原属鄂南特委）各成立分行委，属武昌区行委。江岸至谌家矶成立分行委，属汉口区行委。蔡甸成立分行委，属汉阳区行委。离武昌上游六十里的金口镇成立市行委，直属总行委。武汉外圈的黄陂县行委也属总行委。区行委连同军委由7人组成，常委3人。每一行委委员按照产业管理支部，参加产业委员会，使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联系起来。

这时，长江局对武汉的工作布置是：1. 组织总同盟罢工，要以海员、铁路、兵工厂的反军阀战争的总罢工为实现总同盟罢工的中心。2. 猛烈地在产业工人中扩大党与团的组织，使其成为一切工作发展的中心，同时加紧支部政治教育和反右倾斗争。3. 扩大关于武装暴动、苏维埃大会和长沙成立的湘鄂赣三省苏维埃政府及所颁布的法令的宣传，加紧在各工厂建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使一切宣

^① 西一、江钧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布置暴动工作及成立如行委的情形》，1930年8月8日。

传与鼓动以此为中心，使一切斗争与发展以苏维埃大会、武装暴动和在武汉成立全国苏维埃为中心，成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4. 建立赤色先锋队，实行党员军事化，武汉划分四大军区，各区成立分区。

在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上，对敌人强固统治的中心城市——武汉，采取了进攻、决战的错误方针。他们强调建立赤色工会和赤色先锋队，把参加黄色工会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消灭黄色工会的斗争对立起来，并用赤色工会的纲领公开号召、领导群众斗争。其结果，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武汉，行动纲领愈“左”，愈使自己脱离群众，赤色先锋队愈是建立不起来；赤色工会虽然建立了，但会员人数极少，纵有个别先进分子冲锋，一出头露面就遭到敌人镇压，使斗争归于失败。他们强调以政治罢工为主要斗争方式，把武装暴动与日常斗争对立起来，常常把政治罢工口号和暴动口号机械地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脱离了群众当前的实际要求和实际觉悟。其结果，不但发动不了群众，反而使大多数群众敬而远之。他们还强调采取公开活动路线，要用公开化的方式领导斗争，无休止地搞政治罢工和飞行集会、政治示威等。其结果，是将自己的同志暴露在敌人面前，党的组织失去了隐蔽和保护，因而不断地遭到破坏，造成严重损失。例如：武汉监狱中关着的一批历年被捕的同志，于7月下旬公开举行政治示威，呼政治口号，朗诵国际歌词，托人从外面购进一批木履，准备作为狱中暴动的武器。结果，在8月上旬，有七八十人被敌人分作六批，用大刀砍杀于武汉闹市。其中，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员、

青年运动领袖何恐，原只判5年徒刑，因领导这次狱中斗争而壮烈牺牲。9月7日，党在汉口华景街铁路(线)外组织了一次数十人的政治示威，党员张培信、林元培等3人当场被捕，敌人从张培信身上搜出“准备武装暴动总同盟罢工起来”的红布大旗一面，又在林元培身上搜出“九七”暴动宣言四张。10日早晨，这三位同志即被敌人押到示威地带惨遭枪杀。这样做，不外是将敌人平日千方百计地侦察、追捕而难以发现的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都主动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让其轻而易举地加以破坏和打击。正如刘少奇指出的：“立三说要争取公开，实际就是把不能公开进行的事情，扮蛮去公开进行，那完全是冒险”^①。

这套“左”的错误指导方针和斗争方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一碰壁。这证明长江局所执行的实现政治同盟总罢工，武装暴动，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冒险计划，根本行不通，不可能实现。9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已开始看出敌人“还有力量可以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武汉的革命力量”，“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未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尤其是党的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事实正是如此，直到9月中旬，武汉暴动只不过是一时的空谈罢了。

(二)贯彻中央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

在长江局成立之前，李立三等已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命令传达到各地红军。他们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武昌，夺取汉阳、汉口，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继而改为进攻长沙，尔后再夺取武汉）；鄂豫皖的红一军帮助鄂中及沿京汉铁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鄂东的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四、五纵队，鄂北的第九军，均应配合，以进攻武汉为总目标；红十军进攻九江。他们企图在红军的进攻下，“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①长江局建立后，按照中央规定，鄂湘赣川的红军归长江局军委指挥。8月7日长江局会议决定：“红军发展和进攻路线，依照中央决定执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命令和决定强行贯彻的结果，给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由于各地红军在执行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抵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改变，才使这一冒险行动实际渐趋停止。

1930年6月，中央曾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武昌。此时，红三军团只有7000人。而武昌城内驻有敌军5个团，城高墙厚，工事坚固，江面上又布满帝国主义军舰，岳阳、阳新均驻有敌人重兵，如打武昌，必使自己陷于前后受敌、进退无路的危险境地。军团负责人彭德怀看到这种形势对我不利，遂提出一个方案：先消灭鄂东南六县的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相机占领岳州，作打武昌

^①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

的实际准备。6月底，红三军团声言要打武昌，蒋介石急从岳州调两个师到武汉。红三军团乘岳州空虚之机攻下岳州，接着又乘湘桂军阀混战，长沙一时空虚之机，于7月25日猛攻长沙，27日晚占领全城，取得很大胜利，对当时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敌军于8月3日集结15个团，在帝国主义10余艘小型浅水(炮)舰掩护下，从长沙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8月6日，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然而，这一事实并未使李立三等人头脑清醒过来，在中央8月10日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要求红三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逼。”^①长江局在红军攻占长沙时，虽已派出郭士杰前往，但直到8月8日，还不知道郭士杰是否接上头。因此，当时长江局与红三军团之间，并未取得直接联系。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后，向刘阳撤退，集结于长寿街及其附近。

在红一军团方面，一开始，军团负责人毛泽东、朱德“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认为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而“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但毛泽东、朱德认为他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因此又不得不接受中央命令。于是，红一军团从闽西、赣南出发，向南昌

^①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

进军，但未贸然攻打南昌，而是注意沿途发动群众，相机消灭敌人，极力避免红军遭受损失。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永和市会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决定再次攻打长沙。但屡攻不克，伤亡较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因势利导，于9月12日撤围长沙。

在此之前，即8月29日，李立三等人曾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信中要求以三、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数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同时指示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路以切断敌联络线。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持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到达江西袁州红一方面军驻地时，已是9月29日。尽管红军第二次打长沙未克，周以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仍要红一方面军返湘再攻长沙。经过毛泽东同周以栗耐心交换意见，终于说服了他。周以栗转而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从而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

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柳直荀在红二军团不肯采纳军团负责人周逸群、贺龙提出的先攻取监利，巩固苏区内部，然后逐步向外发展的正确意见，而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一起，坚持先攻取荆州沙市，完成地方暴动，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的决定。于是，红二军团只得自洪湖西进，9月初进攻沙市失利，受到很大损失。不久，长江总行动委员会又指示红二军团转而向东，准备进攻武汉。是时，洪湖苏区发生了“白极会”反水的严重事件。镇压“白极会”，肃清苏区内的“白点”，巩固红军后方，成了红二军团的一项

迫切任务，因而无暇东顾。9月间，红军基本上平息了“白极会”的叛乱。9月上旬，长江局根据中央指示，派邓中夏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邓中夏于9月中旬到达洪湖苏区，召开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要红二军团南下，配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的指示（实际此时红一方面军已撤围长沙）。在邓中夏的坚持下，红二军团执行南征指示的结果，虽然开始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远离苏区，后来不仅军事失利，使红军伤亡重大，而且导致洪湖苏区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

8月下旬，红一军前委根据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令三个师在四姑墩会合后，即集中力量向京汉线出击。9月1日，中央指示长江局：“鄂东北第一军第一师应从花园孝感南逼武汉，第二师如你们提议应以截断信阳武胜关的铁路线为震动敌人的主要任务”。9月上旬，长江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鄂豫边苏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9月中旬，红一军从四姑墩出发，沿京汉线东侧北上，在广水、信阳两次战斗中歼灭了敌人一部分武装力量，曾占领信阳车站，但并未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而部队却遭到不小伤亡。显然，长江局根据中央指示给予红一军截断京汉路，并进而攻取武汉的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红一军鉴于继续在铁路沿线活动不利，遂转而进攻正阳以南之陟沟镇，但正阳地区亦不利机动作战，且远离根据地，于是决定南返。

根据中央9月1日要鄂东的红军“渡江扰乱九江之敌”的指示，长江局命令红十五军“坚决的占领武穴，截断长

江，断绝敌人的交通和运输”，命令第五纵队“由阳新向九江进攻，牵制敌人”。鄂东的红军集中在黄梅、广济一带后，遭到敌军（约二团人集中武穴一带）的进攻，我南北交通被敌截断。长江局又决定将罗田等地武装和红十五军集中起来，“击破武穴敌人，并使消灭，迅速渡江向九江进攻，牵制江西敌人。”红军在江北苦战数次，虽然由五六百支枪扩充到千余支，并击伤日帝军舰一艘，但由于遭到在武穴、黄颡口一带的帝国主义军舰（四五艘）的炮击和国民党军队及反动民团的围攻，南渡受阻，不能执行长江局“进攻九江”的指令。

赣东北的红十军在奉命两次攻打九江，以配合红一军团夺取南昌的过程中，因方志敏、黄道等反对，只打到鄱阳湖边，攻占了景德镇、鄱阳、彭泽、马当、乐平等城镇，消灭了国民党不少地方武装，并未冒险越湖攻打九江。后因敌军乘虚进犯赣东北根据地，红十军星夜返回，击败敌军，收复了革命根据地被敌侵占的地区。红十军同样因远离根据地，向九江进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

上述红军的战斗实践证明：在当时条件下，那种“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只能是一种幻想。

（三）组织地方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

193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8次会议讨论了鄂湘赣豫川等省的“地方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问题”，指出：“在湖北应有大规模的地方暴动，最主要的是信阳、黄陂、宜昌、沙市、阳新、大冶等处暴动的实现”；“在湖南是安源、常德、株长路”；“江西最重要的是沿南浔路及马当要塞”；“在四川是重庆、万县等县”；“河南是京汉线、陇海

线”。所有这些地方暴动，都“必须与武汉配合”^①。

自从8月7日长江局会议决定湖北省委同长江局合并以后，湖北外县的工作即由长江局直接领导。8月上旬，长江局对湖北外县地方暴动的工作布置是：在鄂西，组织沙市、宜昌地方暴动；在鄂东，组织大冶、阳新地方暴动外，并组织广济、蕲水地方暴动，以与红十五军配合，占领武穴、田家镇，截断长江；在京汉铁路沿线，组织各县地方暴动（黄陂、孝感、安陆、应山）；在鄂南，组织沿粤汉路暴动（咸宁、蒲圻等）；在鄂北，组织老河口、襄樊地方暴动，并组织随县、枣阳地方暴动，与京汉路连接起来。同时，决定在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以下设四个巡视员，加强对于湖北外县工作的指导。

在8月上旬红军退出长沙以后，长江局还未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乃派周以栗前往湖南巡视。周以栗的任务是：先到红三军团，从红军中带一批干部去地方工作；传达长江局指示，要湖南省委设在长沙或湘潭，指示“目前湖南工作问题最中心是号召与组织衡湘、长沙及附近各县广大群众武装暴动，起来与红军配合，消灭何键势力……夺取长沙”，并要湖南省委“派人到水口山锡矿山炭窑子去组织工人与周围农民起来武装暴动，建立湘南、湘东、湘西特委，组织宝庆、衡湘、常德地方暴动。”^② 8月28日，关向

① 《中央政治局第98次会议讨论长江局工作计划》，1930年7月20日。

② 西一、江钧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布置暴动工作及成立总行委的情形》，1930年8月8日。

应出席湖南省常委会议，讨论布置继续发动长沙及附近各县、以醴陵为中心的湘东各县、以岳州为中心的湘北各县、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各县的地方暴动或赤色骚动，以配合红一方面军再度进攻长沙。

8月初，长江局派邓发前往江西。邓发到九江后，因不知道各特委地址（长江局亦不知，长江局写信问中央，中央也不知），无法接洽，中央遂将邓发调回，改派到南方局工作。8月10日，中央指示长江局：派人督促赣东北特委，积极组织湖口暴动、彭泽暴动，占领马当，以切断长江交通；从赤色区域调大批干部到九江、南昌工作。长江局接到中央指示信后，因无法找到江西省委书记邱泮林，于是直接写信给赣东北特委，促其执行中央计划。

长江局按照李立三等发出的指令，组织鄂湘赣等省地方暴动，目的是在配合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所选择的暴动地点，基本上是敌人巩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的中小县市，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处处碰壁。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如果是以赤色区域为依托向外发展，与红军行动相配合而发动起来的地方暴动，往往可以成功。如在湘赣、湘鄂赣两个赤色区域影响下的湘东、湘北，在配合红三军团的作战中，完成了各县的地方暴动，建立了湘东、湘北两个赤色区域。那些远离赤色区域或在交通要道上的地方暴动，则很难发动起来；即或有些地方搞了暴动，最终仍然大部归于失败。例如：红三军团第一次猛攻长沙时，长沙郊区小吴门外农民组织赤卫队数十人响应红军，因力量薄弱而失败。在鄂东，党曾号

召数十万农民两次围攻阳新县城，均因敌人固城防守，城内暴动也没有发动起来，农民攻坚不克，只得作罢。在鄂东北，根据长江局关于配合红一军行动的指示，鄂豫边特委在黄安南部与黄冈北部30余里地区，在光山殷区和罗山中部周区，先后发动了各有数千人参加的地方暴动，这些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势力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暴动地区离根据地中心区域太远，得不到苏区人民的援助，红军又集中在京汉线活动，没有可能给予支援，各暴动点又没有互相配合，孤军作战，此起彼落，除周区外，其他地方的暴动，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都相继失败了。至于长江局规定的作为中心暴动区域的京汉线，更因主观力量极为薄弱，则基本上没有发动起来。

(四)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对于士兵运动，李立三等认为：“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寻找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特别是党在军阀军队中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飞速扩大，现在镇江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且要求即刻暴动；汉口主要驻军的大部分，也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在军阀混战前线的军队，尤其反对军阀战争，其中党组织也有相当的扩大。特别是十余万伤兵热烈要求党的领导。这一客观形势，无疑的是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①。基于这种错误估计，他们计划在南京、上海、广州、镇江、武汉等中心城市以及其它各地普遍搞兵变、兵暴，配合以武汉为中心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1930年8月5日。

的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

按照中央规定，组织鄂湘赣等省的兵变与兵暴，也是长江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在长江局军委下面，设有兵委专做士兵运动。曾计划：加紧士兵运动，特别加紧组织武汉、鄂西（驻沙市、宜昌的川军）、京汉线、九江的兵变与兵暴，以配合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武汉暴动。

诚然，当时的士兵运动有新的发展趋势，但绝非李立三等所夸张的那样，士兵正在“迅速革命化”，甚至蒋介石在前线的基本部队“都倾向我们”，“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实际上，直到9月，虽然也曾出现过在鄂东的敌二十军三连士兵哗变加入红军的事实，但始终没有出现他们所预期的那种兵暴形势。上海、镇江的兵暴既未实现，广州等地兵暴更属渺茫。长江局所直接领导的兵变、兵暴工作情况亦极不佳。9月上旬，中央已看出：“尽管我们了解和承认敌人的军队有加速度的瓦解可能，但我们必须知道直到今天在湘鄂两省的敌军中，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领导之下的广大兵变潮流的爆发和蔓延。”^①这自然不是长江局工作不努力，而是实际上办不到，因为所谓军阀军队中“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的形势，是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杜撰出来的。例如：所谓“汉口主要驻军的大部分，也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8月上旬，党在武汉驻军士兵中的工作虽有发展，但仍然只“有党员约70人”，力量十分微弱。至于驻沙市、宜昌的川军，

^①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9月1日。

长江局并未掌握其部队中的任何党员线索，为此，曾写信问中央，中央仅仅答复：“据军委说，在湖北担任军事工作某同志及四川同志都可有办法。”并未提供什么具体线索。在这种情况下，还硬是计划在8月份就要发动该军举行兵暴，实属纸上谈兵。关于京汉线上的兵暴问题，直到9月上旬，党在京汉线上的敌人军队中，“除杨部（指杨虎城部——引者注）外还无任何工作”。在湖南，除平江、浏阳、益阳驻军有一点线索外，其他完全没有工作。可见，“左”倾冒险主义的兵变、兵暴计划具有何等的主观盲目性。

三、长江局逐渐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情况

9月中旬至12月，是长江局逐渐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时期。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一开始就受到周恩来的多次批评。1930年5月，周恩来出国。6月中旬，他在莫斯科看到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立即向共产国际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要求停发这一决议案，并于7月5日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此作了重要报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筹备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从9月初到三中全会前，他们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定，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采

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停止执行“左”倾冒险计划。

9月24日，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在中央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长江局大约从9月中旬开始逐步纠正“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停止武汉暴动。

9月1日，中央在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开始指出武汉还不具备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并决定党的中心工作暂时转移到加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工作方面去。这样，长江局直接指挥的“武汉暴动”在9月上旬已实际停止。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则更明确地下令停止武汉暴动。

（二）注意了解实际情况，逐步纠正“左”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

9月4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给长江局的信》，着重批判了那种不顾主观力量和组织基础，而空谈大干、空谈暴动的“左”倾错误思想，批评了那种认为“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强调了制定工作计划要切合实际地估量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提出了适应具体环境灵活运用斗争策略。9月14日，长江局复信表示：“对于中央关于武汉工作的指示信，我们讨论后认为完全正确，且对目前武汉工作的实际帮助异常重大。我们已根据这一指示

的精神，对武汉工作的具体布置开始讨论，大概不日即有详细报告给你们。”此复信还作了自我批评：“以前我们布置武汉工作，有一总的缺点，诚如中央所指示的即仅在武汉暴动的本身做文章，而对于准备武装暴动的具体策略与方法则非常缺乏，这一缺点的造成是有客观的原因的，即是我们还未能切实了解底下的实际情形，但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上，偏于客观的发展的趋势，而忽略了主观的工作进行的可能。”^①

遵照中央关于加强秘密工作的指示，长江局开始注意隐蔽斗争。在中央帮助下，多布置以家庭形式和社会职业（如开商店等）为掩护的各种机关，以减少在旅馆和其他公共场合轮番接头；尽量避免工作人员堆集在上层，而将他们多派到基层工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公开斗争方式，9月中旬以后，飞行集会、政治示威等公开活动方式大大减少了。

对于黄色工会的斗争策略也有所转变。过去长江局禁止同志加入黄色工会，现改变为“有群众的工会即应加入进去，夺取其群众，没有群众的工会即不应加入，而应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之消灭之。”^②

注意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纠正脱离群众的倾向。接到中央9月4日指示后，长江局抓住被服厂、车夫、码头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来发动群众，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例如：9月中、下旬，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设在武汉的

①② 《长江局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9月14日

被服厂，工人工资因军阀战争影响已积欠50余日未发，军政部又命令减少工资4/10，因此激起工人的义愤。武汉市委决定抓住这一问题发动斗争。当时，党在被服厂已建有一个支部（3人）和赤色工会（6人）。他们拟出以经济要求为主的斗争条件，布置5个厂同盟罢工。以其中最大的1厂（有600余人）为重点，很快就把工人发动起来，全厂工人按5人编成小组，开过一次百多人的代表会，通过了斗争条件，代表会后即实行怠工。厂方一方面用欺骗手段和缓斗争，一方面开除15个积极分子。这种镇压措施，使工人情绪更加愤激。在斗争中，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0人，赤色工会会员发展到12人，有11人编成工人纠察队开始训练。通过发动被服厂工人斗争的实践，长江局负责人在9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以前忽视群众日常经济斗争是错误的，只有抓住群众日常经济政治要求开展斗争，才能真正聚积力量。

（三）纠正从苏区和红军大量调干部到城市搞暴动的作法。

9月9日，中央关于加强红军干部问题给长江局的信指出：“攻长沙经此挫折，更证明国际要我们特别着重于苏维埃根据地之建立，红军之加强与集中，红色区域群众之广大发动，党的领导之万分加强，成为极端重要。在这样条件下，巩固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才能更为有力，才能保障胜利。”又说：“在上述的原则下，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留在武汉等着训练工人武装只要极少数人”；“党的干部也须照前信多派往

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任务。”长江局遵照中央指示，迅速改变了过去从苏区和红军调干部到城市搞暴动的作法，陆续将一些得力干部从城市调到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去工作。与此同时，长江局尽量设法同直接领导的湘鄂西(包括湘西、鄂西)、鄂豫边(包括鄂东北、豫西南)、鄂东等苏区及其红军取得联系。并指示他们，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与强固红军，巩固苏维埃区域。

这种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重视，其立足点虽然仍是“城市中心论”，目的仍是希望很快能攻打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但这样做毕竟加强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恢复与发展十分有利。1930年底，红军恢复到10万人左右，红色政权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为胜利开展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系列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长江局的撤销

正当长江局逐步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使长江局、武汉市委乃至武汉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均遭到破坏。9月23日，汉口区行委委员宋惠和被捕，随即叛变。他公开带敌捕人，兵工厂、轮渡、铁路、香烟厂、印刷、刘家庙等支部遂遭破坏，共有数十人被捕，基层组织大多数同上级组织断了联系。武汉市委委员郭士杰、市委委员兼汉口区委书记秦了君等也被捕牺牲。

12月2日，汉口区区委书记陈某在汉口丹凤街路遇叛徒宋惠和，当即被指捕，后亦叛变。从此，敌人对武汉地区党组织的破坏，继续蔓延扩大，武汉市委的秘密机关（汉口合兴隆杂货铺）和开会机关（汉口方正里8号），长江局的秘密机关（汉口湖南街五号）、接头机关（汉口法租界第一宾馆26号）、招待机关（汉口中山路新成里1092号）、印刷机关（汉口张美之巷6号）、交通机关（汉口贯忠里63号）等均遭破坏。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化名郑汉先）、陈洪周（化名陈正佳）等被捕牺牲。长江局和武汉市委在这次空前的大破坏中，前后有百余人遇难。长江局负责人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有一次刚离开开会机关，此机关即被破坏。

鉴于武汉地区环境极为险恶，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可能而必须留汉的酌留），只留外交科、军委办事处与交通站；武汉市委独立工作，中央对武汉市委经过长江局外交科进行指导；各地的工作，由中央军委武汉办事处负责；四川、河南、湖南各省，由中央直接领导。这样，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刘伯承、华少峰、李震瀛等相继离开武汉，长江局工作遂基本结束。

（李婉霞、姚卫东执笔）

周保中年谱

(1902年—1964年)

赵素芬

1902年

2月7日 生于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白族，原名奚李元，字绍黄。父亲奚发林，号玉龙，是个皮鞋匠。母亲李氏勤俭持家，名扬乡里。

1909年—1916年(7—14岁)

先后在本村私塾、县私立高小学堂、省立大理第三中学初中部就读，后因家遭兵灾抢劫，中途辍学。

1917年 15岁

2月5日 在地主权势威逼下，告别父母、兄嫂，离家出走，临走时写了一付“再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头”

的对联，贴出门外。与本村地主之子杜宝华的“富贵全由命定，穷相原是天生”的对联相对抗。

下旬 随马帮来到昆明，进入滇军唐继尧的第一师士官教导队，当学兵。

7月 被派赴云南护国军第五军为警卫三营一连中士，军长叶荃（护法战争时，该军改为靖国第八军）。

10月 随部队进贵州入四川参加“靖国护法”战争，升为上士。

1918年 16岁

2月 升为准尉司务长。

5月 在部队进攻湖北宜昌等地时，亲身经历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和退却战。

7月 升为靖国第八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少尉排长，在四川东部奉节、巫山一带作战，曾两次负伤。

10月 升为中尉排长、代理连长。

11月 随部队开赴陕南作战。

12月 派往重庆作靖国第八军参谋长段廷佐的随员。

1919年 17岁

2月 随段廷佐去重庆参加各省靖国军军官会议。之后，被派到川军卢师谛部，任上尉副官。由于受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对“劳工神圣”和“社会主义”开始发生兴趣。

5月 因不满川军现状，辞职去广州，投驻粤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任中尉候差员。

9月 离职，取道香港，经河内回昆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学会。

10月 回到家乡大理，梦想实现劳工神圣的主张。

1920年 18岁

3月 离家再赴昆明，靠同乡接济和为人代写书信、状子的微薄收入度日。

12月 回到靖国军，在同乡赵成梁任团长的混成团里当候差员，不久，派到连队任连长、副营长。

1921年 19岁

派到滇军顾品珍部第一团第一营任三等书记和三等军需长。

1922年 20岁

5月 转任滇军步兵第一团第三营九连上尉连长。

10月 升营副。

11月 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工兵科军官班学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组织旅省学生会，担任该会主席。

1924年 22岁

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被派到步兵第十团，因不满团长军阀作风，借婚假回乡，与大理大张屯金阿喜成婚。

1925年 23岁

1月 随鹤庆商帮，经云南保山蒲缥坝，跨过潞江索桥，翻过高黎贡山，穿过原始森林，从瑞滇口子出境。先后到过缅甸的密支那、曼德勒、仰光，又到印度、马来群岛、新加坡等地。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有了较深的、具体的认识。

3月 在吉隆坡获悉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立即回国。

5月 回到广东，在驻粤滇军军长赴成梁部下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第八连任上尉连长。

6月 因滇军反动不堪任职，离广东赴河南。

8月 在河南加入国民军第三军，任该军教导旅少校候差员，参加了肃清豫西军阀的各次战役。

10月 部队开入陕西，随军参谋长杨杰饱览了古都西安的风光，又漫游了八百里秦川。

11月 经军长叶荃和参谋长杨杰推荐，到国民军第二军第六师邓宝珊部工兵营任连长，参加讨伐奉、直、鲁军阀的战争。

1926年 24岁

1月 任工兵营长。

3月 转战河南西部和南部。

4月 第二军全军失败。邓宝珊师长资助盘缠，赴广州投奔杨杰所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5月 到广东后经杨杰推荐，在第六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六团团部任上尉参谋。经同乡中共党员赵济介绍与党组织有了接触。

7月 随军出师北伐。在步兵第五十六团先后任参谋、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参加战斗。

9月 六军在攻打南昌的战斗中失败。他指挥二营，掩护程潜化装逃出南昌城，于战斗中负重伤。

1927年 25岁

1月 第三次攻克南昌。在乐化车站、蛟桥、芦坑、涂家埠四次战斗中，因战功显著晋升为五十六团上校副团长。并受中共委托兼任团政治指导员。

2月 随部队进攻皖南。

3月 参加攻取南京之战，代理五十二团团长。

4月 程潜部第六军被蒋介石编遣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命程潜在九江重建六军。他前往九江参加新六军，任第十八师司令部参谋处长，旋赴南京、上海活动。

5月 回武汉任第六军教导团团长兼先锋营营长，参

加讨伐杨森、赖兴辉战斗，攻克宜昌，肃清鄂西反动军队。

7月 大革命完全失败，经郭德昭介绍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继续留在该军，进行秘密工作。

8月 在第六军由武汉开赴江西时，任五十二团团长，在党内为秘密军党委委员。

12月 第六军进入湖北参加与新军阀湘桂系激战，升任第十八师少将副师长兼五十二团团长。

1928年 26岁

1月 驻守醴陵，担任湘东警备司令，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及保安队等。

2月 接到中共中央代表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准备组织驻扎在长沙的六军十八师起义，由于叛徒告密，未成。

3月 所属部队被程潜调回长沙改编，自己则被调到“两湖政务委员会”任有职无权的少将军事参议。

4月 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遭到破坏，身份暴露，遭蒋介石通缉。经杨杰、程潜相救，离长沙经江西去上海。

5月 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兵运工作时，一次在剧院门口被国民党特务和法租界巡捕盘查，被陈赓（当时化名为王庸）机智相救脱险。

6月 赴醴陵，准备与党领导的醴陵起义部队陈恭部和原长沙市委书记陈竞生取得联系，动员六军部分师、团起义，不幸陈恭和陈竞生早在一个月前已壮烈牺牲，于是

他在六军王西元团长的协助下，脱险返回南京。

7月25日 在南京给小学时学友赴荣先写信，历述十载军事生涯，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信中说：“中华民族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垂死的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这并非我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流血为快，实已物质环境所趋使，历史使命所昭示，更加现时制度的摧残，于是才毫不犹豫地站在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地对着目标走去”。

8月至10月 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省做联络和巡视工作。这一时期因受国民党通缉常被追捕。

11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苏联学习。行前，党组织为他搞到一张姓名为周保中的护照。从此，就改用了周保中这个名字。

12月中旬 乘英国货船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预备班，拟进红军大学学习。此时，取苏联名字为托维尔，同期同学叶剑英名为尤赫洛夫。

1929年 27岁

3月 在克里米亚度假时，从报纸上得知妻子金阿喜携儿子与弟弟奚李兆回云南家乡，乘坐新华轮，遇大风暴，在香港附近沉没遇难，悲痛欲绝。

1930年 28岁

3月 学习期间，正值苏联开展反托洛茨基斗争。因给王明提了意见，被打成托洛茨基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同杨之华等人一起送莫斯科五金厂劳动。

1931年 29岁

3月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布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党籍。

9月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国土相继沦陷。他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

11月初 先后到天津和北京，但都未能和中共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

12月中旬 到上海，恢复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周恩来接见了，并指示他到东北开展抗日活动。

1932年 30岁

1月 到沈阳，获悉满洲省委因出叛徒，迁往哈尔滨，即赴哈尔滨找省委。

2月 到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满洲省委机关，接上关系，任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协助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和《义勇军组

织法》。提纲指出：“我党必须发动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将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并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

3月 亲临吉东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开始潜伏在宁安县“郭家老店”，后为便于隐蔽、开展工作和解决吃饭问题，同当地党的负责人苏兆虹之祖父苏喜亮一起凑钱，租了三间草房，以苏喜亮名义开“苏家老店”作为党组织的交通站，他的公开身份是店房会计。为了便于工作，他努力学本地方言以改变云南口音。

4月 在宁安县花脸沟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文件，介绍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经过及我党采取的策略；介绍了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情况。

5月1日 在宁安县群众集会上讲话，动员全民抗日。

9日 在宁安东一个屯子召集朝鲜族抗日群众开会时，被李杜的自卫军士兵误为日本侦探，用绳索捆绑押送营部，后又押送到驻牡丹江东岸铁岭河自卫军旅部。

13日 在自卫军旅部被盘问两个小时后，又决定把他送往总指挥部。

15日 被送到总指挥部，后又送到军法处受审。在受审时他申诉说：“我是关内一热血青年，来东北投马占山抗日的，他投降了，才投奔自卫军的李杜将军，不料贵军却以绳索相待，很是遗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愿提出几点救国意见奉献李杜将军，尔后，愿杀愿砍请便。”他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出发，提出了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

建立根据地等七点救国意见。自卫军首领又让他写了自述并回答几个战术问题，然后决定留他在宣传部里工作。这时，李杜本人率部被日军广赖师团追击退到依兰。他建议李杜和友军冯占海、王德林密切配合，击退日军。

下旬 与胡泽民同去磨刀石，找到救国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李延禄（中共党员），共商救国军的抗日问题（抗日救国军前身为原东北军吉林陆军吉兴旅六十三团，“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树起抗日救国大旗）。

6月 经李延禄推荐，李杜批准，到救国军总部，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任命他为总参议。

7月下旬 于宁安下城子举行李杜自卫军、丁超护路军，王德林抗日救国军等几支义勇军的联合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军，他任联合军总参谋长。8月初任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

8月上旬 率部攻打东京城，消灭日军300人。

中旬 第一次攻打宁安，消灭日军200多名。

月底 率部攻打汪清通辽河大甸子。

10月10日 出任救国军前方总指挥，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战斗中腿部受伤。

27日 腿伤未愈，指挥救国军第三次攻打宁安，全歼日伪军守敌，击毙了敌酋小笠少佐，缴获大批弹药物资。

11月上旬 在宁安县卧龙河子附近山上的窝棚里养伤，获悉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因贯彻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会议精神，以犯“左”倾错误为理由，于7月撤职的消息。他的省军委书记职务也同时被免除。

下旬 主持召开吉东地区党的秘密会议，会上决定：

(一)从抗日救国利害关系出发，用一切办法制止义勇军内讧。

(二)积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三)在吉东着手组织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

12月3日 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到镜泊湖南头(现名湖南)一带将于学堂、宫焕卿、九占(刘喜贵)等人的抗日队伍整编为一个旅。任命于学堂为总司令兼旅长，宫焕卿为司令部副官，九占为副旅长。

7日 获悉在《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中，仍然提出要“使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感到困惑。

1933年 31岁

1月7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愿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力，武装人民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

26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支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

3月上旬 命令部队开辟汪清游击区，攻下日军驻地安图。

15日 满洲省委作出决议，即《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指出了同友军签订联合作战的协定和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等任务。

在这前后，日寇举行大讨伐，进攻中东路中线(吉东

地区)。东北义勇军部队抗敌斗争相继失败。丁超投降，李杜、王德林、孔宪荣分别越境撤到苏联。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尔后，吴义成代理救国军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

6月初 率部攻打日军驻地敦化，于宁安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6日 率救国军攻下安图，随即又攻占抚顺、桦甸、敦化、蛟河等县的一些小城镇。

下旬 兼任新成立的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留守主任。领导边区军1000余人以大柴河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10月 磐石地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杨靖宇率主力部队南下会合海龙游击队，开辟新游击区。

10日 中共珠河县委在三股流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选举赵尚志为队长。

12月 率边区军到达宁安，与宁安县委成员李荆璞、于洪仁领导的工农义务队汇合。

1934年 32岁

2月1日 接到满洲省委关于加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党在各种反日队伍中的组织和掌握领导权的指示信。

15日 吉东局作出了贯彻省委指示的决议。

16日 在天桥岭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党领导

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并建立军党委，任同盟军办事处主任及军党委书记。

同月 提出反日同盟军纲领和复兴救国军口号。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号召南湖头、沙河掌以及辽吉边区救国军共同抗日，并派出以张建东为首的西北山工作小组，对一些抗日武装进行联络。

下旬 率领边区军一、三连到宁安与工农义务队200多人在平日坡会合。

3月1日 将“反日同盟军办事处”改为“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任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办事处设有经济委员会和总政治部等机构。

中旬 在绥宁中心县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他提出党的任务是扩大民族革命战线，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要求派得力的领导同志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到各种反日队伍中去，在有基础的队伍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反日会等团体和建立党的士兵支部。他还以抗日救国军总参谋长名义号召南湖头、沙河掌以及辽吉边区救国军等部共同抗日，并派李荆璞率义务队和边区军一部，以及于学堂旅出击作战。

同月 东满各地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

4月6日 主持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开展游击活动问题。

13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的紧急通知》，对东北党的组织提出：“加紧

对人民革命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的领导，扩大抗日武装队伍，创造和巩固根据地，号召群众起来推翻日伪统治，建立民众政权。”

中旬 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助宁安县委，组织宁安反日游击队。

5月11日 主持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反日同盟军总政治部，在下属各军设立政治指导员，并决定在士兵中组织士兵反日会、士兵委员会和士兵代表会等群众组织。

6月20日 率由“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人员组成的东满派遣队150人到达绥芬镇，与东满特委研究赴汪清同人民革命军联合第二军进攻大甸子问题。

7月 在庙岭袭击日军，消灭日军40人。

8月 与王得泰、童长荣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并肩战斗，在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9月2日 在林口县马鞍山一带与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三团会合。

11月初 主持反日同盟军党委和宁安县委在卧龙河西南沟召开军事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讨伐的目标是老游击区，宁安两翼没有讨伐队。因此，会议决定避实击虚把反日同盟军分为东西两路，开辟新区打击日军，并与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联系。

12月10日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到宁安，召开由反日同盟军党委和宁安县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

信”。

20日 会议结束。在会议决议案中明确指出，继续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目前任务，还提出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应用朱德、毛泽东的经验，实行游击战略战术，化整为零，灵活机动地粉碎敌伪军的围攻与经济封锁。

1935年 33岁

1月 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县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他任军长。

2月10日 在绥宁各地公开发表第五军成立宣言，五军军部和中共军党委也于即日组成。

20日 以五军军部名义，在法国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宣言，说明五军的行动纲领。

下旬 派五军参谋长张建东去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这时，设于上海的中央局已遭到破坏，从此，中共满洲省委与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东北党的工作开始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

4月5日 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等人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赴苏，行前，发出“临时通知”，要求东北各地党团组织遵照党中央以往指示，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

30日 于林口、勃利等地，在反击日伪“夏季大讨伐”的激烈战斗间隙中，撰写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

书》。

6月3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

7月 率部回宁安，将饶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

8月 主持召开二军、五军干部会议，决定由柴世荣李荆璞率部队西进额穆、敦化开辟新区，自率军部留守宁安，并联系东西两部。指示五军四团应以一个连的兵力进入虎林坚持活动；而其他三个连分成两路，一部分向日寇统治较弱的抚远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另一部分则向宝清地区逐步深入。

9月 率留守宁安部队对伪军自卫队发动突然袭击，缴步枪40余支。第一军与东满第二军会师于蒙江县那尔轰，打通了南满与东满、吉东地区的联系。

22日 率军部在九站旅袭击日寇100余人，毙伤敌3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

11月24日 于宁安东密营遭日寇包围，与警卫连失去联系，只率随从人员撤退，转移。

12月7日 率第五、二军各一部，在镜泊湖左岸，毙伤日寇30多人，伪军150多人，接着在通沟子袭击日军增援部队，缴枪20余支，炮4门，轻重机枪10挺，迫使通沟子伪军40余人投降。

20日 派副官刘汝琴率5名青年义勇队员和一小队士兵将拟定的《今后游击运动的新阶段和整顿反日联合军的活动方针及第五军的一般活动计划》送给二军二师参谋长

陈翰章。然后随陈参谋长一同东行，去与二军参谋长取得联系，再将带的几封信交给副军长柴世荣、师长傅显明等人。

23日 到青年义勇军驻地视察，传达少共国际第六次大会内容及少共组织新路线，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共青团的任务。

24日 接到满洲省委及吉东特委的指示信17件。同日，派人赴关内（北京方面）寻找党中央。

同年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因怀疑满洲省委有奸细，错误地取消了满洲省委，调省委负责人到莫斯科接受审查。这年11月至翌年1月指挥抗联二、五军部队联合作战，在宁安、额穆、敦化地区，挫败了日寇的冬季大“讨伐”，在通沟岗子、额穆索、黑石屯等战斗中大量歼敌，获得胜利。

1936年 34岁

1月3日 主持召开全军大会，讲了当前形势、布置了今后任务，制定了1936年五军军事行动计划。

20日 在镜泊湖北湖头五军军部召开二、五军党委特别会议，研究了两支部队的整顿、发展以及配合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等问题。并计划由二、五军联合南满第一军，共同夺取安图，以它作为将来东北人民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还决定五军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以北转移。二师为先锋向穆稜、密山一带转移。此间，受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吴平指定兼任吉东党委员会执行委员。

2月 为掩护主力北上，率领军部以宁安为中心，西出敦化、额穆，东进东宁，在图佳铁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在烟筒沟伏击伪军一个连，缴枪90余支，子弹万余发。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它抗日武装参加，壮大抗日统一战线。

于镜泊湖南湖头村（现名湖南）官焕卿家召开了二、五军党委联席会议。中共东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与组成东满吉东等四个省委的指示。会议着重研究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关于建立四个省委筹建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

东北反日联合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任军长。

14日 在东南密营主持召开二军、五军高级干部会。会议议程是：1.做目前政治形势报告；2.制定二、五军新的工作计划。

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20日 与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等共同签署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一指示，决定以东满、南

满、北满和吉东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四个省委。当日，日军使用化学毒气，五军一师70多名指战员牺牲，写长挽联悼念。

3月 代表吉东特委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扩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参谋长崔石泉，政治部主任崔荣久。二师下辖四、五两个团。

魏拯民到达安图县东满特委驻地，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抗日联军第二军，由王德泰任二军军长，魏拯民任政委。

代表中共吉东特派李延平接替李延禄职务，将李延禄部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李延平任代理军长。同时指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向同江、虎林一带扩展游击战争。

4月 日本东关军制定了为期三年的治安肃正计划，确定了以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延吉)、安东(丹东)、奉天(沈阳)等地区为重点，调集10万兵力实行军事“讨伐”，强制实施归屯并户，以隔断抗日军队与人民的联系，妄图在三年内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

27日 率五军一部袭击图宁路老爷岭三台店站，击毙日寇和铁路警察多人。

5月 草拟《为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修筑集团部落，增兵满洲，武装移民，告民众书》并以抗联第二、第五军政治部名义公布。

6月18日 从6月4、5、7日《盛京时报》，获悉国民党两广实力派发动反蒋抗日，宣布组成中华民国救国军。

7月15日 接到张建东参谋长从上海寄来的信件，用暗语报告与中共中央取联系无望。

8月 日寇大“清剿”，向五军军部连续进攻九次。

9月初 在政治部主任张中华的掩护下，率部向道北转移，派金石峰为留守处主任。

18日 为纪念“九·一八”国耻日五周年撰写《死里求生告同胞书》和《求生必读》两本小册子，散发到部队和乡间，号召东北同胞行动起来，为挽救祖国危亡，为求得民族生存而进行殊死战斗。

22日 率教导队一、二两队在东移中，于九站附近袭击日军用列车，歼敌100多名，得大批军用物资。

24日 为了进一步贯彻“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宁安泉眼头主持召开二、五军干部会议。会议决定：1.率五军军部和第一、二教导队北进与柴世荣率领的五军主力会合，在穆棱、密山、依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2.五军余部和二军二师在宁安一带继续坚持斗争；3.组织中共道南特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抗联部队和地方党组织。

28日 率部队从宁安出发北上，与道北特委共同商定五军主力转移到中东路道北后的军事行动计划。同时与三、四军领导人共同帮助谢文东民众军、李华堂支队分别改编为抗联第八军和第九军，并派出五军许多优秀干部到八军任职，如共产党员刘曙华为八军政治部主任。

10月初 参加饶河宝马顶子会议，讨论四军二师改编问题。会议一致同意二师为抗联第七军。

11日 抗联第七军宣告成立。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继续活动在五常、舒兰山区。由勃利县驼腰子金矿工人反日暴动组成的祁明山部义勇军，改编为抗联独立师，师长祁明山（改名为祁致中），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

日寇先后在牡丹江地区、松花江下游地区张贴布告或散发传单，悬赏捉拿周保中，赏金五万元增到十万元。

此间，指挥五军活动在吉东地区四十余县，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37年 35岁

1月1日 代表第五军第二师党委及道南特委撰写给赵尚志等人的信件，即《给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及北满党组织信——北满党及三军路线之分歧及对中央代表团的意见》。

中旬 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员于化南到方正，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抗联第三军领导机关联系工作。

21日 集中在松花江下游两岸活动的抗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军各部，有被日寇聚而歼之的危险，于是提出了主力部队西移问题。

2月13日 委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员、吉东省委负责人于化南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交两封信。信中对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在组织领导上的严重缺点，表示了不同意见。

下旬 主持召开由二、三、四、五、八、九军各一部军事将领参加的联军会议。为阻挠日寇在依(兰)、方(正)、勃(利)、宝(清)地区实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打击歼灭敌人，决定采取联合作战，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出任总指挥。会后率领五军各部游击队，先后集结在牡丹江地区。

3月14日 在四道河子召开的改组道北特委为吉东省委的会议上，他和于化南、刘曙华、王光宇当选为省委执行委员，原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为省委书记。

19日 夜指挥抗日联军进攻依兰县城，战绩登载于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4月9日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来信提出，北满省委愿进一步与吉东同志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

中旬 主持吉东省委于四道河子召开军事会议，重新布置军事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

1. 五军第一师部队和军部以牡丹江中游两岸为临时后方根据地，以勃利、方正为中心，进出于中东铁路沿线，配合二军派遣队向宁安移动，开展旧绥宁区游击活动。

2. 五军以二师四、五团为主力继续开展依(兰)、富(锦)、宝(清)、同(江)地区的游击活动，打通与四、七军的关系，并在富锦、宝清、依东分别建立后方根据地。

3. 留在垅山后方的留守处主任、五军五团团长安庆福，负责保持与三、六军、独立师和地方党组织、群众的联系。

接到北满临时省委3月31日来信。信中写道：“周保中同志北来后，在联军关系的周旋上，在联军会议上，在党内斗争中表现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诚恳与真挚是正确的。”

30日 再次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脱离实际的遥控领导提出批评意见。

5月下旬 冯仲云、张寿箴（李兆麟）过松花江到达吉东。与冯、张二人连续三天谈至深夜，冯、张要求周去北满协助解决北满党委内部的纠纷问题。

6月3日至5日 北满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箴来见，继续商谈。最后商定：6月中旬，与九军军部会合，然后共同去参加北满临时省委第一次执委会议。

中旬 看到了1937年4月15日在《救国日报》、《解放日报》刊登的《党中央给全党同志书》，除立即组织吉东省委学习外，还派人送一份给北满省委。

24日 与张寿箴一起前往北满临时省委赴会。

·月底至7月初 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汤原召开。

在会上引用列宁在《进一步退二步》中的有关教导，为解决党内分歧作了大量工作。并答应张寿箴提出的派五军干部到祁致中独立师任职的要求。

7月19日 参加吉东省委在双鸭山召开的会议。

8月25日 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紧急通知》。

31日 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将桦南孟家岗日军黑石部700余名诱至五道岗，五军三师八、九两团，从南北山头截击日寇，激战一天，击毙日寇370余人，伤50余人，打死马200匹左右，日寇遗弃枪支220支，轻机枪10余挺。残敌逃往太平镇。

下旬 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8月5日在给吉东省委

和抗联五军的信中，赞扬周“解决一切复杂问题是坚定地把握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9月初 派季青筹建下江教导队，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满足迅猛发展的抗日联军的需要。

29日 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备委员会。第二路军以五军为骨干，四、五军为基础，联合八军、十军、姚振山的东北义勇军和王荫武的救世军而组成。

10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辖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和救世军共6个军，主要游击区包括乌苏里江左岸，沿牡丹江和松花江流域20余县，与杨靖宇为首的南满和以赵尚志为首的北满抗日联军形成互为依托品字之势。

同月 赴下江，整顿抗联第四、五、七军。

11月初 由饶河重返宝清五军后方，检查五军所属下江部队工作，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对形势作了分析后指出，为打破日寇的围攻，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量储备给养和军需物资，准备利用老弱病残人员，实行部分自给屯，以防敌人的封锁。2.利用冬季，将部队中新参加抗联有鸦片烟瘾的送后方忌烟。3.选拔青年优秀干部战士，送联军教导队进行训练，以提高军政素质。4.准备1938年西征，补充调整干部队伍。

30日 由宝清重返饶河，以吉东省委代表身份，主持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做《目前政治形势报告》，并主持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改组，崔石泉为七军党委书记。会议

确定了七军1938年游击活动方针和军事计划，决定下江特委和抗联七军受吉东省委领导，调五军干部王效明、王汝起到七军任七军政治部主任和一师师长。这次会议开至翌年1月5日结束。

当年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满洲代表吴平撤离东北后，抗联二路军、南满地区抗联部队即与代表团失去联系。

1938年 36岁

1月6日 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写信，询问与代表团如何联系。

16日 因海参崴联络站无回音，遂在乔书贯等三位随员陪同下起程，穿过宝清林海雪原，经二人班，从乌苏里江过界到苏联的比金，寻找留海参崴的中共代表团联络员——斯达干诺夫（化名）。

2月1日 在比金再次给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写信，要求联络站将给代表团写的信转去。不久，接到回信，得知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代表团已从1937年秋停止领导东北党组织，今后东北党组织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又函问联系的具体办法，但未获答复，后要求赴机关面谈亦被拒绝，只得写一书面报告委托联络站转给中央。

14日 深夜冒雪从比金返回国内到达饶河小西山，受到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接迎。

3月1日 召开七军独立师积极分子会议，六军部分人员参加。

11日 参加七军后方积极分子会，并作政治报告。

18日 五军三师八团一连12名指战员，被日伪军骑兵部队400多人包围，经一天激烈战斗，毙敌100多名，战马90多匹，冻伤杀伤日伪军80名，12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赋诗寄深情：

蓝棒山顶云雾垂，宝石河道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倭奴伪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胆壮气豪动神鬼。

不惜捐躯为革命，但愿失土早归回。

他年民族全解放，指点沙场吊忠魂。

中旬 针对日寇对下江一带游击队实行重兵包围、大讨伐“聚而歼之”的计划，命令各军寻找解决给养的出路，建立密营，做好游击队的后方基地，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下旬 获悉抗联三军、六军、十一军军长赵尚志、戴洪斌、祁致中等北满抗日将领，被苏军远东司令部无理扣压。他焦虑万分，给苏方写信寻问三个军长的下落。要求苏方帮助寻找、放人，但无济于事。

4月 指示七军突破敌人封锁，开辟新的游击区。

5月1日 召开抗联二路军高级干部会议，经反复研究，制定了西征计划。会议决定由柴世荣、李延平、王光宇率五军一、二师和四师主力会合；陈翰章的二军五师先南进，后西征，首先在宁安、东安地区，恢复老游击

区。然后分兵西进五常、舒兰、榆树地区，经吉敦线与一路军取得联系；亲率二路军总部留守宝清，掩护西征部队突围。

会后，又与四军干部讨论了关于军队建设、游击区域、根据地、统一战线、统一领导，贯彻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以及与一、二军联系等问题。

主持召开各军政治部主任会议，要求各军选拔一批经久考验的、有战斗经验的老游击队员离开部队，转入地下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做长期潜伏。

6月2日 与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就党在八军中的作用、干部与群众基础、游击活动、停止发展谢文东入党等问题进行讨论。当天还制定了七军教导队政治教育临时提纲。主要内容有革命军队的创造与组成；革命军队的领导方式及教育管理；革命军队的领导和目的，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性质；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及工作方式等。

7月初 得知西征部队攻克三道通，越过老爷岭深山密林，突然袭击苇河县的楼山镇，俘敌中队长以下140余名，获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等消息。

8月 获悉西征部队进入五常后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深为焦虑。同时，指示成立四、五、七军下江临时党团组织，但当时未能成立，只成立了下江三人团为统一领导；书记季青，王效明、鲍林为委员。

13日 收到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海光送来张寿箴自绥滨发来的信件，主要介绍了北满党常委第九次会议情况，

并询问对建立抗联第三路军问题的意见和要求。遂即回信谈了有关问题。率二路军指挥部由富(锦)、宝(清)向依(兰)方向转移。

10月上旬 抗联八位女战士投江殉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八位女烈士的生平。

本月主持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因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当选为吉东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负责吉东地区党、政、军领导。日军散发的传单，题目为《用一两黄金换周保中一两肉》。

11月 五军军长柴世荣偕该军一师师长关书范前来汇报西征情况，他们说：由于改变了原定西征路线，兵力过于集中，给养供给不足，行动迟缓，又由于叛徒泄密等原因，西征部队在西出一面坡，攻下委山镇后，则遭到强大敌人袭击。又因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的影响，所部溃散。而四军及五军第二师冲出包围后，坚持向五常挺进，终于在冲河一带和第十军会师。

派秘书赵伯华赴汉口寻找党中央，给党中央写一封长信，汇报了整个东北抗日战场敌我双方情况，并附有珍贵的照片资料；还以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的名义给李杜将军一封信；又以整个东北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衔名暨全体将士的名义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总司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朱玉阶(即朱德)等一封公开信；同时还把一份向全国抗日将领，全国各报馆，全国同胞的通电，一并交给赵伯华带去，但因赵伯华叛逃，上述文电均未送到。

1939年 37岁

1月6日 在牡丹江东岸柳树河子，主持吉东省委干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决定清除五军中动摇分子，开除关书范、赵志超、郭郁洲党籍，撤销这些人的军政职务。

16日 主持召开了四、五军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到会者有300余人，一致拥护党委上述决议，并下令处决了关书范。

2月初 率总部绕过敌人道道封锁，转移到牡丹江西岸，越过老爷岭西侧，到达陈家亮子，袭击日资经营山元木场。

15日 率部队到达葫芦崴子半拉窝集，得悉东西两路西征突围，均遭失败。于是决定就地短期休息，并召开了追悼突围中牺牲的将士大会，作挽词痛悼烈士，激励生者。

3月中旬 任吉东省委书记。

23日 前往吉东东部地区，集合溃散部队，开辟新游击区。

27日 于牡丹江东岸与五军军长柴世荣会师。

28日 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坚定意志，加强团结，克服一切困苦。同时指出：现在虽然处在被敌人重重包围万分危急之中，能否突破敌人各种包围、封锁、进攻，没有完全把握，但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上刺刀和敌人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冲锋肉搏，宁肯为民族解放而流血，保持革命的贞操和气节，不能丝毫放弃共产党的主张。

30日 在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里，主持了吉东省委的扩大会议，做了《1938年游击运动损失奇重》及《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防奸破坏中东北游击战争的目前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形势，总结了教训，肯定了抗联功绩，鼓舞了士气。並提出重整旗鼓，收集联军各部，加紧整顿，加强联络，巩固内部团结，做好防奸，重新布置兵力，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议还批准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会议决议，决定崔石泉任七军党特委书记，景乐亭为代理军长。扩大会议于4月1日结束。

4月10日 率部在葫芦崴子利用地形伏击日伪军后突围。

中旬 得知陶净非率五军五团部分队伍，在敦化大蒲柴河找到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于是与第一路军恢复了联系。

25日 发出《西征经过的通知》总结二路军远征五常的经验教训。

5月1日 率二路军指挥部冲破敌人冬季长期讨伐，在茄子河边举行了庆祝突围胜利大会。

7日 率部到达宝清兰棒山的宝(清)密(山)留守处。

11日 日军向远东苏军挑衅，“诺门坎事件”发生。及时布署抗联部队破坏日军宝清到密山的运输线，袭击小股敌人，並在依东、富锦和宝清等地积极活动，策应了苏军的行动。

7月 撰写《告日本将士书》、《告民众书》和告《满洲军警官吏职员书》文件，散发到日伪军营。并编写了《政治学

常识》、《社会主义常识》、《军事学常识》、《中国共产党史》、《妇女运动史》等临时教材，供内部学习使用。

10日 以吉东省委执行部名义发出《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

10月6日晚 在宝清县兰棒山上京石泉溪旁，同王一知结婚（王一知，原名郭维轩，1917年11月19日生于吉林省依兰县，1934年在依兰县中学学习，后在佳木斯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五军妇女团指导员，中共东北党委会委员。

16日 派王一知到被服厂赶制军服。王一知等遇险，20多天才突围出来。

11月中旬 得悉三军军长赵尚志等率100多人从苏联返回抗日前线，赵因错杀了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等原因，不能返回满洲省委，故又去苏联。

28日 应苏联远东军代表和北满省委书记冯仲云之邀请，再次越境去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城（伯力）解决赵尚志问题。

12月20日 委任季青为五军政治委员兼绥宁区、敦（化）延（吉）区政务特派员，派其赴道南与柴世荣、陈翰章、侯国忠等人共同领导道南抗日斗争。并带去了一封给杨靖宇的信。

同年内 二路军李学福、陈荣久、李延平、王光宇、张中华、刘曙华等军师一级的指挥员绝大部分牺牲。为烈士们写了大量的悼念文章，并提出了抗联旗帜不倒的豪迈

誓言。

1940年 38岁

3月 在苏联伯力举行了有苏方代表参加的吉东、北满党代会，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会上，对北满省委做出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提出了不同意见。与冯仲云联名给北满省委写信建议应该给赵尚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同时提议调赵尚志到自己所领导的二路军来任副总指挥。这次会议确定了以保存实力为主的游击运动方针，形成了《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草案》两个文件。会议并确定了抗联部队缩编及缩编后的统一番号。第二路军改编为二、五、八三个支队，今后苏联方面与抗联联络代表的代号为王新林。接受了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等提交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篪、北满省党委冯仲云的指示提纲》，即称3月提纲。拒绝了苏方代表在会议要结束时，突然提出将抗日联军和中共党组织“分开”的提议。当场明确表示说：“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党和抗联不容分割，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独立性。”

24日 亲自起草以他和冯仲云的名义代表吉东、北满党组织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反映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原则、立场及组织观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失去上级党领导的苦衷和希望得到上级联系的强烈愿望。

27日 与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率卫队从苏联境内出发，次日回国到达宝清地区小木河，立即找到七军领导王效明、崔石泉，简要传达了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

4月1日 召开了七军党代会，历时7天，到会者480人。会上作了传达报告，组织了讨论，最后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接受并拥护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新的工作提纲；二、同意省委代表的工作报告，拥护省委领导路线；三、第七军改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下分三个大队，任命了大队长、政委等。

8日 与总部留守部队和五军三师九团，遭十倍之敌军的“围剿”，同敌作战十次之多，伤亡严重。

15日 召开二路军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目前形势和斗争任务、作战部署、队内巩固、军事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问题。

下旬 通过交通员同三军、五军、二军取得联系，询问了对赵尚志党籍处理意见。

6月4日 率总部及东线游击队，在宝清南青龙山兰花顶子附近袭击日寇，在兰棒山汽车道的修理场，击毙日本监工并将200多名劳工全部释放。

7日20日 给苏方代表王新林去信，提出“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和帮助，我们要派代表到内地去找中共中央解决东北问题。你能否帮助从伯力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抗联在当前处境下“是要死守阵地，还是在极不利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余部势力，以图再起”。

下旬 派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为全权代表，赴苏联

联系。

31日 率骑兵部队在七星河上游与伪满军第九团接火，激战两小时，以少胜多，予敌大量杀伤。

8月10日 召开二路军总部第二次全体党委大会。对夏季以来的游击活动进行了总结，并根据内外情况，研究了新的工作提案和整顿党组织问题。

11日 在给第二支队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1. 吉东游击活动斗争环境必将继续严重，尤以完达山脉下江地带为最甚，要求下江抗日游击队依靠完达山脉坚持抗战，并注意保存实力。2. 强调以虎林、饶河山林地带为进出活动之依靠。敌进我避，保持实力，防敌遮断我入山要道，防敌在雪季用骑兵迫我于平原。防敌设伏袭击，防敌包围。3. 需突围时，必须顾及设伏、尾追之敌。

9月8日 率部由勃利、宝清地区向南转移。

14日 撰写题为《论日寇近卫内阁之悲运》社论，刊于二路军《红军壁报》第四期（油印版）。

18日 召集高级干部军事会议，宣布《脱离敌人之围攻计划》，公布行军路线。为通过勃利及东南两道新封锁线，跨越图佳铁路林（口）佳（木斯）线，进至依兰、刁翎区，完成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强调应避免与敌接触，万一遭遇意外，必须打有把握之仗，不为敌人窘迫。

10月4日 在沟口密营附近被敌包围，与敌接火约半小时后，率部转移至东山顶，进入密林，敌有伤亡未追击。秘书金京石在退却时，将其装有重要文件背包丢失。另一秘书王春发战死，副官陶雨峰负轻伤。部队的文件、地图、

统计调查表和情报等均遭损失。

6日 率总部成员重赴国际台西大山与警卫队会合，两部指战员分外喜悦欢畅。晚听取崔石泉参谋长、姜信泰政委、朴洛权队长关于敌情战况的汇报。敌情：富锦南老煤窑西南地带，桦南、依东间，林佳铁路线东侧，敌活动频繁，群众绝迹。敌人沿铁路线增兵设守，步步为营。铁甲火车不断往来巡视，每次列车通行前后均有压道车。战况：与敌接火数次，受敌压迫后，化小部队机动，突入孟家岗，炸毁机车7辆，车中敌死伤400人至500人之多。我掩护部队亦遭敌人堵截。

8日 召开干部座谈会，分析敌我双方态势，决定向东缓缓转移。

9日 到达兰花顶子西南谷地宿营，电台与苏方电台取得了联络。

10日 赵尚志、于保合、王一知等八人从伯力出发赴宝清找他，未遇。同日，他率部至兰棒山汽车道，因敌人驻防，绕绕力河岸，于夜间渡河。

14日 派出便衣队夜赴宝清街南八用稻地，征发给养。

在宝清东南双鸦山附近收到苏联方面电报。电文内容是：决定本年12月上半月，在我处召开司令官会议，中共中央代表也来参加会议，请周保中、张寿篪、冯仲云、杨靖宇（当时已牺牲，编者注）、赵尚志、王效明到会。

16日 宿营在大索伦河岗南方森林中，并派出姜信泰

政委带队赴宝清东购买给养和军需物品，并侦察敌情。24日到达预定地点。

22日 率部由勃利、宝清地区向东转移。

24日 大雪纷飞，姜政委未归，供养断绝，敌情不明，气候骤变，陷于束手坐围之境，万分焦急。

26日 姜政委仍未归。恐有意外，于是当机立断，集合总部全体指战员，紧急动员，决定以强行军通过大河镇以南及虎林西北尖子山、土顶子一带，再横过阿布沁河三人班，直插横道河子。在给姜政委留下联络暗号后，率部在风雪中继续转移。

27日 打破夜间过桥常例，先派尖兵班趁敌不备，抢先过桥，在桥南与敌七八十人遭遇，警卫队卫队长朴洛权指挥与敌激战。遂率总部与警卫班抢占山顶高地，掩护朴洛权率部脱离敌人。敌疯狂追击，从山下仰攻并袭击我左侧背，为免陷孤山顶上，便立即突围。为迷惑敌人，于当日晚，徒涉水甚深的三人班西北小河，消去行踪，部队散走于大山之中，后向东撤去。

28日 敌察觉抗联行动意图。急调日军四五百人，伪满军数百人，分七路纵横向抗联部队搜索、“围剿”，妄图一网打尽。此时与大家已断粮数日，又连续急行军，艰苦卓绝，形势十分紧张。

30日 崔石泉参谋长派出游击队员得一只旧小船，如获至宝，使部队转危为安。全体指战员百余人连夜全部转移渡江。在江中沙州得到二支队储藏的给养。敌则望江兴叹，恼怒至极。

11月3日 率部渡过乌苏里江，到达苏联境内。

12月上旬 抗联其他领导也陆续到达伯力。苏联远东军代表与他见面，想通过他说服抗联各领导同意苏方将东北抗日联军改编为苏军侦察队的要求。不久，会议召开时，又发现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没有与会。经向苏联方面询问，回答是：只有用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才能将抗日联军各将领召集到这里开会。

18日 与三路军一部分干部召开干部联席会议，选举党临时委员会。

20日 与张寿箴联名写信给苏方代表王新林，请苏方帮助解决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问题。

同月 主持第二次伯力会议。会议参加者有：吉东的王效明、崔石泉、柴世荣、季青；北满的张寿箴、金策、冯仲云，以及南满省委和一路军代表×××、安吉、徐哲等12人。会议经过讨论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坚持共产党的立场和原则：（1）北满抗日游击活动，不论其现在情形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日游击运动和一切问题由党组织决定。（2）东北游击运动接受苏方领导是临时的特殊状态。（3）按照现实全部环境不论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或为巩固苏联边防工作，加强东北游击队与远东红军间的关系，显然很重要。但中共东北党组织，必须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去进行自己的工作。

2. 关于任命司令问题。郑重指出：苏联远东军代表提出没有保持抗日联军独立性，把两国军队合为一处，

由王新林任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主张，是一个要改变抗联性质的严重问题，是错误的。同时批驳苏方代表王新林说：“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未解决，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未丧失，为什么要取消我们的斗争”。还指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我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但首先是爱国主义者，打败日本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帮助苏军搞情报是体现国际主义。有了爱国主义才能谈得上国际主义，这个主次关系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就等于头朝下走路。苏联应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援助各国人民革命，更应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东北抗联必须独立，游击战必须坚持”，任何取消主义都是错误的。“总司令若由王担任，日寇、国民党都有口实进攻，我们决不同意。”最后决定把双方意见上报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就在当年年底，进入苏境的抗日联军人员，分别在苏联远东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和伯力（哈巴罗夫斯克）附近70公里的雅斯克农庄附近森林中建立和组成南、北野营。

1941年 39岁

1月3日 得知一路军越境部队在苏联某地受检查，立即给王新林写信，要求苏边防军“于检查手续完竣后，迅速解放。”

5日 与南、北满省委负责人商讨筹备召开满洲党代表会议问题。

24日至2月4日 与赵尚志、冯仲云开会，讨论回顾了自1936年以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历史之后，三人一致通过写成二个文件：

1.关于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

2.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的提纲草案。

2月上旬 草拟《国际形势问题和皖南事件评论》。

15日 与金策联名就一路军越境入苏无理被扣压，吃粮不足以及干部配备等问题致信王新林。

20日 给野营及游击队全体同志去题为《为革命而斗争》信，要求大家加强军事训练，努力学习文化，遵守革命纪律。

25日 与金策在南野营举行会谈。

28日 就皖南事变发生经过及我党的态度发表了演说。

同月 抗联派多股小部从苏境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活动。

到B野营，改组道南特委为三人团，由季青、柴世荣等组成。

抗联西征部队回到五军军部。

3月3日 调崔石泉为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兼七军军长职务。

中旬 为建立统一的满洲党组织找有关同志谈话。

29日 派季青回宁安率小部队开展游击运动。

31日 主持召开二路军干部会议。

下旬 苏最高统帅部通知远东红军司令部调离苏方代表王新林，并给以处分，并派新代表就职，代号仍为王新林。苏方还申明不干涉中共党组织。

4月13日 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之要求抗联停派部队回东北，理由是“环境不许可，怕日本挑拨”。

18日 就如何加强部队中党员的党性锻炼；春耕的重要措施；东北游击运动；东北党组织怎样去适合斗争环境要求以及野营如何更加巩固等问题写信给冯仲云。

27日 撰写北满游击运动史，内容包括：珠河游击队的创立经过；第六军的建立编成及其发展；北满抗日联军的组织经过及其纲领；1938年严重时期的北满联军状况；1939年至1940年转变时期，北满联军的改组及游击队斗争概况；历年北满各部队显著战役及战史资料。

5月初 吉东、北满党组织举行会议。在会上，他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为指导思想，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讨论了对苏日中立条约的态度，澄清了抗联与远东军关系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了抗日到底的信心。

10日 写信给王新林，重申抗联的严正立场，对停派抗联部队回东北的主张提出异议，信的主要内容是：

1.就苏远东军与抗联的关系问题指出：苏方对抗联的指示，必须根据中共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按照中共的组织系统，适合东北党的自身要求，目前这种指导帮助关系是临

时的，非正常的。

2.就苏方提出停派抗联回东北问题，强调指出：第一，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驱逐日寇出东北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第二，若把抗联许多重要干部和部队长期留在苏联境内，会造成许多不利，无论在工作领导上，各地相互配合上以及与群众的联系上，都会受到影响，长此下去，抗联会自行消亡。远东军停派抗联回东北，只顾自己一面，没有兼顾东北游击运动的实际需要是错误的。第三，声明抗联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没有经过东北党组织自己讨论，绝不能作出与中共路线不一的决定。“要改变东北游击运动的策略，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才有组织的系统根据”和“政治直接领导的权力”，他还直率指出，远东苏军无权改变抗日联军的行动策略。第四，我们的抗日从来立足于自立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形象地说：“自与远东军建立工作关系以来，我把脚立稳在地上，我没有把脚挂在头上。”同时指出援助是互相的，我们抗日“客观上就是保卫苏联”，我们拥护和平外交政策，但从不抱幻想。

3.信中最后表示：同意抗联主力暂不派回东北，但“一要派遣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活动，二是对留在南北两个野营的抗日联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进行军事训练。

14日 中共东北党组织提出了《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强调指出：过去的经验教训，集中一点就是敌人是统一的，敌人以统一的领导及统一的军事、政治来进攻我们，而我们却没有统一的领导“不

能用统一的计划来反击敌人”。

26日 代表吉东、北满党组织就日苏条约问题起草了《政治问题讨论案》重要决议。决议指出：第一，抗联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拥护这个条约”，因为它可使苏联“在东方获得和平基础”，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日本劳苦群众，可免去被拖入反苏军事轨道，减轻战争灾难，对于限制日本帝国主义大战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也有一定的作用。第二，条约签订对于中国抗战和东北游击运动会发生一些不利影响：国内抗战营垒中的顽固派会借此大作反苏宣传的文章，造成对我不利的政治攻势；抗联部队返回东北必然会受到“部分影响”。但苏联还是从根本上援助中国抗战，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因而，对条约应持拥护态度。

会议正式批准在中苏边界苏联境内成立南北两野营。

6月17日 巡视A野营营房，营房秩序及清洁卫生等情况良好，并听取了野营党委书记姜信泰的汇报。

18日 出席野营党的积极分子会（主席李永镐，记录彭施鲁），作了关于《目前东北游击运动形势及工作任务的报告》。同日下午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抗联指战员：不要忘记第二次大战，不要忘记抗战四周年，不要忘记自己在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中的历史使命，作好赴东北抗日的一切准备。并公布了派遣和待命的一、二、三路军的名单。

7月4日 召开纪念“七七”抗战四周年大会，做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

13日 派金策、崔贤章小分队从苏返回东北庆安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20日 参加跳伞训练，在离地面400米时因主伞发生故障未张开，遂急放备补伞着陆，跌伤臂膀。

26日 再次跳伞顺利着陆。

8月8日 妻子王一知在哈巴罗夫斯克生一女孩，乳名嘉利娜，学名周伟。

11日 派季青率小部队从苏返回东北东宁、汪清、宁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9月9日 撰写《中国抗战情况》一文，指出：中国抗战近来转机，中国军队在浙、闽、苏、皖各地均向日寇进攻，在鄂北、豫南展开猛烈进攻，并奇袭福州。同时派王效明赴虎(林)、饶(河)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0月 赵尚志率小部队从苏返回东北，在汤原一带活动。

冬 共产国际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14日 派交通小分队从苏赴东北打通与王效明小部队的联络。

1942年 40岁

1月4日 主持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小分队南北野营中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25日 在野营第二次党员大会上，做关于野营党四个

月工作总结报告。

22日 主持召开南野营党员大会，制定并通过党团员会议决议案。

春季 派于天放带五名同志从苏返回东北执行任务。不久，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又派陶净非率部队从苏返回东北越老爷岭，深入五常、舒兰等县开展游击活动。为了在老爷岭以西建立根据地，又派柴世荣在中东路道北穆陵、林口地区活动；派季青率领部队在道南活动；派金同志到南满寻找魏拯民。东北抗日联军在其与张寿箴、崔石泉等的率领下，陆续完成军事战略转移。

后来向苏方代表王新林提交了与张寿箴共同草拟的《党组织改组与集中领导》的报告。报告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建立统一的东北党组织的迫切性。同时指出：苏联同志只能站在国际主义、兄弟党的立场上来帮助、指导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不能代替中国党直接指挥东北人民解放斗争的任何政治宣传和革命组织活动。并引用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的内容指出：“没有这样坚强统一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党所担负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报告最后指出：“要实现东北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要解决东北游击队的全部问题”，“只有党领导的改组及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恢复，才能得到最后解决”。

5月18日 在野营党委扩大会上讲话，内容有：

(一)国际形势；(二)国内抗战形势；(三)东北抗联去年活动概况和经验教训；(四)党组织问题；(五)关于给养

及宣传问题。

7月22日 王新林传达了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命令，委任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即国际八十八旅）旅长。并指出中国旅在将来发生满洲大事变时，对苏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所具有的重大连锁作用，并强调旅的成员应是将来在东北建立大军之基干，希望努力完成此项任务。

8月1日 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改编，原三个路军所辖各支队正式改编为《国际第八十八旅》，任旅长。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参加了改编大会，并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抗联的斗争。指出：中国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给日寇沉重打击，在打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开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并且用武装和鲜血帮助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单枪匹马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从而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作出了最大贡献。另外，抗联还付出重大牺牲为苏联红军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他最后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血换来可靠的情报，为我们在远东作有效防范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有句俗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是在老虎嘴中拔牙式的侦察中得到情报，既准确，又有价值，又及时。我佩服中国的英雄们，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

下旬 给东北十五支游击小队布置战斗任务：

（一）侦察日本关东军军事、经济、政治等各种情报，特别是在临近苏联边境的要塞工事地带。

（二）秘密发动群众，宣传动员抗日救国，鼓舞群众斗志。

(三)骚扰敌人,在有利的条件下,袭击日伪军据点。

(四)破坏敌人铁路、公路、桥梁、电线等交通线路。

(五)设法同潜伏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规定侦察小部队派3人到北满地区,派8人到吉东及延吉、敦化地区,派2人到桦甸、蛟河地区,命北安于天放部、桦甸郭地山部、敦化曲玉山所率各部均留原地活动。

9月13日 作关于留野营中的中共东北党组织状况及改组情况的总结报告。陆续制定与完善了有关部队思想建设,军事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各种计划。

在军队指挥人才的培养上,针对抗日联军当时成员官多于兵的特点,对四个教导营及一个无线电营和其它几个特殊兵种连队讲授军事理论课:军事辩证法,军事地理学,以及战略、战役、战术等方面的军事指挥要领,并对一部分军事干部进行了重点培养,要求他们具备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的才能。

在军事技术上,要求全体指战员包括女战士要达到人人会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像能测绘的水平。

此外,为了战争的需要,还规定每个指战员要刻苦学习俄语。

10月28日 给王效明电,指示其部继续留在完达山地区活动。

11月 派×××率小部队赴牡丹江侦察敌情。

中旬 随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巡视南线诸兵种冬季联合演习和政治教育情况。参观了苏军二四二旅向

假设敌进攻演习。并随切尔米索夫将军巡视了第八旅。

12月1日 给战斗在东北抗日前线的游击队第二支队负责人刘雁来写信，指示其加强侦察饶河一带敌情，选择视野良好地点建立后方根据地，在交通偏僻地区可开垦土地多种粮食，在最接近我们的群众中组织抗日救国会，并在伪满军和警察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8日 给张寿箴写信。要求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请收集有关苏德战争战况和有关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情况的材料。

1943年 41岁

1月15日 部署八十八旅扩编，就加强旅部管理和政治工作提出意见。此次扩编全旅新补充人数达600余人。

25日 作关于1942年至1943年教育检查、军事训练的工作报告，强调全旅的政治思想教育，应由中共党委独立负责，苏联辅助。指出这是军队的命脉和灵魂，应特别注意。

撰写《对远东太平洋政局估计》一文。

2月1日 向全旅作形势报告。

下旬 组织独立营、自动枪营参加现代化的军事演习。

3月 被苏军授衔为中校。

23日 制定“整风”计划和时间安排，制定后勤工作条例和实施办法。

5月1日 给王新林写信，指出在“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与四周隔绝”的情况下，在不失去我党独立性前提下，接受王新林的新指示纲领，即暂时接受其领导和物质支援。

6月1日 写信给王新林，对B城一些苏联人：不顾满洲工作条件，不注意游击队本身的工作需要，用冒险方法、欺骗方法、逼迫方法，派遣抗联游击队进行侦察工作，致使一些游击队员牺牲了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还指出：“必须改变这种不好的工作方式”，因为这样作不仅“破坏苏联边防工作，又破坏游击队”，因而是“违反远东军帮助我们保存游击队支队干部人员的意旨。”并要求王新林查清抗联做侦察工作的231人的下落后，从速调回八十八旅。

23日 针对旅内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指出：应注意本旅是由多民族成份组成之特点，要互相学习语言，生活融为一体。

7月2日 委托赴莫斯科的参谋佐林，给他16年前学习过的母校列宁学院院长克拉索诺娃·巴达尼带去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

12月1日 为全旅指战员讲授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44年 42岁

3月上旬 巡视野营之军事训练、内务勤务情况。

5月下旬 检查部署营房修理、土地耕种准备工作，帮助校定政治教员的教育提纲与教案，审定教授人员的工

作能力与水平。

25日 做关于《实行1944年到1945年新的教育提纲，共产党的任务和作用》的报告。

7月7日 召开全旅大会，作抗战七周年纪念报告及大太平洋战局形势报告。

9月 派陈春树、夏立亭、姜焕舟、陈明等18位抗联指战员赴苏远东军情报部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同年内 不断指示东北境内各抗联小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扰乱敌人后方。在南满、吉东、北满加紧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并要求把秘密工作布置到城市中去。

1945年 43岁

5月8日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在八十八旅驻地，主持召开中共东北党委会议，与会同志针对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讨论了今后东北抗日斗争的方针和任务，拟定了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方式，扩编抗联五万至十万人，将日寇赶出中国，以及继续派遣小部队赴东北等十项决策。

中旬 要求王一知将抗联敌后游击小部队陆续提供的侦察报告、侦察工作图、侦察要图、敌情图、敌情报告等进行积累、登记、整理，同时将有重要价值的情报提供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苏军远东军司令部按照部队不同的性质和任务，分门别类地制成手册，发至苏联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

6月2日 会见苏联远东战线总司令部的普尔卡耶夫将军，获知苏方即将开始对日作战的意图。就敌后工作，东北抗日联军和中国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及抗日联军如何与苏军主动配合、密切协作等有关问题与苏方交换了意见。还向苏方介绍了东北各大小城市的战略地位，日本关东军军事布置及设施分布的特点与弱点等。事后，普鲁卡耶夫将军称周保中为苏军军事行动顾问。

中旬 连续参加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召集的各种军事会议。因苏联最高统帅部要求进行严密、隐蔽的战役准备，军事会议的内容，只传达到抗日联军核心领导成员。同时，命令敌后侦察部队，排除一切困难，不怕任何牺牲，加强对敌侦察。

下旬 组织指挥了抗日联军的军事演习和军事考核，抗日联军全体指战员以优异的军事技术向党作了汇报。

7月中旬 派抗日联军指战员160人到苏联第一方面军、80人到后贝加尔湖方面军，准备作为苏军进入东北的先头部队。为执行特殊战斗任务，抗联指战员与苏军一起进行军事训练与演习。

下旬 派出抗日联军战士290人伞降到东北，计降在北满55人，松花江、牡丹江65人，北黑河90人，南满80人，所负任务是潜入敌后进行战前侦察。

主持召开中共东北党委会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调整、补充东北党委会，任党委书记，委员由张寿箴、宋明、冯仲云、王效明、王明贵、彭施鲁、王一知等13人组成，设立东北11个地区委员会。中共东北党委会将设在长春负责

领导全东北工作。

8月8日 鉴于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命令已派到苏军中的抗日联军战士以及潜往东北的三批小队人员，配合苏军英勇杀敌，其余抗日联军战士整装待发。

9日8时 在八十八旅驻地主持召开准备反攻的动员大会。会上首先宣布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并作了消灭日寇关东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做好两手准备，具体方针是：占领城镇，迎接八路军，会师东北。如果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抢占了东北，抗联部队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最后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并告诫全体抗联指战员回国后，要和党中央保持一个步调，服从分配，听从指挥，树立为革命作马伏都可以的思想。

当夜，草拟政治、组织、行动三个备忘录，油印成卡，严格要求大家言行一致，每个人都要放在左上衣的口袋中。为了斗争的需要每个人又另起了一个名字，他改为黄绍元，张寿箴改为李兆麟，王一知改名为佟新。

11日 苏方派一艘内河军舰准备接抗日联军的后续部队返回中国参加战斗。

12日 部队正待集合登程起航时，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打来的电报。电文是：“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17日 在抗联军事会议上宣布：抗联指战员分为57个战斗队和接收小组，配合苏军占领东北各地，各小组负责

人都将被授以副司令官之职。此议已经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

中旬 苏远东战线总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转告了中苏条约基本内容。并告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将到莫斯科参加谈判并签订中苏条约。

收到苏联转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的俄文稿，立即译成中文，将其作为对部队进行教育的基本教材。

主持召开党委会，就当时苏联胜利占领东北而引起的苏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及我国内部状况的骤变，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当前的斗争方针，即抗日联军的第二套方针，内容是抢在国民党之前占领东北57座大中小城市，重建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发展人民武装，迎接八路军，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

下旬 抗联指战员500多人组成的各小组，分别随苏军驻进以长春为中心的沈阳、哈尔滨、吉林、四平、牡丹江、佳木斯、延吉、齐齐哈尔、大连、北安等辽吉黑三省大中小57座城市，并依靠党在当地的组织控制了各地一个或几个县。

9月8日 乘飞机抵达长春机场，当日住进长春“大和旅馆”。旋即以苏联红军长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身份，展开工作。

9日 与苏联远东战线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会见，华西列夫斯基答应帮助扩军和支援武器的要求。并说：“中苏友好条约”没有规定将战利品交国民党，所以我只能交给

他（国民党）武器库房，交给他长春市、东北三省。“战利品，我们分用，我立即通知苏军把守武器库房的负责人，只要见到你批的条子，立即帮你们送”。对这位老朋友表示感谢并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抗击日军14年并且参加了反攻东北的作战。在苏军的帮助下，抗联指战员以卫戍副司令的职权控制着整个东北，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所获得的抗战胜利果实，接受日本投降的敌伪武装，理应归于人民，这是不违背中苏友好条约任何一条条款的。”

10日 收到随苏军进驻沈阳的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沈阳卫戍副司令冯仲云的来电。电报说：“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于是立即前去找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求助飞机去延安，向中央汇报东北情况。同时命令进驻电台的王一知等，迅速报道八路军出关的消息，广播鼓舞斗志的评论文章，宣传我党中央的英明伟大，突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号召人民紧跟共产党，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为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13日 将一封长信通过苏军卫斯列夫大校（曾在原抗联教导旅任职）转给进驻沈阳的八路军代表曾克林，再经曾克林转交中共中央。他还委托卫斯列夫向曾转达了苏联远东战线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意见。

14日上午 曾克林等乘机前往延安。向党中央代主席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汇报。中共中央依据全国战场和东北形势，适时而准确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并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

18日 彭真、陈云、伍修权等接到沈阳卫戍区副司令冯仲云电后，18位中央领导乘飞机抵达沈阳。

20—23日 乘火车赴沈阳，用两个昼夜的时间向东北局领导同志汇报了随苏军进驻东北的过程和目前各项紧迫任务。彭真和陈云对东北抗日联军坚持14年的抗日斗争业绩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提出要利用抗日联军穿苏军制服的有利条件，控制铁路交通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抓紧在已控制城市中的各项工作。具体要求是：（一）收缴敌伪武装，加紧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孤立敌人，彻底镇压汉奸、敌特分子。（二）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把东北变成巩固的根据地。（三）迅猛发展武装，积极收集资财，准备武装保卫根据地。（四）在接管城市后，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

下旬 通过不同方式向由抗联指战员担任的东北57座城市的卫戍副司令，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精神。要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大力进行巩固后方扩充军队等工作。

8月上旬至10月底 我山东主力部队51000余人、新四军黄克诚部32000余人，加上从其他解放区调出的部队共近10万人；还有从延安、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和华中等地派到东北的干部共2万余人，共12万人陆续抵达东北。要求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尽一切努力，排除任何困难，为各路大军准备武器装备与其他军需物资。还对中央领导的起居、行动亲自安排，并要求有关人员在当时土

匪如毛，国民党暗杀成风的混乱情况下，要用生命和智慧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

10月上旬 以原抗日联军为基础，组成了一支48500余人的自卫队，分散在开鲁、牡丹江、合江、吉林四个省的广大区域。亲任自卫军司令员。

8日 接冯仲云电，告知陈云于10号到长春。当晚即派两名苏军和抗联人员张红旗前去沈阳迎接陈云。

10日 陈云到达长春。腾出自己的住处——大仓洋纸株式会社楼上住房（现长春市重庆路新华书店）为陈云居住。为保证陈云的安全，安排自己的警卫在那里守卫。

11日 陈云找谈话，传达了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和部署。谈话中向陈云汇报了有关事宜。

20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亲自将抗日联军的党组织关系和全部档案交东北局。

中旬 要求各地由抗日联军指战员担任卫戍区副司令的积极配合中央派来的干部，同时积极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

27日 迎接由延安赶赴长春的袁任远等大批干部。

31日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自任第三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

中旬 在长春二商店附近，遭国民党特务袭击，李绍纲等警卫人员还击并安全脱险。

11月19日 根据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长春市，率辽吉边区司令部和驻守部队仓促撤出长春。

派乔邦信、张红旗等送杨靖宇烈士的遗骨到哈尔滨转交李兆麟安放。

下旬 主持在拉拉屯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决定，和广占城镇和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调保卫长春的万毅部队回磐石、海龙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后方。

调长春、吉林两地武装部队，到舒兰、五常及松花江一带消灭土匪。

12月13日 在国民党委任赵君迈为长春市长后，仍然以苏联红军长春市卫戍副司令的职务发布各种命令，所以长春在苏军撤走之前，实际上控制在共产党手里。

下旬 出席在永吉县岔路河召开的吉林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主席。

1945年底 派王一知去苏联接回留在苏联原抗日联军指战员的家属子女及伤病员。

1946年 44岁

1月5日 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任副司令员并兼东满军区（即吉林军区）司令员。

10日 国共达成停战协定，但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东北不包括在协定之内。

17日 在岔路河会议上，依据东满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划分四块根据地，形成背靠延吉，坐稳蛟河、敦化，

打出桦甸、磐石和榆树、舒兰两个拳头的提案，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会将会议决定报东北局。并写信给永吉地区的袁任远、王效明，及延吉地区的雍文涛、姜信泰等，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要求他们执行。

22日 以原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的名义，对记者发表谈话，在回顾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抗战的历史后指出：“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抗战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与华北八路军用血肉换来的胜利。”这次谈话在击破蒋介石抢占东北抗战胜利果实阴谋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下旬 为建立巩固的大后方，策应南满和北满的战局，派大批干部到延吉。并派王一知赴延吉与原抗联将领姜信泰联系，王于途中被国民党驻军刘化一部扣压遇险，后经苏联红军出面要人始获脱险。

月底 国民党反动派调到东北的兵力达20万人。

3月初 随辽吉军区司令部，由长春撤到磐石。经东北局决定参加了吉东省政治协商会临时参议会，进行了讲演，宣传我党和平、民主统一的方针。

9日 原抗联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水道街9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亲自出面以35位原东北抗日联军将领联名通电全国，公开揭露国民党杀害李兆麟将军的罪行。

中旬 主持召开城防工作会议，有秩序地组织接收原伪政权人员，接收铁路银行、报社、公安局、工厂、商店和电影制片厂。大力维护治安、稳定市民生活，逐步打开

了工作局面。

下旬 东北局指出：“必须于苏军撤退时，火速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市……此举关系到东北及中国革命的前途。”

因患痢疾，常在担架和汽车中指挥剿匪和领导根据地建设。

31日 被任命为民主联军攻击长春总指挥。

月底 在磐石主持召开省委会，研究和部署攻打长春诸问题。

4月初 在卡伦镇召集各参战负责人举行军事会议。

11日 主持制定《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下达要在预定48小时以内全部占领长春的军事命令。

派于保合与苏军驻东北总部联系，要求苏军提前通知撤出时间，苏军答应了这个要求。

14日 中午12时于保合收到苏军撤出长春的电讯，于立即报告参谋长。

15日凌晨5时 下达攻城命令，以杨国夫为司令，刘其仁为政委，率西南纵队，从西南方面进攻，以曹里怀为司令，谭甫仁为政委，率领东北纵队，从北和东北方面进攻。以贺庆积为司令，邓飞为政委率领的东南纵队，从东南方面进攻。

16日上午 深入前沿阵地指挥作战。

17日 趁盘踞长春姜鹏飞部防御体系被打乱之机，下令各部趁势猛攻，逼进大同广场，直捣敌总指挥部。

18日 指挥各纵队摆开品字之势对敌设在前伪满中央

银行的总指挥部形成钳攻之势。李绍纲率一个警卫排，将国民党特务张庆和逮捕枪毙，清除了内部隐患。同意曹里怀使用坦克攻克敌人最后防线的请求。再次命令包围工厂和电影制片厂的部队，消灭敌人，保护工厂设施。由朝鲜族组成的71团全部牺牲在大同广场前沿，跟随他抗战多年的老游击队员朴洛权团长壮烈牺牲。东南纵队正副司令员贺庆积、黄思平负重伤。同时命田方、许珂、钱筱璋等同志接管“满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歼敌姜鹏飞部及其他敌军20000余人，长春解放。

五月中旬 东北局由梅河口经长春迁到哈尔滨。

19日 国民党军进占四平并继续北进，我军根据党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指示精神，决定撤出长春。

下旬 撤退路上，在撤中有打和只撤不打的问题上和林彪发生分歧。

30日 指挥部队于老爷岭一带堵击国民党新七军三十八师和六十军的二个团。

6月初 派原抗日联军老游击队员姜焕舟赴朝鲜求助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允许被国民党追击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朝鲜境内转道进入解放区。一八四师得到朝鲜人民的帮助脱离险境。

6月7日—10日 指挥部队于新站、拉法地区配合主力反击国民党军夺回了新站、拉法。

下旬 一八四师乘火车通过南阳大桥，胜利回到吉辽解放区，与李立三等接见了这一支来自他的家乡云南的起义官兵。

6月底 七道江会议后，按照陈云同志提出的“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资运输燃眉之急”指示，派王一知作为秘密外交使节赴朝鲜再向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求助，朝方允许我借道运输。

8月7日 赴哈尔滨参加东北各省代表会议，东北最高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被选为委员。

11月 合江军区剿匪部队生擒被国民党委任为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匪首谢文东。

7月—12月 率部转战于吉林地区。

1947年 45岁

1月—4月 吉林军区司令部设在延吉。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率吉林军区部队，在延吉北部和南部地区，积极与敌人作战，配合北满部队，策应南满部队，威胁敌人侧背，并一直切断了吉林至海龙间的铁路交通。

5月13日—6月13日 在我军发动的强大夏季攻势战役中，亲临前线指挥吉林军区各部配合民主联军主力，先后解放九台、德惠等地，并在新解放区大力发展群众，动员人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8月10日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消灭国民党部队10万人。

9月18日 为“九·一八”16周年纪念日，特为新华社撰文。

10月15日 为配合我军开展的秋季攻势，向部队作党史军史方面的报告，进行战前思想教育。

1948年 46岁

1月1日 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原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受命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2月9日 我军解放吉林，下令机要科给驻在岔路河的一个纵队发报，命令他们将从吉林撤退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歼灭，俘获之敌押送吉林。部队随即与敌六十军在绥河一带发生激战。

11日 将司令部设于吉林南马路（现吉林市医学院内）。

15日 于吉林参加东北军区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攻打长春改为“久困长围”。

25日 向吉林军区参加围困长春任务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8月 向林彪建议：在围困长春确有胜利把握的前提下，是否改变内不许出，外不许进的方针，放出已饿得奄奄一息的老百姓。亲自过问逃出来的群众的安置工作，如长春大学张德馨教授，就是在他的关心下，安排到吉林大学工作的。

10月上旬 为防止国民党炸毁小丰满水电站，亲临现场指挥部署。

11月1日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

番号的规定》，吉林军区被改为省委军事部。从此专任吉林省政府主席。

12月 东北全境解放，他所领导过的吉林军区所有部队，全部补充到主力兵团，随军南下，省政府于吉林迁到长春。同时组织抢运粮食到长春救济群众。

1949年 47岁

1月 主持制定吉林省《关于新区土改工作的补充指示》，并制定了“新区土改计划”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选建政工作指示”。

2月4日 参加吉林省民族工作座谈会。

4月 学习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5月 应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邀请，赴朝休养。

6月 回到长春。

8月 奉中央命令到达北平，参加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

上旬 向朱德总司令提出，到军事学院学习的要求。

中旬 受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抗联的斗争说：“东北14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9月下旬 拜望了北伐战争时期的老领导林伯渠。

10月1日 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

年底 调往云南工作。

1950年 48岁

2月6日 与陈赓、宋任穷一起于贵州安龙会见坚持云南武装斗争的我党武装滇、桂、黔边纵队的领导人。

14日 离开安龙直往昆明。

20日 到达昆明。

3月4日 《云南省军政委员会第一号公告》颁布。内称：“任命卢汉为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宋任穷和周保中为副主任。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赓，周保中为正副主任。”

10日 经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3次政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4月 在云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昆明接管工作和今后施政方针的报告。

4月—12月 主持政权接管，镇压反革命、剿匪，整顿税收、回收银元、打击投机买卖，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紧缩开支广开财源等各项工作。

1951年 49岁

3月 为《云南日报》创刊一周年题词：“加强报导，适应发展”。同月，到云南保山专区检查镇反工作。

4月初 参加云南省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5月 在昆明各界人民庆祝“五·一”游行大会上讲话。

8月1日 在省各族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2日 出席云南民族学院的开学典礼，勉励学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0月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大会上讲话。

12月 在云南省首届妇女代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在云南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21日—26日 云南滇西丽江、剑川等县两次发生强烈地震，立即组织震灾救济委员会，亲赶赴灾区，领导救灾工作。

1952年 50岁

1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毒洗干净！”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指示。

月初 从灾区返昆明，途中看望了阔别27年的家乡湾桥村。

9日 在昆明市工商界召开的2万余人的动员大会

上，号召工商界开展反浪费、反行贿、反贪污的斗争。

2月1日 在省市两级机关工作人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责成各系统、各部门选择重点围攻老虎，实行包查包打》报告。

2月 在省市各界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代表团的晚会上讲话。

3月 店员杨光顾等人积极检举不法商人，亲自复信嘉勉。同月，在出席一次会议讲话时，心脏病复发。

7月 亲临防洪前线领导防洪20多天。

9月15日 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个人鉴定，进行自我检查。

30日 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三年来云南建设事业进展情况》文章。

同月 兼任云南大学校长。此间，重视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疾苦，听取他们的意见，经常请云大校委会全体人员到他家里作客，畅谈办好云大的设想与意见。如经济学教授秦瓚，物理学教授孙永立等都受过他的邀请。还及时纠正了民族学院为搞“三反”、“五反”运动而影响各民族学员学习的不良倾向。

1950年—1952年 任中共西南局委员。

1953年 51岁

3月 心脏病再次复发，于重庆入医院检查，发现他还患有严重的胆结石等病。

上旬 于贵州花溪养病。

下旬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给周恩来总理打电报报告周保中的病情。

月底 在贵州花溪被周恩来派飞机接进北京治病。周恩来特别嘱咐有关人员要派有床位的专机，保证周保中的安全。到京后，旋即住进北京医院。

5月初 在北京医院受到周恩来总理看望。

1952年—1953年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

1954年 52岁

夏 病情严重。

9月 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月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53岁

撰写东北抗日联军史稿20多万字。由他口述其他同志整理的史料也有50万字。还为题为《一个普通人的回忆》的自传，草拟了300多个小题目的题纲。

同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委。

1956年 54岁

9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7年 55岁

长期养病。

1958年 56岁

对“三面红旗”提出意见并对国家境况表示忧虑。

1959年 57岁

4月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常务委员。

12月28日 向来访人员回忆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历史。

1960年 58岁

5月 和来访人员谈关于东北党组织路线问题、民生团问题和赵尚志问题。

9月 和来访人员谈民生团和中朝关系问题，东北地区的特点和东北党史的分期问题（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一），朝鲜祖国光复会和东北党组织的路线问题（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二），土龙山事件、联军总司令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抗联后期的斗争情况（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三）等。并和来访人员谈了东北14年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评价和教训（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四）。

同年 撰写《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少年英雄姜墨林》等文。

病情渐趋严重。

1961年 59岁

2月 和来访人员谈牡丹江党组织发展情况。

同月 为自己的国际战友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稿同志和他的夫人写了12行诗，表达对朝鲜战友的友好感情。

6月 贺革命老人何香凝80寿辰赋诗一首：

大仁大勇苦坚持，
革命肩挑一代师。
建设艰巨犹奋斗，
长寿愿回壮年时。

1962年 60岁

11月10日 和来访人员谈关于抗联五军的建立和“平南洋”部队性质问题。

1963年 61岁

秋 病情恶化，强撑病体又给好友杨茂才一封信。信中写道：“……回想往日，故乡山水情意深重，游登西山而目击滇池，游洱海而遥望苍山，不知何日能重见矣！”表达了对美丽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

1964年 62岁

2月12日 病逝于北京。

抗战时期中共人员在阿克苏区的情况

中共新疆阿克苏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盛世才的邀请，于1938年派出大批干部来新疆工作。

当时分配到阿克苏区工作的有：

黄火青（黄民孚）1939年5月5日调任阿克苏区行政长，1940年8月回迪化，9月回延安。

林基路（林为梁）1939年1月16日任阿克苏区教育局长，1939年5月19日任库车县长，1941年9月回迪化述职。1942年1月11日至5月任乌什县县长。

陈清源（陈浩然）1939年3月任新疆日报社阿克苏分社编辑，同年9月2日任编辑长，1941年4月4日任副社长、代社长。1942年2月调喀什。

蒋连穆（蒋春茂）1939年1月任库、沙、拜、轮、托地方税局^①副局长，1942年1月10日调焉耆区任财政局副局长。

程九柯（陈九柯）1939年1月至1940年夏季任阿、温、瓦、柯地方税局^②副局长，1941年9月6日任阿克苏区财政局副局长。1942年6月14日调离阿克苏。

① 库、沙、拜、轮、托地方税局：即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新和）地方税局，简称库车地方税局。

② 阿、温、瓦、柯地方税局：即阿克苏、温宿、阿瓦提、柯坪地方税局，简称阿克苏地方税局。1941年后改为阿克苏区财政局。

钱萍（钱春申）1940年夏季任阿克苏区财政局副局长，1941年9月6日调离阿克苏。

郝冰清（郝升）1942年1月6日由焉耆区财政局调任拜城县税局局长，1942年6月21日调离拜城。

高登榜（高玉成）1942年5月21日从喀什区财政局调任沙雅县税局局长，1942年5月28日任沙雅县政务委员会委员，1942年11月16日去职。

陈茵素（陈文瑛），女，林基路夫人。1939年9月，由延安至迪化，10月至库车，任库车县小学教师兼县妇女会主任。1942年1月随林基路至乌什，任小学教师，1942年5月至迪化。

苏枚（黄颐），女，黄火青夫人。1937年11月从莫斯科来新疆，在迪化市任省立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兼教师。1939年5月随黄火青由迪化至阿克苏，任阿克苏简易师范附属小学教师。1940年8月去职回迪化，9月回延安。

自1933年“四、一二”政变，盛世才执掌了新疆政权，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制定和推行了进步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并将它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施政纲领，这在当时来说，是符合抗战需要和新疆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精神的。因此，我党赞成其“六大政策”，与盛世才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疆成了中外联系的交通要道，当时苏联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有许多是通过新疆这条交通线运往抗日前线的。这就需要加强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以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团结各族人民，促进中苏友好，增强抗战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黄火青、林基路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其他来新疆工作的中共人员一样，深深懂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他们不顾盛世才当时对我

党态度出现的变化，不怕盛世才对于共产党人的猜忌、排斥，毅然到阿克苏赴任。

这批中共人员到阿克苏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按照党的要求，广泛接触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深入青年之中，以身作则，认真执行“六大政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发展生产，整理财政，改善交通，兴办学校，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努力建设新疆，巩固祖国抗日后方，为维护国际交通运输线，支援抗日前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宣传抗日，传播马列主义

黄火青、林基路等中共人员在阿克苏区经常利用“七七”、“九一八”等纪念日，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如作抗日时事报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贴抗日标语口号，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中国不会亡，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宣传抗日持久战，树立抗日信心，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动员各民族抗战。

1939年7月7日，各县都遵照黄火青的训令，召开了“七七”两周年纪念会，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沙雅、乌什、拜城等县都向黄行政长电呈了宣传情形。

1939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八周年，黄火青行政长发出第483号训令，通令各县举行纪念大会。训令称：“‘九一八’为中华民族之国耻纪念日，东北沦亡，迄今八载，极应扩大纪念，广泛宣传，以便唤起国民，同仇敌忾。所有今年纪念日之宣传大纲，除已由反帝总会分发应用外，仰各遵照隆重举行，以广宣传而志纪念”。并要求各县将纪念情形上报。

届时，黄火青行政长率先在阿克苏城召开了3000人的“九一

八”纪念大会，亲自作了恳切的纪念报告，通过了大会决议，举行了4000人的游行示威。

各县也都遵照训令，开了人会，作了隆重的纪念。阿瓦提县长王文述专门给黄火青发了代电，汇报大会情形。代电称：自“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八载于兹，因不抵抗主义者退让之结果，致使我锦绣河山及3500万同胞沦陷于万恶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蹂躏之下。追怀往昔，五衷欲裂。兹值“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来临之际，职县为扩大纪念，广泛宣传，以便唤起国民同仇敌忾之起见，特于是日早十时召集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以及四乡阿訇^①、乡约头目人等，共约2000余人，开纪念“九一八”八周年纪念大会。宣传材料及标语口号均取材于反帝总会印发之宣传大纲，在继续开会六个钟头之过程中，情绪极为紧张。不但无紊乱及退席情形，而且逐渐增加，迨至最后即有3000余人。秩序井然，恭聆演词，且激昂愤恨之色流露于外，是足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巩固，与“六大政策”深入广大民众脑海胜利之结果。

报社代社长陈清源、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小学教师苏枚等都曾进行过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国共合作歌》等。程九柯在温宿还亲自编演抗日剧目，扮演角色，宣传效果动人。

林基路在库车宣传抗日救亡，轰轰烈烈，有声有色。1940年“七七”抗战纪念日，库车城内分三处宣传抗日，维文会、汉文会、汉回学校前面，晚上搭台演戏，张灯结彩。林基路登台

^① 阿訇：波斯文AKhund的音译，原意为“教师”。在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中，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在中国，是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的通称，一般主持清真寺教务和为满拉教经，而其中担任教坊的最高宗教首领和“经文大学”教师的阿訇，称作“教长阿訇”、“开学阿訇”。

讲演，宣传抗战形势。还叫教育科长曹廷玺用木板制作一个一米见方的中国地图，从黄河处锯开，以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祖国河山，越过黄河，快到西北了。陈茵素亲自组织青年，演唱《黄河大合唱》，宣传抗日救国，听众为之泪下。

林基路任库车县长期间，还要学校每周开展一次抗战文艺歌咏活动。有时还组织学生宣传队，排演剧目，到水利、建桥、修路工地，为广大农牧民演出。灌输爱祖国、爱家乡、抗战救国的进步思想。还利用节假日，组织机关团体，学校师生举办诗歌朗诵会，以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

蒋连穆在库车地方税局，经常借读报机会举行时事报告会，启发职工的抗日救亡思想觉悟。学习材料除当时的《新疆日报》外，还有《新华日报》和《全民抗战》小册子等。

中共人员在阿克苏为了更好地执行“六大政策”，除了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外，还传播马列主义思想。

黄火青从迪化赴阿克苏上任，途经库车，找着蒋连穆，给他送去《新华日报》、《联共党史》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书报。1939年12月，在阿克苏开办的地区会计训练班上，黄火青亲自给学员讲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特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林基路在库车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参加人除蒋连穆、陈茵素外，还有曹廷玺、马聚奎、王书琴、刘锡寿等20余名机关青年。由林基路亲自领导，每星期五下午学习。学习内容有《辩证唯物论》、《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等。学习方法为：自学阅读，集体座谈，写出心得笔记，使参加学习的成员受益非浅。由于中共人员的宣传与影响，阿克苏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多，买进步书籍的人也多。中共人员离开后，1943年3月阿克苏行政长官署根据盛世才反动指令，仅从乌什一个县抄出来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书籍就有

543本。

为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清源于1939年4月在阿克苏，办起了阿克苏报(后改为新疆日报阿克苏版)，历任编辑、编辑长、副社长、代社长等职。开始人手少，条件艰苦，陈清源晚上抄收新闻，白天用油印机印报。编辑、采访、校对都是他一人，有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以后有三、四人又办了维文报。1941年夏，陈清源去喀什分社请王谟让给一台圆盘印刷机，招收了维族知识青年作拣字、排版和摇机工人，出了四开维文报，每期印四、五百份，发行量最大时达到一千份。铅字陈旧，印不清楚的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描，没有标题大号字，就用木头刻制。为办好报纸，还发出公函，请各县代为聘请通讯员。阿克苏汉文报分为四版，第一版为国内外消息，二、三版为地方新闻，四版为副刊。阿克苏报大量发表抗日言论，用马列主义观点解释“六大政策”。皖南事变发生时，还发表过总社消息，也曾登载过穆欣等写的通讯文章，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黄火青、林基路都曾在阿克苏报上发表过抗日宣传的文章。

为支持发展新闻事业，黄火青行政长在任职期间，还曾批准售给新疆日报社从乌什进口的铅版9500余斤。

二、充分发挥反帝会的作用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1934年8月1日在迪化市宣布成立。原是遵照“孙(中山)总理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反帝和确保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为内容开展工作的，自共产党人领导反帝会以后，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方成为一个有纲领、有领导、有计划、有力量的合理的政治集团。特别是自中共人员黄火青担任秘书长以后，通过总会事务干事会议，修改了《新疆民众反

帝联合会章程》，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支援抗日前线，巩固抗日后方的任务，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等新内容。并规定反帝会员必须坚决执行“六大政策”，遵守政府一切法令，在日常生活中，在实际工作中，要在群众中间起影响与领导作用。

关于反帝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1938年10月13日，黄火青在反帝总会，新疆民众联合总会联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作了阐述。他说“反帝会是新疆民众自动的群众性的政治团体，但新疆没有党的组织，为使全省各种民众团体活动有一致目的，所以它对于其他群众团体具有政治指导和帮助的责任。因为它直接在督办、主席领导下，包括有各族各界的先进分子，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反帝会的宗旨是：“团结反帝群众，进行扩大反帝宣传，拥护‘六大政策’，彻底解放中国”。反帝会的总任务是：“在巩固全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总的任务下，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线，组织和训练广大民众尽一切可能援助前线胜利。为达到这个任务的完成，必须彻底执行‘六大政策’，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主生活。”

黄火青在报告中还倡议在新疆开展一个募集寒衣的运动。他说：“现在天气渐冷，前线抗日战士要在冰天雪地与鬼子拚命，我后方民众应知道前线战士之辛苦，并使战士身上得到温暖，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安慰与愉快，我们居在安全后方，应当集中财力极大援助前线”。从此，在全疆掀起了抗日募捐高潮，领导募集寒衣运动。向全疆各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作出了贡献。

阿克苏区各县于1937年12月以后，建立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分会。如1937年12月26日阿瓦提县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分会。该县分会下设总务组、宣传组、保管组，会长由县长担

任。1938年1月4日拜城县也依法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分会。同年4月12日沙雅县也相继成立。

反帝会在阿克苏区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募集抗日捐款；二是进行抗日宣传。抗日捐款是由民众抗日救国后援分会进行的，抗日宣传则是以反帝会的名义进行的。这两项活动是由行政长、各县县长以训令、通令指挥下进行的。

抗日捐款从援绥(远)捐款开始，1938年至1939年，特别是黄火青、林基路、陈清源等到阿克苏任职后达到高潮，直到1942年，连绵不断。阿克苏区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广大妇女、机关公务人员，爱国热忱高涨，踊跃捐献。

1940年4月28日，新疆日报报导：阿克苏商民郝会武慷慨救国大洋百元，阿瓦提县张福堂捐款48元。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拜城县捐省银票210余万两。林基路领导库车募捐有力，每次总的成绩在阿克苏区都名列前茅。蒋连穆所在的库车地方税局。也是库车县抗日募捐成绩突出的单位。

在进行抗日宣传中中共人员重视发挥反帝会的作用。在阿克苏召集的各族各界纪念大会，军民联欢晚会，电影晚会，文艺晚会，都是通过反帝会组织出现。每个时期的宣传大纲，张贴的抗日标语口号也是以反帝会的名义出现的。当时在阿克苏有孙庆麟的一个骑兵团，大都是东北人，官兵抗日情绪激昂。反帝会经常组织他们和民众联欢，表演话剧，组织歌咏比赛。每当纪念“七七”、“九一八”纪念日，则大唱抗日救亡歌曲，抗日宣传如火如荼。中共人员发挥了反帝会的作用，激发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入人心。

三、发展生产，进行各项建设

中共人员在阿克苏十分重视发展该区的水利、交通和农牧

业生产。依据当地各县实际，结合省政府的法令，提出了许多正确和颇有见地的措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备了施行方针和具体办法。

到阿克苏任职的中共人员，对农业、水利、交通各项建设抓得很紧。1939年6月9日，黄火青为发展当年生产，发出第53号训令，将春耕贷款12500元，贷给阿克苏、温宿、阿瓦提、柯坪四县农民。要求各县长将此农贷一定贷到农户手中，而且要出据证明是用于农业生产。当年的水利建设成绩可观，据青海正闻社1939年12月报导：阿克苏区库车、沙雅、拜城、温宿、乌什、柯坪六县合计，共疏旧渠567条，其中干渠138条。新渠开辟方面，1939年有沙雅县卡牙河之支渠；温宿县雅尔巴什地方之渠。尤其是阿克苏县由柯柯巴什村之多浪渠引水经多思纺村、博子氏可村，通往去沙雅小路，共长124里，渠宽六尺，深六尺。此渠之成对阿克苏经济生活影响很大。这些新旧水渠的建设，对当地农业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年底，为了解阿克苏全区各项情况，制定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纲，发至各县，让各县长总结上报，从而掌握了全区各项基本情况，以便在1940年农牧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上，果断地采取有效的实际措施。

1940年2月15日，在春耕生产即将来临之际，阿克苏区不失时机地开展了一次春耕生产宣传运动。制定了详细的宣传要点和实施办法。大致为：及时耕种，以利农时；选用良种，减少病害；使用农机，节省劳力；多种棉花，以供纺织；广植树林，保持水土；整修水渠，以利灌溉；多开荒地，而裕收获。并以第1111号训令颁发各县，严令执行。责令各县长、乡长及时召开农户参加的村民大会，传达讨论，订出春耕生产计划。各县还要将水利建设、播种面积、植树数量、以及需要种贷、农贷之数量汇总呈文上报。从而在全区掀起了备耕高潮。

1940年2月7日，以王宝乾（即赵实）为委员长的新疆省政府南疆视察委员会^①来阿克苏区视察工作，黄火青被公推为副委员长，随同该会对各县生产建设提出了许多措施。如3月8日南疆视委会以建字第28号训令，对乌什县生产建设提出：“查该县可耕未垦荒地颇多，应领导民众扩大垦荒工作”；视委会同一时期，又以建字第23号训令，对温宿县提出八条建设意见：“（一）调查该县所产石油、石膏、食盐、炭、铁各矿面积、产量；（二）该县可垦荒地颇多，水利又特别充分。应垦荒开渠，扩大水利和耕种面积；（三）设立屠宰场，防止屠宰病畜；（四）该县土壤气候适宜植棉，应领导民众扩大种植，增加农民收入；（五）扩大种植桑树，以增加民众生产收入；（六）迅速成立农会；（七）调查森林情况，予以妥善保护，以为建设用材；（八）调查农牧业生产基本情况”。

这些措施和建议非常适合阿克苏水利资源丰富，土地广阔，气候适宜棉桑种植的特点，是当时发展阿克苏区农牧业生产的有力措施。视委会在视察了各县之后，于3月27日在《新疆日报》上公布南疆视委会关于改善阿克苏区人民经济文化生活的具体实施办法，大致有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经济方面：

将阿克苏区官有土地及逆产^②（无论旧有或新开）售给或租给民众，出租期不得少于5年，出租或出售应尽先售给或租给直接从事农业者或无土地的农民，但租户不得将土地转租他

^① 南疆视察委员会，简称视委会。新疆盛世才政府于1939年12月13日组成南疆视察委员会，委员长王宝乾，副委员长芦毓麟，一行170余人，内有技术专家和政干班学员，遇有应兴应革事项，可以随时解决。行至阿克苏，黄火青行政长亦为视委会副委员长。

^② 盛世才统治时期，没收罪犯之财产称逆产。而罪犯之一部分，确系各种犯罪之人；另一部分则系盛世才制造阴谋暴动案，预谋陷害之人，以及其他冤狱者。这些无辜冤狱者被没收之财产，亦被称作逆产。

人；官地之地价与租金，应由行政长官根据土地之现状，按市价减低25%至40%；购买土地之地价可于3年还清，地价或租金付新币或粮食均可。

各县县长应会同农会查明各县可耕开荒之数目，拨给无土地之农民，以便开垦。此项土地开渠引水由银行贷款，给2年期限无息贷款。所有在1940年1月以后开垦之土地，3年内免征田赋。

1940年内经阿克苏分银行贷给库车、沙雅、拜城、托克苏（即新和）四县土地水利贷款5000元，限期3年归还，不收利息。1940年内，必须完成修理帕什他什水堤。拨小麦1000石。此水堤筑成后，温宿县应展宽多浪、丛扬吉两渠，以开垦该县西南部荒地；阿克苏县应完成巴里当处阿克苏老大河，并展宽伯什杜满及哈拉塔各渠，以开垦以南之土地；阿瓦提县应展宽古得国姓渠，以便将阿克苏老大河冬日之水放入杨吉阿克苏；柯坪县应将卡拉汗官渠展宽，并延长至齐兰村，由政府无息贷给小麦300石，以供修渠之用。

为发展当年农业生产，各县分给一年无息贷款数目如下：阿克苏1000石，温宿1000石，乌什800石，阿瓦提400石，拜城1000石，库车1000石，沙雅600石，托克苏（即新和）400石，柯坪700石，共贷小麦6900石。

第二，关于公路桥梁方面：

为修建阿克苏区公路，由政府拨给修建阿克苏至喀什道路小麦70石；阿克苏至阿瓦提道路小麦50石；乌什至国界道路小麦500石；阿克苏至库车道路小麦500石。

第三，关于保健方面：

阿克苏医院每月看病有三、四百人之多，但内部医疗设备均未完备，必须加以扩建修理，拨小麦1500石作为医院建修之用。

第四，关于发展工业方面：

奖励手工业之发展，如毡、毯、口袋、大布等。对煤矿及其他矿产的开采，予以大量援助。为援助阿克苏区手工业之发展，于1940年内贷款10000元，阿克苏与库车两分行各贷5000元。凡属自力经营不雇佣劳动力之手工业者免征牌照税。为开采柯坪煤矿，政府拨大洋300元，作官商合办之官股。

为发展商业，阿克苏区成立土产公司。

第五，关于文化教育方面：

为修理阿克苏区各县小学校舍及添置桌凳，由政府拨给：阿克苏、温宿两县各大洋400元；柯坪1500元；库车、沙雅、托克苏（即新和）三县各300元；阿瓦提县小麦100石；乌什小麦100石。

补助阿克苏修建俱乐部大洋2000元，补助柯坪修建俱乐部300元，补助阿瓦提小麦70石。拨给阿克苏县阿衣古力村小学添置桌凳大洋100元。

1940年10月以后，在阿、温、拜、库四县增加高级小学各一个班。在阿克苏区教育局增加督学一名。

1940年内由政府与阿克苏区各族文化会共同购活动电影机一架。

第六，为改善游牧民族生活，对乌什牧民柯族民众定下列办法：

乌什县雅满苏荒地300亩，本年内会同柯文会分配给自愿耕种之柯族。由柯文会和乌什县长于本年3月，查清愿耕种土地之柯族，拨给政府官地，并供应充足之水量。

为修理雅满苏水渠由银行借给水利贷款500元，限期一年归还。为平定乌什物价，除飭令县长设法外，由政府存粮项下，按市价低5%售给需粮之民众。

第七，其他：

1940年5月，成立库车县司法处；拨大洋400元，修理柯坪税局房屋；修理监狱，改善监犯生活；拨阿瓦提县救济院小麦20石。

为使这项带有全局性的阿克苏区改善经济文化实施办法迅速贯彻执行，黄火青行政长分清先后缓急，发出了一系列的通令、训令，给人民生产以切实地支持，并责令各县县长认真办理。

1940年3月2日，给乌什拨春耕贷款小麦800石。

1940年3月31日发出第1334号通令，明确宣布，今后开垦荒地三年免征田赋，三年以后再行开科纳粮。要各县长给开荒人填发垦荒凭单，以安民心。

1940年4月27日，又发出第1305号通令，要求各县速将逆产土地和官地售给或租给无地可耕之人民，以利扩大春耕。为保障人民生活，还要求各县速将逆产粮食出售，以平抑市价。

1940年5月2日，召开了阿克苏区各机关首领和阿克苏、温宿两县长会议，将5000元水利贷款，分至阿克苏2000元，温宿2000元，乌什500元，阿瓦提500元，以促进水利建设。

1940年6月3日，为解决库车、沙雅、托克苏（新和）三县长期存在的水利纠纷，召开三县有关人员会议，每县派出15名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了三县水利纠纷解决委员会，黄火青兼委员长。提出了解决水利纠纷的治本和治标多项办法，形成了决议。责令三县切实执行，不得意气用事，节外生枝，形成不幸事件。其治标办法主要是分水公允，互相监督；其治本办法则要求沙雅开挖叶尔羌河（即塔里木河）新渠，以补渭干河水源之不足。并决定库车、托克苏（新和）两县在六月中给沙雅让水十天。

由于阿克苏区行政长的坚强领导，终将当年春耕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推向高潮，特别是水利建设进展迅速。

对于阿克苏区的公路交通，中共人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自始至终抓得很紧。阿克苏干线公路是迪化至喀什公路的中心地段，畅通与否，关系南疆二期三年建设计划的成败。为使迪喀公路在阿克苏区早日畅通，1939年7月8日成立了阿克苏区筑路委员会，黄火青兼委员长，训令各县成立相应的筑路委员会，抓好筑路修桥工作。当年就取得了实际的进展。据萨空了1940年元月在《反帝战线》上报导，1939年7月至10月，在拜城修建大桥一座。此外，柯坪县民众还捐钱修公路160余里，以便与喀什公路相接。1939年冬，黄责令各县务于11月20日前后，将筑路民工开赴施工地段，紧急施工，以加快干线公路的筑路速度。为保持筑路民工身体健壮，同年12月7日发出第812号训令，要求各县县长注意筑路民工之膳宿。务使民工每日能食热饭开水，夜间能住民房、帐棚或蒙古包，保证其身体健康。此外，还于1940年3月至4月，以代电训令要阿克苏地方税局拨小麦1000石修建桥梁；要库车地方税局拨小麦500石修筑库车至阿克苏公路。由于各县民众积极努力，终于使八米宽的喀迪公路展现在阿克苏的地段上。1940年3月2日，拨小麦500石，作修建阿克苏至乌什国界哈拉湖公路之用，由于此路通向乌什边界，关系中苏贸易，乌什县长肖瞻泽负责，很快便动工修筑。肖瞻泽卸任后，林基路任乌什县长，虽然只有五个月时间，却亲自带领宣传队，拉着大米、清油、牛肉等食品，去中苏通商地点哈拉湖公路施工段，慰问筑路民工。维护了国际交通，保证了中苏贸易的正常进行。

对城镇建设亦很重视，1939年阿克苏城镇人口不过10000。几条主要街道弯弯曲曲，笆子泥屋破破烂烂。1940年春，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把阿克苏的一条东西街和一条北街，下令拆除笆子房，街道修直，用土块把两旁的房屋修起门面。发动机关公务员和学生、居民在街道两旁植树，使面貌为之一新。

林基路县长在库车，率领群众，改造自然，兴修水利，为人民造福，深为人民所乐道。1939年库车首先修补和疏浚了旧渠，计有干渠60条，支渠108条，扩大了灌溉面积。对于洪水为灾，尤为重视。库车城东的铜厂河，每逢汛期，常淹没农田，冲毁道路，危害人民。1939年8月，铜厂河大水，冲毁了库车县城乡的很多桥梁。为化水害为水利，带人沿河实地考察，调查研究了水文资料，制订了水利工程计划，绘制了施工设计图。于1940年6月正式动工，修筑铜厂河石堤（即北山龙口大坝）。该堤分东西两段，全长3000米，底宽3.5米，高5米，顶宽1.5米，用石块、红柳砌成，全部工程于当年内完成。库车县府秘书许士杰写了新闻报导，发表在1940年6月23日的《新疆日报》上。库车人民为怀念林基路县长，称北山龙口大坝为“林基路大坝”。此外，在九区修建了波斯唐托克拉克大坝，长40余米，1939年冬开工，1940年秋完成。两座大坝的建成，发挥了防洪灌溉的作用，扩大了下游的耕地面积，使为害多年的铜厂河水患，在长时期内再未出现。

在修坝治水的同时，为便利交通，还修建了四座桥梁。于1940年上半年开始了团结新桥的建筑。

库车龟兹古渡大桥连接南疆的南北交通，位置极为重要。且在该县市街之内，行人车辆往来频繁。自1928年修建后，已历13年之久，屡经山洪冲击，桥梁倾斜，即将腐朽倒塌。遂决定重新修建，设计图纸，动员工商界及富户人家捐献，还组织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建桥委员会。工商会自愿捐出了全部工程费17000余元。邀集能工巧匠建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桥，经林基路建议，桥两头写上了“龟兹古渡，团结新桥”的题词。竣工时，还召开了新桥建成庆祝大会。

1940年春到1941年秋天，库车还建成了现在雅合乡的“进步桥”，桥名也是林基路提议命名的，桥长48米。与此同时，还建

成了通往四区、六区的“大涝坝桥”和“哈郎沟”桥，桥长都在20米以上。这几座桥梁的建成，改善和便利了库车境内及南北疆的交通运输。

同时还重视修筑公路，沟通南北交通。从1939年冬到1941年6月，不断地动员民工修筑库车到轮台的公路，当时称为迪化大道。而库车到托克苏这段公路还铺上了卵石。1940年秋，还曾组织人力，把风雨破坏了的库车飞机场，即时抢修通航。

四、整理财政、增加税收

中共人员在阿克苏对于财税工作，主要是认真贯彻执行了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毛泽民（周彬）所制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加强税收管理，堵塞偷漏和贪污中饱”以及“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收入，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和几项主要措施。即：整顿财税机构，培养财会干部；稳定物价，改革币制；健全财政预算决算制度，严格财政纪律；整顿税务，增加财税收入；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加强税收管理，贯彻税收奖惩条例；核实田亩，保证田赋收入；大力支持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等。

（一）健全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

为健全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阿克苏区行政长官从1939年7月以后，迭次发出训令，告诫下属严格执行财务纪律。7月11日发出第198号训令指出“近查公务员中有不节约者，动辄借公款数十万两之巨。自7月1日起，各级人员按级增薪，每人所得之薪响，足敷生活赡养之需，再无藉机借款之理，有向政府借款者，一概置之不理。不可预料之事，须经主管官核实现节，方可接济。但所借之款，不得超过本人月薪之一倍，而

且要按月扣除”。同年8月，以第424号训令，告诫下属，自新预算年度开始执行，任何临时费，均须事先请准，方可开支。开支之数，必须以政府核准数为依据。未经请准而挪用者以及超支者，一律不予拨款，不予补发。制止了胡乱开支临时费的倾向。1939年11月22日，又发出第776号训令，批评了各机关结存银两不肯上缴金库的错误作法。严令各机关限期一月，将未经批准动用之结存款项，迅速上缴金库。否则，以违背廉洁政策论处。这些训令的颁布，对阿克苏区各机关执行财经纪律起了保证作用，使清廉政策得到了贯彻。

(二)举办学习班，培养财会干部

1939年12月22日至1940年3月29日，在阿克苏行政长官公署举办了会计训练班。学员81人，维、回、汉族都有，男女兼收。他们大都是全区各机关的青年财会人员，学习了政府政策、社会科学、经济学、簿记学、会计学、珠算、体育、唱歌等课程。黄火青自兼班长，并亲自讲授经济学课程。学员毕业时，有70人成绩优良，获得了毕业证书。这批人材的培养，为阿克苏区整理财政，建立新式簿记，推行清廉政策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

(三)改革币制、巩固金融

为执行新疆省政府关于发行新币，兑换省票、喀票、巩固金融的决定，行政长官1939年迭次发出通知、训令、命令各县普遍宣传发行新币之意义，务使民众加深了解。柯坪县长阿木土奉行政长官1939年8月22日令，于同月28日该县巴扎日召集各机关、团体和各乡约头目人等，在县府开会，作了变更币制的宣传，后又组织宣传队分赴各乡村普遍宣传。给行政长官呈文报告说：“民众均知新币有现金银之准备，有通行全国之能力

(应为有通行全疆之能力——整理者注)。又比现金银便于携带，此可谓为民众谋利益之政策矣”。

当时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工作发行之新币，票面有十元、五元、三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三分、一分十种。新旧币兑换率为旧省票4000两（后改为6000两）兑换新币一元，喀票（喀什地区货币）160两兑换新币一元。新币的发行，统一了全疆的币制，制止了通货膨胀，对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为使此项工作，能顺利进行，1939年9月22日，发出第506号训令，要求各县“速将省、喀票对新币之折率及各项办法普遍宣传，务使民众增加了解，并设法保证实行新折率前后期间物价之平衡，严办投机造谣分子，以维币政，而固金融”。当发现有些奸商不遵守政府法令，有哄抬物价，扰乱市面时，又于1940年5月24日发出指令，要求各县“市价应按行情出售，以维民众利益，但对囤积居奇、扰乱市面者，须严加取缔”。库车和平公司经理尼牙孜囤积居奇，隐藏货物，扰乱市场。经查证确实，除没收其隐藏货物外，并以破坏市场罪，予以逮捕法办。全县商人为之震惊，市场立即趋向稳定。

(四) 验契查田、清理田赋

田赋、牧税是阿克苏财政收入之大宗。对验契查田，清理田赋在各地方法税局的中共人员均极重视。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钱萍于1940年8月20日会同有关单位，组成了验契委员会，拟了告民众书和调查表格，译成维文，交委员会进行调查与宣传。还向省财政厅写了报告。

当时验契工作的大体作法是：（1）发动群众自报耕地亩数，尤其是过去隐瞒未报的土地；（2）发动群众检举；（3）遇有地亩不符者，无论被委员会查觉或被人检举，应先晓以大义，使被告自动报告耕地亩数。若委员会认为满意，则照数目登记定

粮。否则应勘察后确定之。若说服与勘察均不足以完成上项工作时，则最后方法即为清丈，清丈后自无问题，准应填呈处理。

阿克苏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征收田赋的办法是极不合理的，田赋簿上的纳税人，绝大部分与当时实际纳税人的名字不符，而登记簿上的土地亩数、优劣程度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有的土地被淹被毁不能耕种，仍须照完田赋税，而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隐匿与扩张的土地，不纳税粮，却无人过问。田赋负担，畸轻畸重，农民叫苦不绝。

根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弊端，在温宿组织了六个验契查田小组，分赴各乡，长期吃住在农村，逐村逐户进行查田登记，从1940年秋到翌年春，善始善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给农民解决了大问题。

随着阿克苏区验契工作的进行，地亩的查清，田赋收入大增。据乌什、柯坪地方税局1940年12月2日报告，截止11月25日，该局共收额粮折色^①大洋33·1492万元；麦谷各1000京石^②；租粮折色大洋1·1841万元。

(五)加强调查，征收牧税

阿克苏区的畜牧业历来多数分散在深山草湖之中，查征牧税，很不易。对牧税调查，中共人员极为重视。阿克苏、温宿两县1941年4月26日召开第一次牧税会议，组织了牧税委员会，划分了征收小组，确定了牲畜征收价格。钱萍副局长参加会议，并作了纪录。

当时牧税查征办法大体如下：1. 组织牧税委员会，由地方

^① 折色：在赋税中，征收实物叫本色，将原征收的实物改征等价的其他实物或货币叫折色。

^② 京石：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沿用着清末征收田赋的计量单位。当时新疆通用京石，1京石等于10京斗，又等于1/3市石。1京石小麦约130斤。

有关机关各派委员共同办理；2. 聘请各村长头目为帮征人员，负责帮同考查；3. 由省府临时派员帮同办理；4. 于牧税征收之前先作一广泛宣传，并使养有牲畜者，将所养之牲畜数目，先行报明。如有隐匿，立法则以随其后。征收市价按中等市价折定。1940年度，据阿克苏各地方税局应征牧税实物代金统计，库车为74·85万元，阿克苏为43·247万元，乌什为21·29万元，全区合计为139·387万元。由于开展调查，认真征收，牧税大增。仅拜城一县1941年度即征收牧税32·0818万元，当年拜城实有牲畜286450头。

在阿克苏财税战线上的共产党人蒋连穆、程九柯、钱萍、郝冰清、高登榜等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坚持办事公正的原则，在开源节流，增加税收上，都呕心沥血地想了很多办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五、推行清廉，澄清吏治

中共人员在执行“六大政策”过程中，十分严格地推行清廉，澄清吏治，对公务人员该奖者奖，该罚者罚，激励了积极进步的工作作风。他们首先是本身清廉，不贪不占，不特殊，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以身作则，作出表率。

黄人青行政长不吸烟，不喝酒，不请客。一家3口人，住在一套3间房的普通宿舍内，既是卧室、会客室，又是厨房。陈设简单，衣着简朴。

林基路县长从自己的田赋奖金2000元中，拿出钱来，建办公室，盖舞台、买马车，为公家使用。平时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从不擅专。就是订阅11份维、汉文《新疆日报》，也要请示省财政厅核销。县政府买油印机，事前有令准购，事后呈报单据核销，为下属作出了表率。

为推行清廉，澄清吏治，对玩忽职守，贪脏枉法者，查清事实，则严惩不贷。

1940年2月29日，黄火青随同南疆视察委员会发现乌什县长买世敏自到差以来，对于县政毫无治理，且有贪污不法行为。即将买世敏看押，依法讯办。并委政干班学员肖瞻泽接任县长。

又拜城前任县长衣布拉音私占官荒良田七八百亩，查据明确后，报请批准，将官荒良田拨给无地农民承领。并派行政长官署科员麻木德前往，协同现任县长会办。

以程九柯为副局长的阿克苏区财政局发现新和县税局税务科长姚德成消极怠工，不守局规，饮酒游荡，屡教不改。经请示省财政厅批准，当即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半月。以示惩警，而观后效。

库车地方税局副局长蒋连穆和局长王书琴，1940年在接收前任局长徐春伯的粮食手续中，发现轮台县税局短少小麦196石，包谷35石。1941年2月又查出轮台县税局主任刘永祥，贪脏枉法，吸食鸦片。经库车县长林基路审理，省财政厅长毛泽民批准，送司法机关追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追缴侵占公款700·41元。

黄火青行政长官还十分重视各级官吏的政绩考核，重视奖优罚劣。1939年6月9日，到任初期，就发出第52号训令，颁发各级公务员登记表，以考察各级干部之状况，加强行政工作之效率。1940年3月15日，为加强二期三年建设计划，推动当年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规定3月12日至4月11日为全区各县机关工作竞赛活动月，要求各机关制定团体和个人竞赛办法。竞赛结束时要总结经验，写出结果和优秀者事迹上报，以便及时表彰。

发现官吏玩忽职守者，则严令改正。1939年10月6日，得

知沙雅县历任县长于二年之中积压命案八宗，乃竟验而不讯，讯而不判，草率从事，漠视被告利益。立即以第583号训令，要各县长整顿此类事情。规定各县长将积压刑事旧案多者3月，少者两月，赶速清理完毕。尔后，各县长亦应随时注意刑事诉讼审限（第一审限为审判60日，侦察20日），如刑事要案发生在审限内离任者，准移交新任县长办理，审限外积压未办者，卸任县长留原县办理，案件清结，方准离县。堵塞了政务工作上的漏洞，消除了互相推诿的现象。

由于中共人员处事公正，办事认真，赏罚严明，各级公务人员犯错误者较少，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六、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中共人员1939年来阿克苏后，十分重视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对青少年的学习成长，倍加关心和爱护。

盛世才统治初期，在阿克苏，国立和公立学校很少，很多乡村根本没有学校。汉族学生在私塾读书，念《百家姓》、《千字文》，读《论语》、《孟子》。民族学生在礼拜寺念经文识字，受着封建迷信教育。1938年，阿克苏全区只有小学56所，学生3825人。中学一所，学生60人。

1939年1月，林基路任阿克苏区教育局长后，在简易师范充实了班级，扩大了学生人数。还呈请省教育厅重新修建简易师范校舍，要求拨发建筑费省银票8000万两。经省政府批准，先拨2000万两以应急需。在简易师范增设了新的课程，有国语、算术、政治、地理、历史、自然、歌咏、体育等课程。1939年2月14日，将阿克苏简易师范学校修业两年的毕业生12名，分配了工作。并发出公函，在库车、乌什、温宿、阿克苏、拜城、阿瓦提、柯坪等县招收了小学毕业的优良汉、回族学生和通晓

汉文的维族学生，组成了一个新的班次，增加了学生人数。同年开办了三月至六个月的教员训练班两期，为学校培训了师资。还采取了并校措施，既节省了人力财力，又增加了学生人数。

1940年5月，阿克苏汉文会、维文会召开会议，研究有关中学校址和教员训练班，讲习所等教育事宜，黄火青亲自到会指导。

为使阿克苏教育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在中共人员主持下，还拨出大量款项兴建学校，1940年5月7日，政府拨款26000元，分于各校，用于校舍建筑。政府大力办学感动了各族人民，各族文化会亦积极办学，响应政府号召，并捐款支持。阿区维文会将绵羊3000只（当时约值新币5万元左右）交给苏（联）新（疆）贸易公司，换取大批教育用品和运动器材，分发全区各学校。

由于政府和群众大力办学，到1940年6月4日，阿克苏区共有县立会立学校297所，学生19991人。居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焉耆四区的第二位。较之阿克苏区1938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4.2倍。

中共人员对文化生活也很关心。1940年春的阿克苏，虽有电影院，但只能容纳二、三百人，看电影拥挤不堪，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黄火青决定拨出专款，拆旧盖新，南疆视委会也补助2500元，在行政长官署右侧修建了一个砖基、土木结构、绿色铁皮屋顶的大俱乐部，能容纳千余人，解决了人民看电影的困难。这个电影院一直使用到解放后的1958年。

1940年夏季，在阿克苏修建俱乐部的同时，阿瓦提县也修建了俱乐部。由于此举甚得民众拥护，民众自动捐钱捐料，以补政府拨款的不足。阿瓦提县艾则孜、阿不拉艾则之等70人捐大洋1135元，各种木料1258根，玻璃100箱，好铁20斤。《新疆日报》于同年6月8日对此作了专题报导。

林基路在库车尤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1939年3月林基路到库车前，全县有小学16所，其中公立1所；而到1941年9月离开库车时，公立会立学校发展到40余所，其中公立5所。学龄儿童大部入学。当时办学方法主要是在发展公立学校的同时，大力发展会立学校；广增学校班级，吸收学生入学，积极发动各族各界人士办学。1939年8月召开工商界人士会议，动员他们资助办学，工商会长瓦哈甫带头捐献15000元。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工商界人士那斯尔孜尕、尤努斯阿訇等人也捐了款。工商界人士共捐修了12个班级的学校课堂，瓦哈甫捐修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学校，1940年6月14日，受到新疆省政府的传令嘉奖。同时对库车的阿尔克孜族牧民甚为关心。1939年11月2日派人至库车北山大尤都斯调查了18户柯族牧民，无草场放牧牛羊，无学校让子女读书的困难。除经批准解决了放牧草场外，还经批准，建立一所公立柯族牧民小学校。在大尤都斯深山放牧的柯族牧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校，儿女们第一次得到学习文化科学的机会。还创办民校，开展冬学活动，发展成人教育，举办学生成绩展览，观摩学生手工劳作，以生动活泼的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兴趣。在1940年春，还搞了一次劝学运动（即劝学龄儿童去学校上学），形成了库车文化教育上的新进展。

中共人员从1939年1月到1942年11月的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在阿克苏含辛茹苦，廉洁自律；唤起民众，抗战建国；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展农牧业生产；对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发展中苏贸易，改善人民生活；兴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推动了社会进步，使阿克苏出现了物阜民丰的好局面。中共人员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发展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了建设新疆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赢得了新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阿克苏主持工作的黄火青被群众誉称为“平

民行政长”，出任库车县长的林基路于1942年调离时，库车全县民众纷纷向新疆省府要求林县长留任，并提出至少在库车再任五年县长。

但是，在新疆阿克苏工作的中共人员，在他们主持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成绩和进展的同时，却受到了盛世才的猜忌和迫害，致使担任阿克苏行政长的黄火青及在阿克苏从事教育工作的苏枚不得不于1940年秋离开阿克苏转赴延安。到1942年夏秋间，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的新疆土皇帝盛世才，更公然投靠蒋介石，背信弃义地以调省另有任用为名，将在阿克苏工作的中共人员陆续调至古城迪化。不久，他们就同在新疆其它地区工作的中共人员一起，被盛世才悉数投入新疆监狱，从此开始了一段新的斗争生活。

（原载《新疆党史资料丛书》，转载时作了删改）